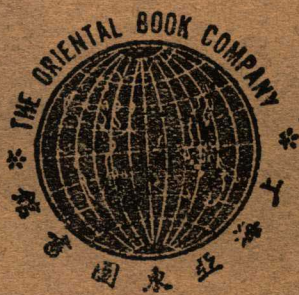


社會經濟發展史

德國萊姆斯著 李季譯



德國萊姆斯著 李季譯

社會經濟發展史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 有 所 權 版 ·

史 展 發 濟 經 會 社

版 出 月 六 年 八 十 國 民 華 中
版 四 月 七 年 八 卅 國 民 華 中

著 者	德 國 萊 姆 斯
譯 者	李 季
印 刷 兼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small>上海西藏中路四七五弄六號</small>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實 價	
郵 費	

譯者序言

德國社會民主黨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黨

員萊姆斯 (Wilhelm Reimes) 所著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Ein Gang durch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直譯當稱為經濟史一覽) 一書是世界各國經濟史中的別開生面者；牠根據唯物史觀的理論，將自古至今的人類經濟生活依次敘述出來，不獨綱舉而目張，並且淺顯而暢達。不論對於經濟科學有無研究的人都可用此書作讀物，因為牠不獨在文化落後的中國是一部唯一無二的完備的簡明經濟史，即在學術發達的德國也是如此。

自來黨派的著作總是帶着濃厚的宣傳色彩，本書却很少這種毛病，因為

這是一部舖敘事實的史書，不是一種發表政治主張的刊物，故作者不能利用牠作宣傳的工具。本書既非政治的宣傳品，又爲我國目前萬分需要的書，譯者爲對於學術界勉效棉薄起見，特將牠翻譯出來，以嚮國人，並贅數語于其首。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李季序于柏林。

序言

社會經濟發展史一書既用不着聲明其爲必要，也無須加以推薦；因爲在社會主義的著作中簡直沒有一部書用通俗的方法，將現今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起源與發育告訴工人，領導他們向經濟史的方面前進。現在有好些著作只是描寫單個的經濟發展的時期，還有些更大的著作對於單個的國家和各國家的集團間經濟發展的過程，在篇幅繁多的厚本子中，作一全體的概括；但此等著作除掉大半是從純粹自由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外，牠們只是爲專門學者或對於經濟史已有深切研究的人而作的。牠們對於一般工人是過艱深，即對於那些曾經讀過一些通俗經濟作品略具根柢的工人也不適用。有

好些工人爲求知慾所驅策，很熱烈地翻閱此等著作；但時而是這裏不明瞭，時而又在那裏不清晰，畢竟弄得他們索然無味，自己對自己不滿意起來，於是只好將這難懂的书拋在一邊。我當新時代 (Die Neue Zeit) 的編輯時，一般青年讀者和其力求上進的同志屢次向我要求替他們指出一部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的通俗的簡明經濟史來。我的通常的答詞是，可惜我們的社會主義著作中還沒有這樣的一部書。有幾次我弄得不好，提出伊拉馬·斯特列格 (Ivan Streneg) 的德意志經濟史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桑姆巴特 (Sombart) 的近世資本主義 (Modernen Kapitalismus)，和阿白爾 (Oppel) 的普通經濟智識 (自然與勞動) ('Allgemeine Wirtschaftskunde - Natur und Arbeit') 等書，後來我必須忍受一切的非難。

萊姆斯同志在不久之前向我說過，他願將他在大戰前幾年中對於社會主

義工人所作的經濟發展的講演，略加改正，印成書本。我因為有了上述的經驗，聽到他的話，心中十分歡喜，並祝其早日成功。我以為萊姆斯同志做一部通俗的經濟發展的門徑書，甚為相宜。他是一個出身于工人階級的作者，他的學識是由自己勞苦的自修中得來的，他在社會主義工人的面前，比其他書生式的學者更懂得應用適宜的語調；還有一層，他當社會民主黨教育委員會的遊行講演員，為時既久，便獲得充分的機會去領略工人對於經濟生活的發展及其自身在這種生活中的地位要想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

萊姆斯自己所標舉的任務是，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對於經濟的全部發展作一種概括的瀏覽，依我的評判，這種任務他是很愉快地做到的。再多他也不願意做，因此再多別人也不能向他要求。他固未嘗裝作要由自己鑽研的新結果去充實經濟史，或要替經濟史指出新的道路。

在一部這樣小的著作中，對於經濟發展的過程，自然只能陳述其中主要的階段，因此自專門學者看來，許多對於他特別有興趣的東西是省略了，在另一方面，有好些事好像是說得太寬，講得太遠。其實這種批評是忽略了萊姆斯此書不是為專門學者著的，他在下筆時要時常顧慮到一般工人沒有真正科學的預備教育，只具有一些早時成熟的經驗，這是他在他的遊行講演的活動中接觸到的。

萊姆斯著書的目的，我以為在每一方面都是達到的。此書避開冗長的抽象理論的說明，除去那些足以妨礙全部的瀏覽的瑣屑事項，直接討論工人在觀察經濟過程中從經驗上所湧出來的問題，並且在讀者的眼前，用疾馳而過的方式，展開一幅輪廓分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圖樣。又現今的研究對於好些單個的發展過程有時不能作充分的解釋，因此生出各種假定，作者為防

中讀者流入假定的紛亂中起見，本他的想像，對於那些假定，作簡明的決定，我以為就是這一點也是一種長處；因為初次鑽進一個知識方面的讀者絕不能本着自己的見解，決定那一種假定比其牠假定爲好。他們只是看見有一批假定橫在他們的前面，五花八門，令他們摸不着頭腦，因此使他們離開主要的事實了。

就德意志講，差不多在一切人層中，對於從前時代經濟狀況的認識，可惜都是很膚淺的，然這種認識畢竟是正確觀察我們現今經濟潮流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據我看來，傳播這種認識和引起經濟史問題的興趣，在黨的社會主義的著作物中，沒有另外一部書比萊姆斯此書更適宜的。因此我希望此書出現於書林中，能收得一種最好的結果。

一九二一年十月科洛 (Heinrich Cunow) 序於柏林·佛利德蘭 (Berlin-F)

目錄

譯者序言

序言

- 第一講 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一
- 第二講 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古代日耳曼的馬克經濟……………四九
- 第三講 古代社會的奴隸經濟……………九七
- 第四講 中古時代的地主經濟……………一五一
- 第五講 城市及城市手工業的發達……………二二九
- 第六講 協作，工廠手工業和機器業的資本主義生產 大資本主義及其達到社會主義的固有的傾向……………二七九

第一講 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基礎 (Die Arbeit

als Grundlag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在人類社會中每一種經濟生活，每一種人類生存的主要基礎是什麼呢？
我們答道：是勞動！

在一切時代中，在每個階級中，勞動是不可缺少的，倘若沒有勞動，無論社會發達的程度是多是低，人類的生存是不可想像的。

所謂勞動，或是僅僅採取自然所供給的營養資料，而未經人力的生產，或是使自然產物經過炸炒蒸煮作為養料，或是因種植而獲得此等產物，或是

像我們現代高度發達的生產一樣，鞭策自然，應用自然力于勞動之中，這都是一樣的：在這一切發展的階級中，都有賴于勞動的運用！勞動是人類原始生存中的基礎。在每個文化程度更高的時期中勞動當居首位，那更不待言了。

我們對於這樣的解釋雖一目瞭然，但有些專門學者的見解竟與此直接相反。我們在此舉出一個專門家為例，他的著作也是我們許多同志愛讀的，並且在實際上我們還要感謝他給予我們好些知識。不過他的見解和結論我們常是不能盲從附和的。我們所指的就是萊比錫 Leipzig 大學教授布協。(Karl Bücher) 他在他的國民經濟的起源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第八頁中有下列一句完全確定的話：

『在極長久的時期中，人類的生存未嘗需要勞動，這是毫無疑義』

的。」

這是一種恰恰相反的解釋。我們所說的是：倘若沒有勞動，人的生命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我們試對於布協及其門徒所主張的人類生存未嘗勞動的時期與狀況來描寫一下。我們必須想像此種人是在原始狀況之中，他們既不知道耕種，又不知道牧畜，殆沒有何種勞動工具，他們只是依賴自然供獻的物品以維持生活。然就是此等人我們也不要以為他們是懶惰度日，一無所事。

在當時的地球上的確也有熱帶地方，極富于自然的營養料，如波羅蜜樹，椰子樹，棗樹，非常暢茂，其他可作食品的植物也十分豐足，人們沒有特別的勞動與努力，即可生活。可是這種豐富的自然不僅供養人類，並且供養無數的禽獸，其中有一部分是兇猛無比的，所以人類單是為維護生命起

見，已經要有一種努力。

然這樣的熱帶是比較稀少的，況且人類蕃殖最多，發達最高之處，不是此等物產最豐富的地方，但在磽确不毛的地帶，這是一種人所共知的事實。

在地球發達的過程中，有四個所謂大的結冰時代，(Eiszeit) 歷時極長，以致許多種類的動植物都完全消滅了。人類當這種結冰時代已經生活着，並且畢竟超越這種產物非常稀少的狀況而蕃殖下來了。在此等時代中，人類的精神發達已經達到某種高度，他們發展了藝術的需要，如文身，如將動物的形骸畫在住處的壁上，如將花文刻在武器和工作器具上，都是些例證。

人類在此等不順利的自然狀況中，如沒有勞動，如沒有刻苦的勞動，能夠生存，能夠發展文化麼？倘若大膽作這樣的假定，便和那關於地球的本質與原始人類的生活的科學所明曰要求的，互相抵觸。但是此等時代與狀

況過了數十百萬年沒有文字的遺傳，科學對於牠們能够有所認識，有所證明麼？

然科學對於原始狀況的認識有兩個重要的來源。第一就是人種學(Ethnologie)或民俗學，(Völkerkunde)自資本主義出現，牠的世界貿易和殖民政策使歐洲諸民族與向來不知道的無數自然人(Naturvölker)相接觸，于是研究民俗的傳說，信仰，習慣等事，遂成爲一種科學。許多商人，富翁，官吏，探險家，如蠶一般擁入一切新發見的地方，他們這些資本主義的走卒從所有未曾和現代文明接觸的自然人中逐漸搜集了一種豐富的材料，至于此等自然人是倚賴漁獵菓實和自然的農業牧畜而生存的。

民俗學的任務現在就在徵集這種分類甚多的材料，加以考驗，整理，並且自爲調查。這種科學是這樣來確定人類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構造。

民俗學且獲得書契以前的歷史 (Prähistorie) 的幫助，至于這種歷史據有有史以前的物品，如極古的骸骨，工具，器皿，以及其他文化的殘存品，牠並且考查瑞士湖中的住所 (Fahlbauern) 和太古時代其他的建築遺蹟，這是地球上一切部分都找得到的。

民俗學又調查現在尚生存的自然人的狀況，以便和業已死去的書契以前的自然人狀況相比較，這兩種科學考查的結果遂將原始人類生活的圖形表現出來了。這種圖形在單個的特點上固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就大體講，牠是極近真實狀況的。

反之，許多至今仍然生存的自然人的狀況表現一切單個的特點，就是布協教授在他的國民經濟的起源第九頁也有一個栩栩欲活的圖形，描寫他們的狀況：

『他們分作小羣，和野獸的羣有點相似，到處搜索食物 植物根和菓實爲主要的營養品○但他們對於力能攫取的動物以及蝸牛，蛆類，蚱蜢，白蟻，也用以充飢，他們的睡所或在土洞裏 或在樹上，或在數分鐘內用叢木構成的蔽風雨的窩中。 男子大概以弓矢或可供投擲的木片爲武器，女子則以一根尖頭木棍爲主要工具，藉此鑽取地中的植物根類。 他們如果遇着高級氏族的人民，常是羞卻逃避，他們從事于飄蕩的生活，所以需要一種極矯捷的身軀，至于技術的發達非常遲緩，並且是流于一偏的。 屬于此等氏族的人民最大部分絕不知道製造陶器和金屬器具。 就是木，皮，石，骨等材料，他們應用之處也不多，並且沒有因這種應用引起工具和器皿的儲積，因爲一種時常搜尋養料的飄蕩生

涯有礙于儲積器具的攜帶。』

依照布協教授的意見，原始人的生活就是如此。

我們對於布氏的說法只要稍微思索一下，便即刻覺得自然人應用這樣笨拙的工具，在幾分鐘之內挖一個土洞，或用叢木構成一個蔽風雨的窩子，作為夜間棲息之所，這是不可能的，至于他們應用木、皮，石，骨的器具，並且據有弓矢，却未嘗從事于勞動，這是不合理的！

其實所有上述的工具都是這個時代的人勞動的結晶，這是完全值得我們注意的。此等人已備有挖洞的木棍，投擲的木片，和弓矢，作為他們的武器。現在還要提及一種原始人，他們對於弓矢這樣的高等工具是絲毫不知道道的！

哈普德（Heinrich Parpuder）同志在他著的經濟生活的起源與發展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Wirtschaftslebens) 一書中把布協教

授對於原始人生活的描寫，概括起來，內中所表現的圖形（第三十二頁）含有些正確之點：

『原始人無論是單獨的，或是形成容易解散的小羣，他們爲饑渴所驅策，往來于山林中，尋求植物根和菓實，甲蟲和昆蟲，已死的或半腐爛的野獸屍身作爲養料。他們遇着什麼，就吃什麼，並不加以調製。他們全部的活動不是生產的，只是佔有的；這種活動起初只在採取自然所供給的動植物的營養料，作爲生活資料和享樂資料。』

這種圖形用不着特別的更改，可以應用於尙未用火的原始人類的生活上。可是這種人因維持生活而發生的尋求與爭鬥不當稱爲勞動！我們

對於那『在極長久的時期中，人類的生存未嘗需要勞動』的見解，實在不能贊同。人類最原始的生活就是建築在勞動上面的，即使他們只要挖取植物根，收集植物種子，或摘下菓實，此外，他們因為沒有備具猛獸的爪牙，只要防備野獸與敵人，然就是這樣，也是一種勞動。

現在或者有人要說：像這種粗笨的動物式的尋求養料與維持生活既可視作勞動，那獸類在自由的自然界中也有同樣的勞動。因為獸類的生存也是建築在尋求養料上面的。還有些獸不獨是為着目前的饑渴尋求養料，並且預計將來，從事儲藏，或備他日的饑荒，或供冬季的需妥。例如狗于吃飽之後，將剩下的骨頭保存着，以備將來之需，山中的狐也因同樣的目的將殘餘的食物藏在雪的下面。腮鼠 (Hamster) 在牠的居室的旁邊建築一個儲藏所，滿儲五穀之類。田鼠也有同樣的動作，不過規模較小罷了。此外

如蜜蜂與黃蜂儲積蜜糖，松鼠與喜鵲視櫟子爲養料，一到秋天，牠們即儲積大批的櫟子。我們還聽說臭貓（*Ilitis*）和鼯鼠（*Marmoset*）儲藏動物界的東西作爲冬季的食品。還有一大批的禽類爲着孵卵和居住而築巢，甚至于某幾種魚也造起住所來；鼯鼠，鼯鼠，鼯鼠，（*Marmeliter*）兔子，水獺，狐，獾，海狸都能掘土成洞，作爲住所。更有些動物因爲取得營養和建築住所，而營羣居的生活。海狸結成一個勞動社，共同把樹木放下來，拖到牠們的目的地，用樹身和樹枝造成一條小河，避去風浪，再構造一個住所。至于蜜蜂，螞蟻，白蟻，營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生活，是我們業已習見習聞的，牠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恰恰構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模型。我們試看單個的似人猿在採取養料或保護自身之際，應用木片與石頭作武器，我們使知道在獸類中已經開始應用一種工具了。

現在便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此等動物維持牠們生活的活動和最低等人類的活動——即我們所指為勞動的——相同麼？或者在兩者之中有什麼不同麼？

我們回答道：的確有不同的地方；馬克思 (Karl Marx) 在資本論 (Das Kapital) 中描寫這種不同之點如下：

『蜘蛛所創造的作品和織工的作品有點相似，蜜蜂所建築的蜂窩足以使好些建築師相形見絀，自覺慚愧。可是一個最笨拙的建築師和一隻最靈巧的蜜蜂歧異的地方，就在建築師在他和蜜蜂一樣建築窩巢之前，他的腦袋中已經具有建築的模型。』

所以人的腦袋中先懷抱這種勞動；他用經濟的方法，力求由勞動實現他的精神上所決定的任務；他實現這種勞動是有意識的。

我們可于人類完成並且時常改良他們的工具，得着上述一點的證據。

我們對於蜘蛛的織網，蠶的造繭，蜜蜂和海狸的經營窩巢，雖十分驚其精細巧妙，然這一切動物和最原始的人相較，也萬分趕不上，因為牠們總只能運用牠們本身的器官去做工作，並且只能做沒有變化的同樣的工作。蜘蛛不能建築蜜蜂的窩，蜜蜂不能織成蜘蛛的網。可是人類紡，織，建築，能夠做一切工作；他們知道對於每種勞動造出必要的工具。人類精神的發達使他們超出其他動物之上，使他們的四肢五官得超越原有自然的本能而臻于完善之境。這種精神發達的高度是其他動物未嘗達到的。

就是業已懂得應用木石的動物也從沒有超過這一點，表現何種進步。似人猿具有動物式的認識的能力，然牠投擲木石至今仍和牠的老祖宗一樣；沒有一隻似人猿的手能夠造一種最笨拙的石斧，沒有一隻似人猿知道取火和用火。發達的程度最高的動物也只知道在他的附近找一點東西，很笨拙地

用作工具；可是人類知道去發明工具，他們知道在腦袋裏想像一種東西，用手做出來。因此美國的大學者佛蘭克靈 (Benjamin Franklin) 稱人爲一種『製造工具的動物，』馬克思在資本論 (第一卷一四二頁，) 中也劃出同樣的分界線：

『創造和應用勞動工具一事在某幾種動物中雖已有萌芽，然這却是人的勞動進程的特點……』

考茨基 (K. Kautsky) 在他的人生哲學與唯物史觀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第八十頁中也說……

『獸人 (Tiermensch) 能生產生產工具才開始變成人。』

所以人類是從發見者進步到發明者的。

這種決絕的差異是經過了很長的發展時期才形成的。那還沒有變成人

的動物在很久的時期中，必須藉爪牙之力去維持牠的生活，恰和其他牠禽獸一樣。這種動物最初因衝動而攫取物件作為幫助之具，後來漸漸地知道應用自然獻給牠的東西，如石頭，如牠所打死的或遇着死去的大動物的骨，角，牙齒，如海中所產的銳利的貝殼，如樹枝之類，牠徐徐將此等物件加以改造，使牠們變成適于應用的工具。

第一種改造就是將本來頗適于手携的石頭拿來，敲去其不合于手的把握的部分，使之更便于應用。火石就是首先被使用的材料。原始時代有思想的人顯然應用過的石頭，地球的各處至今還是有的。

此外，自最古的時代起，木材——雖只是斷裂的樹枝——是被應用的。人們漸次知道將石頭和樹枝結合起來，起初還只是用樹皮或動物的筋綁成的，後來才將石頭打一個洞，將樹枝插進去。我們對於這種石斧構成的程序尚

可從現今還在石器時代的人民中得到正確的報告。石斧是原始人類應用最廣的工具，這是他們戰爭的武器，這是他們作工的器具，這是他們達到一切目的的使用品。當獸人還沒有達到自製工具的程度時，牠不能超過一種動物式的生存。當牠能够製造工具，牠才超過動物的界線，開始有意識地

上進，使牠的生活得以有計畫地提高起來。

但是獸人要能夠上進，牠在生存的爭鬥中當首先把自己改變起來：牠的腦部必須發達，使牠在精神上得超過一切動物，牠的身體必須豎立起來，牠的兩隻前腳必須形成人的手，這樣的手就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所稱的『工具的工具』，這是十分奇妙的。

『曾有人對於人類的文化史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叫做人的腦與手的歷史。……在太古之世，這雙手將火石做成斧和刀，並且在天

然的岩石洞壁上刻出動物的形象，後來牠們又造成密羅（milo）的威洛斯，（Venus 譯者按這是司美麗與愛情的女神，）畫出紐克斯提尼的馬多拉，（Siztinsche Madonna 按此即馬麗聖母之像，）這同一的手更建築城市與華麗的皇宮，製造巨大的汽船與鐵路，汽球與飛機。』（見紐曼的原始世界的奇蹟八八頁。Vun-der der Urwelt von Karl v. Neumann.）

人的手具有這種奇異的力量，牠形成創造制度文物與破壞制度文物的工具，牠又形成最可怕的毀滅一切的東西，然在最初時，牠只是造成一種石頭，以便原始人類去獵取野獸。獸人在發展的過程中進到製器這一着，就是牠發達成爲人了。當歷史以前的人不復像動物一樣去攫取養料，但借助于他自製的工具爲獲食的武器，當他愈加達到這種程度，他便變成人了。

所以勞動不僅是人類最原始的生存中第一種基本條件：勞動並且首先使人超出動物界，凡人類的發展與進步的一切方面都導源于勞動的進步，如用現今的話來說，就是導源于技術的進步。人類從打獵起，漸進于牧畜，農業，家庭的紡織，陶業，金屬製造，交易，和專門的商業；由此又進于美術與科學之域。每一次進步的效力是革命的，牠必然引起更向前走的進步。勞動日趨完善，日趨複雜，而人類社會也因此日趨完善複雜了。人類從飄流無定的『霍德』(Horde 按即小羣之意，)而進于霍德的聯合(Horden-verbände)與氏族(Stamm)，再由氏族而進為民族與國家。勞動一有了根本上的改變，人類社會中的生活形態即與之俱變。根本上的勞動改變連接而至，愈趨頻繁了。近幾世紀以來，世界社會關係的革命比幾千年前要快得多。然有意識的人類勞動是這一切變化的出發點。勞動是一個磐石，

過去是在此石上發展的，現在是奠基于此石上的，將來是要建設在此石上的！

在時代的推移中人類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戟，要使勞動日趨完善呢？

我們回答道：就是因為要滿足他們與日俱增的生活慾望。

人們要改良工具與勞動方法，使勞動更富于生產力，這樣的滿足才是可能的。從原始時代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不滿足與繼續增加的慾望就是技術改良的原動力。

但我們對於更大的慾望的出現，怎樣加以解釋呢？

只要領略了現代人類的慾望是怎樣發達的——僅由於他們社會的共同生活！——便極容易明瞭上列一個問題。

我們現代每單個人的慾望都是由社會中發生出來的；現在既是這樣，一

切時代也是這樣。

例如在前期的中古時代，人們的住宅普通是卑陋的，黑暗的；無論任何處，看不見我們現時的火爐，煙突，燈火和玻璃窗。當時的火爐十分簡陋，煙是從窗戶或所謂屋頂風眼中放出的。燈是由動物油與綿燈心相合而成的，甚至于用木片充燈火。玻璃窗到十五世紀才出現，起初還只用于城市中。

我們現在對於住宅與房中設置的要求爲什麼比從前要高得多呢？

因爲社會中好些單個的人發達了一個更高的住宅的慾望，而此慾望影響到一切人了。

現代的世界因爲社會的影響，發生了許多慾望，如鐘錶，紙烟，隨身小手巾之類，這都是從前絲毫不知道的。此等物件起初只是單個人的慾望，

大概只是上等社會階級的慾望，由此漸次普及于一般人。

馬克思在他的小冊子工資勞動與資本 (Lohnarbeit und Kapital) 第二十五頁中對於慾望起源于社會一點有下列的一段話：

『一棟屋子無論其爲大爲小，只要四鄰的屋子和牠的大小一樣，那牠對於住宅可以滿足一切社會的要求。可是小屋子旁邊如果建築一座皇宮，牠便相形見絀，小得不像樣子了。這小屋子現在所表現的是，牠的主人沒有體面，或只有極小的體面；在文明進步之中，牠固然可以改造得高聳天空，但當牠旁邊的皇宮依前此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向天空昇起時，那麼，這比較矮小的屋子的居氏總是感覺不舒服，不滿足，總是感覺侷促不安的。……我們的慾望與享樂是由社會中發生出來的。』

一個人的慾望與要求是能够影響他人，使之精神興奮，向前進行的。過去是如此，現在仍是如此。一個人倘若離開社會，單獨生活着，那他差不多不會發生什麼慾望，尤其是不會發生高等的慾望。倘若他有了此等慾望，牠們當和他一齊消滅，牠們絕不能遺傳給他的後代和鄰居，絕不能達到更高的步驟。並且高等慾望是不能由離羣獨處的人來滿足的。只有許多人聯合起來，分工合作，互相幫助，互相交換生產物，藉此解決經濟的問題，才能夠滿足高等慾望。

我們還要指明，人在全部發達之中是怎樣時時刻刻倚賴社會的。

爲着製造並且使用一種工具，即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發達獨立的思想，與必要的才能，要從事觀察，並且收集經驗與知識。除掉思想的能力外，言語也是同樣不可缺少，因爲思想與觀察是由言語表現出來的。

現在要問言語是怎樣起源的呢？

我們要懂得言語的起源，必須又回到動物界中去追究一下。有許多種類的野獸已經不是獨居，但是羣居的，如猿猴，麋鹿，野馬，反芻獸等等，還有許多種類的飛禽也營羣居的生活。牠們由一隻老的動物領導，尋找共同的就食地，並且佔據地勢，共同防備仇敵的襲擊，因此在牠們中間互相報告各種最不同的消息。牠們有各種鳴聲，表示牠們對於異性的引誘，對於仇敵的驚慌，對於遠處危險的驚戒，或是表示嬉戲與挑戰，歡樂與恐懼，愛情與忿怒，這都是牠們大家完全了解的。我們只要想及羚羊，當獵人相信確能射殺羚羊時，牠常是一聲狂叫，使全隊羚羊都逃跑了。不獨此等羣居動物知道以鳴聲向同類報警，就是孤棲的動物對於牠們的週圍也是執行警戒任務的。當我們穿過山林中時，山鳥與喜鵲即作恐怖的鳴聲以警戒其餘一

切動物；老鴉對於掠鳥(Spar)以及其他原野間的鳥雀也執行同樣的任務，沼澤間的全體小鳥則注意于更大的涉水鳥的警告。

那不成音節的聲音就是原始人起初互相了解的媒介。但他們的精神能力高度發達的力量使他們發展許多種不同的聲音和思想，以互相結合。他們因身體與四肢的運動，使他們的『言語』愈加清晰，和我們現在要使我們的表詞愈加有力，便很自然地用手勢去幫助我們說話是一樣的。這是那遺傳下來至今還應用的符號言語 (Zeichensprache) 的殘餘，當時除掉那粗俗的音節言語 (Lausprache) 外，這種符號言語的重要遠勝于今日。我們又看見啞子如有報告，便直接用符號言語表示出來。

可是要形成這種最簡單的互相了解的媒介，必須首先有社會的共同活動，必首先有大多數人共同生活。倘若沒有人類共同的結合，則一種言語

的發達是絲毫談不到的。當人類共同生活，共同防護，共同工作時，他們必須有一種共同的聲音去指示一定的事物和動作。當共同生活愈加複雜，當要用聲音指示的事物愈加增多時，言語便依此比例而愈趨發達與完善。所以言語是建築在人類的共同生活及其勞動上面的。言語與勞動內部的連結在簡單人民的動作中到處表現為共同的勞動歌。就是在我們中間也還有些勞動者如水手等等發出一定的聲音去幫助他們的勞動。

言語也是勞動一個有力的推進者。言語是將一切經驗，發明，和認識報告給別人的主要工具，是將這一切東西遺傳給後代，並散佈到各處的主要工具。言語雖是在勞動與社會中發展出來的，然牠也催促兩者向前進步。牠們是彼此互相推進的。可是當勞動關係使原始人類的小團體一經發育，此等發育的小羣也必定和原來的小團體具有一致的言語。血緣關係是保持

此等新發育的小羣第一種自然的維繫物，牠們共同的言語就是一種人爲的維繫物。然一種言語或者藉戰爭，壓迫，與毀滅其他言語團體之力，以及用貿易與交通的和平方法，使牠自身仍爲任何不重要的野蠻氏族狹隘的方言，或者成爲那站在領導地位的有文化人民一種說話的工具，即成爲一種千百萬人所使用的世界言語，——此事畢竟又是以勞動關係的發展爲轉移的。現在的英語、德語和從前的拉丁語一樣，同爲世界的言語，這畢竟是受了英德兩國龐大的勞動發達之賜。但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對於這龐大的發達從最初時起就是必要的。

除掉勞動以外，還有第二種東西真正是基本的，最重要的：即人類社會！我們對於人類的關係試溯源到最初的起點上去，便發見牠們是從勞動與社會中發生出來的。勞動與社會是一個歷史的子宮，人類的發展是從這

個子宮內面開始的。

除掉邏輯的理由外，有史以前的發見的學說也使我們得到這種結論。

科學指示我們，在太古時代的巨大山林，草原和沼澤中有巨獸的棲息，如象，兕，熊，河馬，巨象，野猿，巨鹿，和野牛之類。此等巨獸已由原始人獵取為食料。有大批各種各樣的獸骨與石器及人類的骨骼同被發見，便是證據。例如在維馬（Weimar）的套巴合（Taubacher）石山中發見巨象，犀牛，穴居熊，穴居獅，穴居鬣狗，鹿，野牛，野豬，野馬，狼，和海狸的骨頭。此等骨頭不是偶然遺在該處的石山中，但是當時人類餐後的殘餘物，因為有些骨頭和石是被燒燬了，有一部分骨頭因取骨髓被打碎了，還有些骨頭是切斷了，牠們的旁邊並且有人類十分簡單的工具，這都是一種證據。在這個被掘發的地方還有燒火與眠睡的位置，此事足以表現太古時

代的獵人是在此處棲息過的。在克洛廷 (Kroatischen) 的亞格納姆 (Agram) 一個相類似的掘發地帶也有相同的證據。

孤棲的人類拿着棍子要制服此等猛獸，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大羣的人共同圍攻突擊，才能夠達到目的。

法國的索路脫 (Solutré) 地方一個很高的岩石底下發見一堆破碎的骨頭，觀其數量必須是曾經殺死了幾十萬匹野馬。這一大批殘餘的骨頭自然只是由一個共同生活的大人羣在很長久的時期中遺留下來的。

在東海 (Ostsee) 的沿岸，——在亞洲和美洲的沿岸也是如此——有所謂『寬勤滿丁格』(Kökkenmüddinger) 的，就是些四百米突長許多米突高的原始的堤，此等東西已被證明為遺棄的廢物，為食後的堆積物。這是當時住在沿岸的人視為生活主要品的魚類——如蝸牛，蛤蜊，和牡蠣等——的殘餘

物。他們將此等廢物隨意棄置，歷時既久，後者便和一些無用的工具共成爲龐大的堆積物了。

此等魚類的殘餘物堆成了小山，這種事實又足以表現此等地方曾經很大的人類團體居住過。我們對於人類生活的枝節問題的見解無論怎樣互相差異，然有一點總是相同的，就是我們必須認他們的生活從初時起便是些社會的行動，至于這種社會的構成是像現在一樣，有千百萬人，還是只有幾千人甚至于幾百人，這是完全不關緊要的。陳舊的科學著作說人類在原始時代是由孤棲而發達的，此說與認人類在原始時代的生存未嘗需要勞動之說，同一荒謬絕倫。對於原始人類描寫得和魯賓孫 (Robinson) 一樣——拉塞爾 (F. Lassalle) 也是如此看法——這一點只適宜于幾十年以前的科學程度，後來便不復有此事出現了。昂格思 (Friedrich Engels) 于一八八四年在他

的家庭，私產與國家的起源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第八十六頁中就已經說過……

『當原始人從動物界發展出來，完成自然所呈露的最大的進步時，他們的中間還有一種元素：就是由羣衆聯合的力量與共同活

動去代替那單個人所缺乏的自衛能力。』

資產階級的學者如布協及其門徒等對於上列這些事實並不是不知道的——他們這些人怎樣能夠不顧事實，任意主張在極長久的時期中，人類的生存未嘗需要勞動，而現今尚存的生番仍然是如此呢？

此等學者提出這種主張的理由只能是因他們所謂勞動和我們所指的完全不同。在實際上也的確是如此的。

布協依照自己的意思，以現今的自然人為例去描寫原始人的生活，同時

他又以自己對於勞動所懷抱的見解去解釋他們。

依照布協的見解，一個原始的野人最爲懶惰；他憎惡努力工作比憎惡什麼都厲害，他最喜歡整天睡在太陽底下，直到晚間爲饑餓所迫，才起來覓食。布氏描寫這種生活（見國民經濟的起源二十至二十一頁，）爲純粹的疏懶與浪費時間。

可是布協對於這種野人的生活還想出一種異樣的東西。他們如果真止履行了何種任務，可以列入勞動的意義之下，他就以爲他們從事此項勞動不是一種正經的生活工作，只是一種遊戲的方法。他說：（見同書二十七頁。）

『自然人的勞動真是一種模糊的影像。我們追溯這種勞動愈遠，牠在形態上和內容上便愈近于遊戲。』

他們不是依着時間的次序作工的，這就是說，不是有恆的，他們只是爲饑餓所迫，一時高興，才去勞動。此外，他們用文身等方法、裝飾自己，去從事勞動，並且伴以跳舞和音樂，總之，他們絕不視勞動爲人生一種繁雜的正經的主要目的。但使之和遊戲一樣容易實現出來。

布協教授這種確切的陳述固然中肯，但他和我們由此所抽出的結論是相差甚遠的。

布協的結論是，像低等的自然人藉勞動去滿足他們的經濟慾望的方法，絕不是勞動。此等人的全部生命是虛度的。他們在懶惰與漠不關懷的狀態中斷送了他們的時間。

我們說：只有從現今資產階級的人的觀點去看此等人，他們才是懶惰的。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古時的日耳曼人（Germanen）也是懶惰的。

此等人只是爲滿足他們自己直接的慾望而勞動。這是他們勞動的目的，而他們勞動的標準與全部方法也由自身產生出來了，恰恰適合他們的目的。他們所運用的勞動不多于他們的慾望所必需的。他們對於體力，過度的疲勞，和日間的熱度，極爲注意，對於一切足以增進勞動與生活愉快的事項，都加以考慮。因此他們將勞動與遊戲及跳舞聯合起來，在這樣的一種文化中，勞動對於生活不是一種繁難的事體，但是一種完全自然的快樂的活動。

這種勞動形態與生活形態的自身是合理的。在勞動將受剝削的地方，牠們便消滅了。然就是在此處，那些據有優良地位的人仍挾着一種剝削的見解，力求支配勞動。

勞動本是每個人一種自然的慾望。依照人類全部的能力講，他們不是能夠死板板地不活動的，我們對於現今一個有文化的人可以說，如果強迫他度一種完全不活動的生活，那便是直接致他于死地。勞動對於他是一種真正的文化的慾望，當文化的程度愈高。他這種慾望便愈大。

但人類在本性上就只願意依照他們的慾望的標準從事勞動，藉此獲得愉快的生活。他們對於這種不可缺少的勞動要布置適宜，使不為生活之累，并且儘可能的限度，予他們以愉快和滿足。現今沒有受宰制的自然人仍然是依據這種觀點去布置他們的勞動的。只有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才屈服于勞動的羈絆之下；勞動對於他們是沒有止境的，所以勞動成爲生活的一種重負了。

自剝削社會出現，勞動目的的決定已經不同，而勞動形態的決定權不操

于真正從事勞動的人的手中，但操于剝削勞動的人的手中，勞動成爲人生的一種重負，原因就在于此。

人類原來是站在同等地位，不受剝削的，他們從事勞動，只是爲着滿足他們自己狹隘的慾望。但在社會發展之中，生產工具落入私人的手中，此等人于是變成宰制別人的人，而勞動進程的措施畢竟不復注意于勞動者的利益，但注意于剝削者的利益了。在每種剝削的關係中——在奴隸制，奴農奴工制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都有這種情形出現。

差不多所有資產階級的學者都認資本主義的社會爲一切發展中最後和最高的階段，所以和這個社會相連結的勞動方法也是沒有終極的。

可是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是勞動發展的長久歷史中一個特別階段。這種生產行將消滅，和奴隸勞動與奴農奴工勞動已經消滅，都是勢所

必至的。

社會主義的勞動是會繼着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出現的。這種勞動又是生活中一種經常的愉快的現象，因為階級社會與勞動的剝削已經消滅了。

*

*

*

*

*

我們現在對於勞動的另一方面——勞動的目的及其編制——還要說幾句話。

我們已經看見：（一）勞動構成全部發展的出發點，（二）勞動與發展必須導源于社會。當一個人孤立無援，想要生活和勞動，那他時常只能和赤條條的物質上的生活必需品相爭鬥，他不能夠超過這種狀態，只是陷于這種絕對的野蠻中，即一種高級文化的初步也是不能達到的。可是人類一經共同勞動，並且有計劃地加以改進，便會發生文化與一切偉大的事業，便會發生人類的歷史。

我們知道現在勞動的生產物是怎樣開始的，千萬人在工廠中作功中，化驗室中和事務所中有計畫地用手工作，一般自然科學的學者在這種共同的大工作進程中不過是些科學的共同勞動者罷了。

我們又知道，這千萬在工廠與作坊中的工人只做了一部分的工作，他們只是些彼此互相啣接的部分人。(Teilnehmend) 所有這些部分人是在技術領導的命令之下聯合成爲一整個人的。所以每一個更大的工廠，每一種更大的交通企業在內部是一種有計畫的編制中真正的奇觀。我們只要想及郵政與鐵路龐大的組織就知道了。

社會主義要公然接受資本主義單個的企業這種內部精細的編制，並且要加以推廣，使全國各產業間有勞動的編制，各國間有勞動國際的編制。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記着，『勞動的編制』這個大原則並不是現代才有，

在一切時代中牠就出現了。無論那一個時代，勞動總在何種方法之中按照牠的目的而受編制的。這種目的就是製造人類當時所用的物品。在這種勞動所結合的大小社會中，消費的數量就是其中勞動總範圍的標準，勞動是按照這種標準，在某種方法之中受編制的。

這種標準的自身與編制的方法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單個時期中自然是彼此完全不同的。

在一個完全簡單原始的蒙昧人霍德中，慾望與消費比在一個已經有一定住所的農業人民的社會中要小得多；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與中古的奴農奴工社會中，慾望又比在現今的社會中不同；但有好些慾望在一切發展的階段中都是出現的。勞動必須依照當時已經出現的慾望在某種方法之中而受編制。

例如一個蒙昧霍德只是製造石斧，而不運用充分的勞動去生產必需的生

活品，牠雖已作工，但因這種無計畫無編制的勞動——石斧太多，生活品太少——牠當趨于滅亡。所以人類從初時起，不獨是必須工作，並且必須按照當時所呈現的慾望適當的比例去運用勞動；他們要防備一種勞動用得太多，另一種勞動用得太少。

因此人類從初時起就要作成一種計畫——即勞動的編制與分工。

最初的分工是兩性間的：即男子勞動與婦女勞動。可是還有一種分工，就是將一部分勞動應用於生產生活必需品上，另一部分勞動應用於生產工具上，如挖洞的木棍，石斧，和弓矢之類都是。

這種原則至今仍是有效的。現今的勞動並不是專用在生產生活品上，還有一部分是用在生產此等生活品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上。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這樣的編制也是必要的。勞動者對於勞動全收的要求不能夠解

作在社會主義中全部勞動只是用在消費資料上面的，牠必須和現在一樣，將一部分的社會勞動用在維持並再行生產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上面，並且用在發達因此所必需的科學等等上面。

我們由上面的陳述可以看出現今勞動高度發達所獲得的精細編制中最主要的特點，勞動雖仍表現欠缺的地方，但牠的偉大的堅實的結果是基於這種編制，至于此等特點在芽萌上是人類的勞動所固有的。

那種在最古的時代所必需的勞動編制是由共同生活的人類團體在自由平等之中實現出來的。我們在以後的講演中可以看出見古代日耳曼人民的團體是怎樣地共同據有耕地，森林和草原等等。馬克社員 (Markgenossen) 的會議決定耕種收穫的時期。人們依照共同利益的原則出來從事勞動。此等人的團體編制勞動十分合度，凡屬於他們慾望以內的東西，都按照當時社

會上和技術上做得到的方法，生產出來，而公共的福利就是他們生產的標準。

可是自古代原始的公有財產消滅，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一般據有生產工具的人遂將勞動編制的決定權攬入手中了。他們決定勞動的編制不復依照共同福利，共同慾望的要求，但依照他們自己的慾望，依照統治階級的慾望的要求。在奴隸制時代，蓄奴的主人曾經這樣做，在中古奴農奴工時代，地主也曾經這樣做，到了現代，資本家仍是這樣做。凡人類應用的東西，現在的資本家就去製造。每個資本家可以隨意製造任何種東西；沒有一個國家指定一個資本家應製造靴子，另一個資本家應製造衣服或同類的東西。

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沒有編制可言。然在實際上此等資本家也不能夠

任意從事製造，他們和從前一樣，總是以人類的消費為標準的。

從前蒙昧人的霍德中倘若生產了過多的石斧，與過少的生活品，這種過與不足的情形馬上會表現出來，牠即刻要將製造石斧的勞動減少，將生產生活品的勞動增加。在現今十分複雜的社會中，倘若生產了過多的靴子與衣服，固然不能即刻看出來，但這種情形終久是會表現的，並且還是由市面上的價格搖動與商業危機表現的。現在如果有何種商品得不到充分的購買者，——即賣不出去——牠的價格終會下降，於是製造家便知道這種商品的生產是超過消費量了。如果不將牠停止生產，不久會有商業危機出現，至于危機的範圍有僅涉于單個企業的，也有波及于商業界全體的。有了這種商業危機，生產便要減少，一直到過剩的商品售完，需要逐漸與消費復歸一致為止。所以就是在現代無限制的資本主義私有勞動之下，我們也看見有種種

力量使勞動總是要受消費的支配。但試將這種情形和從前的社會關係比較，特別是和馬克公社，(Markgenossenschaft) 中古的賦役農院經濟 (Frohnwirtschaft) 以及中古的手工業生產比較，其中有一種大差異，即當時的人預先估量了消費，並且預先依照這種估計去編制勞動。

同一的方法將以更大的規模表現于社會主義的經濟中。

反之，在現時的經濟中我們對於消費不能預先估量到；要于生產之後，商品在市場上出賣，消費才開始出現。因此對於消費沒有認識，即無計畫地從事生產，而以後的結果便是商業危機和工人失業。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商業危機要實現一個完全實在的目的：牠必須規定那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用計畫規定的東西，就是牠必須使生產適合于消費，使必要的勞動分配于全部生產的各單個部門中。

現在的勞動也是依照消費決定的，並且是假手于商業危機決定的，但危機是在完全笨拙的方法中，以絕大的犧牲來實現這種決定。因為牠每一次要犧牲幾十億已經創造的價值，毀滅大批有用的商品，牠每一次要壓制無數的工人，使他們在許多年中不能從事于經濟的向上的運動。

此外的每種生產形態與社會形態——如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和中古時代——在生產完成之前，已經具有有計畫的勞動編制，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在生產完成之後，才有勞動的編制，並且是因商業危機與崩潰勉強促成的。

還有一層：在原始共產主義之下，物品的消費和各種勞動服務公平的評價是相符合的。一般有勞動能力的人羣在他們的社團之內，共同勞動，而勞動的收入也是屬於他們大家的，至多是依照各單個人參加勞動是否重要的程度及所佔的份額。自普及社會出現以後，大多數人進乃然是共同勞動，

但勞動結果的最大部分都落入主人的手中了。現在的資本家和從前的蓄奴主人與封建領主一樣，對於勞動的收入攫取了最大的部分。這幾層人物首先滿足他們自己很優美的慾望；至于留下給大多數羣衆的東西，差不多常是不夠生活的。

但在實際上此等羣衆所具的慾望比起他們能夠滿足的慾望要大得多；我們如果能夠依照我們真正的慾望做去，那我們對於我們的住所，衣服，以及全部消費的措施當然要好得多，當然要愜意得多！

我們現在的勞動發達甚高，牠所產生的財富可以很豐富地滿足社會中每個人的慾望。只是現今勞動的基礎——即據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不允許這一着。我們如果像社會主義所志所願的一樣，將生產工具作爲公共財產，那勞動仍然和最初一樣，是社會的基礎，但牠又是有計畫的，又是在社會的

消費之前，預先配置好了的。消費一項比現在要豐富得多，並且要用統計和最完善的計畫加以測量，因此很有計畫地將勞動配置于一切部門中。

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一定能够縮短每日必需的勞動，使不及以前的一半。沒有一個人寄生在別人的勞動上，大家都是共同勞動的。但大家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與機會，足以隨意充分發展多多少少潛伏在每個人身上的精神能力與藝術能力。

這就是社會主義所有的勞動計畫與編制。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之下，大多數羣衆運用勞動創造一切東西，但他們對於這種勞動的財富差不多全沒有分，當營養品如山一般堆積在倉庫中並且生霉的時候，他們正在嗷嗷待哺，無所得食，當大批新製的衣服沒有銷路的時候，他們正是衣衫襤褸，不足蔽體，當他們建築廣廈連雲的時候，他們自己幾乎沒有住所足以避風雨，——

大家試將社會主義的措施與這種制度比較一下，每個人必定覺得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制度！

將來終有一日，羣衆對於這種『制度』的階級爭鬥會普遍而堅強起來，而社會主義的制度會由此建立起來，這是不着懷疑的。

到了那個時候，人類又回復到歡樂的經常的勞動活動上去了，但這個歷史的階段是很高的，要經過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最終的轉變，牠才能夠出現！

『那使一般民衆不僅相信能夠解除千百年來的痛苦，並且還能夠努力爭取這種解決的東西，就是生產力，就是他們的勞動奇異的生產力。』

第二講 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古代日耳曼的馬克

經濟 (Der Urkommunismus bis zur altgerm-

anischen Markwirtschaft)

我們在第一講中已經說明了，每個人的生存從初時起就是建築在勞動與社會這兩個重要的前提上面的。

縱觀人類過去的歷史，便認識原始人類的團體是些或大或小的羣，通常是用『霍德』這個名詞來指此等羣的。

我們現在追究此等霍德的起源不是由于何種原始人深思默想，但是由于

他們特別的組織能力。人類的子女依附母親與之同居的時期比任何動物要長久些，這已經是人類一種自然的特質。一對或許多對氏族男女(*tribe* *parents*)生下來的子女不獨小時同住在一起，即長大時也不分離，他們一直到某種數目為止，總是共同居住，共同努力維持他們的生活，而霍德就是這樣完全自然發生出來的。所以血緣的關係構成原始自然的第一種結合。野獸的羣——如狼羣猴羣等——也是由同一的方法發生出來的。

原始霍德人數的多少，自然不能絕對地確切指證出來。可是科學仍可從現今尚存在的蒙昧人的霍德的狀況抽出結論來。在菲力濱的澳洲土著的霍德，以及南非洲的霍德包含三十至四十人，也有包含五十至六十人，甚至于數目更多的。此等霍德人數的多少大致總以牠們所棲息的地帶出產豐富與否為轉移。當一處地方有多數可供獵取的野獸，或有大批可作養料的植

物，或有無數可以捕獲的魚類時，在此棲息的蒙昧霍德的人數便超過一百。我們從此等至今猶存的霍德的狀況可以斷定原始時代的霍德也曾包含三十至四十人。

人類在這個最低級的階段中的傳種自然是走了親族繁殖的道路。這就是說，關於男女的性交還沒有習慣律和道德律加以防閑，即在一切後代的血緣親屬中也是如此。當時的性交既沒有年齡的區別，也沒有尊卑的區別；只是公夫，公妻，公子女，到了後來，經過長期的發展，才逐漸排除這種親族繁殖，無倫次的性交，以及因此而起的紛亂。

第一步的規矩是在每個霍德內大體構成三級或三代。然這種區分的起源也不是由于矯揉造作的想像的模型，只是由于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中自然的過程。因為霍德中有一級成年的男子是以打獵和防禦為主要任務的——

有一部分年齡相等的婦女卽和他們相交接。在此等男女之上，有一級老年人，他們已經不適用於打獵與爭鬥，但爲風俗習慣的保持者，他們對於生活也具有有一種意義。在老年人與成年人這兩級之下，還有小孩子一級，他們既沒有達到性交的成熟之度，也沒有打獵與爭鬥的能力。中間一級包含此等小孩子的一切父親和母親；最高一級爲中級的父母，依照我們的稱呼，是爲霍德中的祖父母。

但第一種性交的規則是中級與上級斷絕交媾；此事只行于同級的男女之間。在同級中男女的性交起初是自由的，沒有限制的；這就是說，中級的一切男女在實際上互爲夫婦，卽上級的一切男女也是如此；不過一級的男女和另一級的男女行性交不復被允許罷了；至于下一級的小孩子還講不到要一種規則。

因為有了這第一種規則，那血緣最親切的性交——父母子女的性交——已經被排除了。

更進一步的規則是逐漸排除兄弟姊妹間的性交。這種限制開始于同母的子女的性交。

此等規則，對於一個霍德中的性交總是引起更大的困難。在零星的場所，一個霍德的男子或用和平交接的方法，或用搶劫的方法和另一霍德的女子，偶然發生性交，這是常有的事，因此親族繁殖的霍德得輸入新的血緣，可是現在按照此等規則，一個霍德的男女與其他霍德的男女發生性交成爲常規與必要了。于是血緣關係的範圍便愈推愈廣。同時此等有血緣關係的霍德發生了霍德的聯合。此等霍德的聯合，在生存的爭鬥中，和那些尙未結合的弱小的霍德相遇，便表現牠們強大的力量，牠們對於弱小的霍德，或

是予以驅逐，或是加以宰制。自此以後，在許多世代之中，男女的性交只行于霍德的聯合以內，于是血緣的結合十分狹隘，而道德律不能不要求每一個男子當向其他霍德的聯合取得他的配偶；因此血緣關係的範圍愈加推廣，一直達到相距甚遠的霍德中去了。

現在在這種複雜的關係之下，要能够除去那用酷罰或死刑所禁止的同血統的性交，便發生了所謂圖騰社(Totemgenossenschaft)，或同姓社(Genitilgenossenschaft)，或性社(Geschlechtsgenossenschaft)。在一切霍德中凡同母系血統的人即構成一個同姓社，每個社員除掉他個人的名字以外，還加上他的社的名稱作為識別的標記。在這種母系名稱的制度之下一個女子無論是因為搶劫或購買，出嫁或再醮，達到一個相距甚遠的霍德中，她如果遇到一個和她的社名相同的男子，這就是他們在母系裏面屬于一同姓社的

標記，因此他們不能發生性交。無論在那一個霍德中一個婦人所生的一切孩子終身都冠用母親的性社的名稱。

科學在半世紀之前對於此等圖騰社或同姓社沒有認識牠們正確的意義。現在已經證明牠們的真相恰如上所述，牠們原來只是表現同血統的人在同一名稱之下的結合，其用意是在使同血統人中性交的禁令得以實行。我們的同志科洛教授由他自己精深獨立的研究，對於這種關係闡發詳明，使人得益不淺。

現今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的形態都是由此等同姓社的狀況中逐漸發展出來的。然這些形態尤其是因財富與私產的出現而促進的，人們因為有了產業，便對於自己嫡出的後裔發生興趣，以為死後可將遺產傳給他們。

于是首先發展了一種家長制的家庭或大家庭，有一個家長站在領導的地

位，作全家的指揮者，和我們在聖經中所看見的家長阿布拉漢 (Abraham)，伊敘克 (Isaac)，和脊科浦 (Jacob) 一樣。在這樣的家庭構造中，起初還有多妻制的存在，不獨是父母及其親生的子女同在一起，即三四代的祖先和奴婢也同在一起。家長以無限的權力統治全家，家人生死之權都操在他的手中。此等大家庭在經濟上和從前的霍德一樣，代表自足的羣體組織，即所謂自足的家庭經濟，凡家中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都由自己生產出來。

由此等多妻制的大家庭逐漸構成一夫一妻制，進于較小的家庭，最後才達到我們現在的家庭。

此等單個的家庭又附着在鄉村自足的經濟單位上，即附着在馬克公社上面，在這種公社內，從前霍德的粗笨的原始共產主義已經發達成爲更高的馬

克共產主義 (Marxismus)。

所以我們現今婚姻生活的形態絕不是在一切時代中都如此的。牠們既不像聖經上所說的一樣，是由上帝在天國所創造的，也不是自然所賦予的，但是無限長久的發展的潮流中所形成的。牠們和一切人類的制度一樣，由出生而發育，而成熟，而衰老，而轉入新的形態中。

古代印度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傳說與神話以及古代日耳曼的傳奇界對於此等原始時代的婚姻關係都有回憶的紀述。在我們德國，我們從許多舊家庭的武器上或牠們的姓氏上還找得着圖騰獸，這種獸的名稱對於古代有血緣關係的性屬就是一種識別的標記。

此等舊的狀況還有一部分存留在現今的蒙昧人中，或者至少還有些痕跡在一切相類似的狀況中。集哥列人 (Nigamit) 的風俗至今猶尊母親為家

長，並冠用母親的姓氏。就是西班牙通常于應用他們父親的姓名外，還加上母親的姓氏，在瑞士和亞爾薩斯（Elsass）也有同樣的用法；蒙昧與發育時代的一切東西也影響于我們自己的狀況。

我們對於從前此等婚姻的形態自然不能僅因其不和我們對於婚姻與道德的觀念一致，遂簡簡單單地認為不道德。人類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中既自有其特別的生產關係與生活關係，所以他們對於道德也具有特別的觀念。現今的社會狀況與慾望中所發展出來的道德，自然不能夠出現于人類發展最低級的階段中。

此等霍德與霍德的聯合的經濟生活建築在原始共產主義上面。獵場與住所係公共的財產；獵取養料是在勞動公社中實行的。

分工原來是以兩性為標準的。

大家必須想到這個階段中的生活方法是，勇敢的男子挾着他們粗笨的武器，遊行遠方，以便獵取大小動物，作為食料。論體力，婦女也適于這種艱苦的獵人生活，她們也可和男子一樣，在山林與草原中獵取動物。可是婦女因為要生育與撫養小孩子的緣故，不能盡量從事于男子這種自由運動的生活，她們必須在另一種方法中去尋找她們的活動奏效的範圍。

大家必須想到，當時的人類還沒有農業，沒有牧畜，也取不到獸類的乳汁，作為小孩子的食品，以代替母乳，因此小孩子終年依賴母親所給的自然的養料，而婦女的生活和男子的生活比較，從初時起，就是流動的成分少，而固定的成分多。

婦女們帶着小孩子的隊伍，老年的人羣，並少數公共財產和器具，跟着打獵的男子前進，到了晚上雙方或者在一個曾經指定的住所相會。婦女在

靠近住所的地方，依照她們的方法作幫助維持生活的舉動。她們從森林，叢木和草原中採取種種可食的植物，植物根，漿果，昆蟲，各種小動物，以及有粉質的草子，她們是選擇此等產物豐富的地方的附近做住所的。她們用石磨將草子磨成粉末，再用火焙烤，至于這種火是由她們繼續保持，不令熄滅，這就是家中火爐的起點。

用火是人類一種無限重要的成功。倘若沒有這種有力的輔助物，他們對於結冰時代可怕的冬季，對於野獸及自然間一切狂風暴雨，怎樣支持得住！近代的兩極探險家當着兩極寒冷的冬季中，恃火爐為唯一的防護工具，大家一讀他們的紀述，便可以知道在地球史上結冰的大時代中，火對於人類是怎樣地重要。

人類初時得火，是由于接觸雷火，森林的野火，和火山噴火口的火。

但保持火種，挾火遠行，便是婦女的職務。當此等時代，火在洞中保持人類的生命，這種紀念仍存留在宗教的儀式中，在威斯達（Widya 譯者按此為羅馬的火神）前面處女所保持的永久不滅的火燄中，在天主教的永久不滅的燈光中，這種燈光是點在馬麗像前作為母親之愛的象徵的。

人類製作木石，可以產出火來；鑽木可以取火，擊石也可以取火。

婦女是菓實與植物的採取者，她們勞動的結果，發現種子的生殖，她們特將種子散播在地面上，以便由自己種植營養料。她們用尖頭の木棍將地面挖鬆，將成熟的種子散布其間，這就是農業的起點。著名的印第安人民狀況的研究家卡爾·斯台（Karl von den Steinen）教授在他著的中部巴西的自然人（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ens）一書第二百零六頁中說：『男子從事于打獵，同時婦女則發見田園的耕種。』

大家必須想到，男子到處因自然的狀況，使他們的打獵不復成爲營養料最重要的泉源，此事或起于一處地方動物的減少，或起于被強暴的霍德驅至荒涼之境，或起于與文化較高的人羣接觸而受其影響。在此事發生之處，婦女的勞動——即田園的耕種——便開始奪取打獵的地位，成爲此等人中營養料的主要泉源。婦女是這種最重要的營養料泉源的主人。她們所造成的勞動方法——從此時起社會的福利與疾苦即繫于這種方法上——可以使狹小的面積養活更多的人口。此時從散漫的舊霍德的關係中發展一個有組織的堅固的社會形態，在此形態中婦女是居領導地位的。這種經濟關係改變中社會的結果，是一個母系時代的出現，子女依母親而命名，而母權亦復伸張，在這個時代中，婦女是兩性和氏族的領袖，她們是裁判官和牧師，當時被創造而受祈禱的神也未嘗想像其爲男性，但都認爲女性。

民俗學已經在古代人民和現今自然人的風俗，習慣，歷史，傳說中把上述各種狀況的零星碎片告訴我們了。

婦女由採取菓實而達到農業，所以男子也由打獵而達到牧畜；他們開始將幾種野獸馴養成爲家畜。

沒有一個善良的神替人類創造馴良的動物，以供家用。但牧畜也不是出于精神上矯揉造作的想像，但只是由于經驗與日常生活的結果。

男子在打獵中時常遇着小獸的巢穴。他們一時高興將小獸帶回家中，以爲愉樂之品。有某幾種獸與人接近即表現馴良的樣子，人們于是可以將牠們畜養起來。在這種方法之中，人類便得到許多家畜了。起初只是零星的偶然的飼養此等家畜，到了後來習以爲常，便愈加繁殖，並且發達成爲一種牧畜的生活了。于是牧畜代替了原始的粗笨的打獵，而成爲營養料主要

的泉源，男子們的勞動集注於此，由是取得領導的地位。

最初飼養的獸類爲狗，豬，牛，鹿，山羊，鱖羊，到了後來才是馬。牛對於人尤其是一種勞動的伴侶，他們高度的發達，得牛的幫助非常之多。牛受人類的尊崇歷時甚久，並且常在宗教的儀式——如古代埃及人的——中反映出來了。

在這種牧畜生活狀況之下，人與畜牲的數目日見增加，他們不復能夠依照需要，遠適他方，到處逗留，取得養料，所以他們爲勢所迫而從事于農業上的改良，藉以維持他們自己和畜牲的生活。

可是畜牧對於農業的改良也有很大的幫助。從前一根挖地的尖頭棍進化成爲一張犁，用牛拖着。牛一旦加入耕種方面，農業便更進一步，成爲用犁與車經營的業務了。牛的拖力十分偉大，奴隸制的經濟基礎也是因此

形成的。因爲此時勞動所產生的結果，除掉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外，剩餘之量甚多，所以凡在戰爭中所獲的俘虜，從前作爲神的犧牲品或人的營養品的，現在都役使于田園勞動之中。農業從前本是婦女高貴的勞動，此刻降爲卑賤的奴隸勞動，而婦女自身畢竟也因此被奴隸了。于是母權消滅，男子變成社會中統治的分子。這就是和昂格思所稱的一樣，是『女性在世界史上的失敗』。

總觀人類的發展，他們在最低的階段時差不多還是一種獸，他們便挾着自己的力量，無知無識，無援無助地和自然界對抗，他們挾着原始的武器，只是一種打獵者，後來才由打獵者變成牧畜者，再由牧畜者變成農業者。

然大家不要把這種路綫的圖形加在一切地方的人類發展上面。自然關係對於經濟生活有重大的意義，這是我們所注重的。這種意義對於原始狀

況比對於後來和現今的狀況更爲重大，因爲到了後來，人類愈加能夠避去或抵抗自然界的困難。因此在一種面積狹小的羣島上自然不能有興盛的牧畜出現，打漁是此等地方的主要職業，是此等地方自然出現的經濟方法；在磽确的山地也不容易發生農業，就土性講，打獵與牧畜是此等山地上可能的主要職務。凡自然狀況不適于農業發生的地方，居民只能從打獵生活發達到牧畜生活，那便無從形成婦女的統治，無從形成所謂母權。婦女手中所發現的農業如果成爲人類主要營養品的部門，在此等地方有母權出現，這是民俗學的調查所證明的。然人類的發展大半經過農業的階段，特別是歐洲人，尤以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爲最著，所以我們對於人類最初發展的途徑可以大略定下一個方式，爲：獵者——牧人——農民。

打獵與牧畜的人民還不知道農業，也沒有一定的住所，約二千年前，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中的一小部分現仍用他們自己的克爾特言語，保持他們民族的習慣，每年並且慶祝他們民族的紀念。斯確特 (Walter Scott) 在他的小說中已經用詩的方法，把蘇格蘭的克爾特人共產主義的民族團體及其與壓迫者英格蘭人（即安格爾撒克遜人和諾曼人混合的人民）的爭鬥描寫給我們看了。

比利時人——比利時地方是由這種人的名稱而得名，也是克爾特人。他們後來為日耳曼的佛蘭克人 (Franken) 強大的人羣所排擠，後者佔據更肥沃的低地，將比利時人驅入磽确的阿登倫荒野 (Ardennenwildnisse)。日耳曼人稱比利時人為瓦洛人 (Wallonen)。

日耳曼人在多惱河及南部德意志也有同樣的舉動，他們將克爾特人驅到寒冷貧瘠的高山谷中去了。在阿爾卑山中也留下瓦爾興湖 (Walchensee) 和瓦倫湖 (Valencee) 的名稱。因為日耳曼人普通稱克爾特人以及羅曼

人 (Romanen) 爲瓦倫人 (Valen)，爲瓦利人 (Walische)，爲威爾施人 (Wälische)。

就是在南部德意志，也還有各種克爾特的成分保持着。他們內中的一

族名博葉 (Bojer) 在極古的時代即建設了列根堡 (Regensburg) 與帕沙 (Passau) 兩個城市。當紀元前四百年，他們超過阿爾卑山，據有上部意大利，而以現今的波洛格拉 (Bolotna) 爲他們的首都，到了後來，他們才被新興的羅馬逐出意大利。這種博葉人畢竟牢牢地佔據撥門 (Böhmen)，此處和擺陽 (Bayern) 是由他們命名的。當紀元後幾百年之間，在人民的遷徙中，他們爲匈奴所兼併而解體。他們和阿蛙人 (Avaren) 混合，遂構成博耶蛙人 (Bojavaren) 這個名稱，後來在多瑙河獲得勝利的日耳曼人採用此名，在巴約蛙 (Bajuvaren) 與擺陽此名稱是保持着的。

凡日耳曼人的前鋒與克爾特人的後衛相接觸之處，衝突和爭鬥即相繼出現——當許多霍德與氏族不能保持牠們相傳下來的一定地帶時，爲着草原而起的衝突與爭鬥即成爲現今游牧民中的家常便飯。

在日耳曼人之後，又來了斯拉夫人(Slawen)。他們在德意志地方直達到亞爾伯河，於是沿薩列河(Saale)至撥門，並且經過中部與上部薩列河，直達圖靈根(Türingen)和佛蘭克森林(Frankenwald)的部分，至梅恩河(Main)爲止。薩列流域好些殘廢的城堡就是後來日耳曼人爲防止斯拉夫人再行侵入，或爲宰制他們而建築的要塞防禦線的遺蹟。

這樣的遷徙以及後來的定居不僅在現今的德意志，在現今的歐洲是如此，即在印度的全部古代人民，埃及和巴比倫古代有文化的人民，猶太人以及希臘人羅馬人的先驅都以游牧人的資格轉徙各地，他們或者和克爾特

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樣，是從同一地方而來的。我們基于比較的言語學的理由而達到這種主張。古代的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克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爲亞利安族 (Arischer Stamm) 的人民，他們構成一種唯一的原始人民，名爲印度日耳曼人 (Indogermanen)，其原始的佳所在亞細亞，這是可能的。

此等人民在遷徙中，最後遇着海洋，或不能超越的山嶺，或不能渡過的河流，便構成一種天然的障礙物，使他們不能再向前進。但他們也不能够退轉去，因爲新的隊伍總是在後面跟着來了。他們侷促于這種自然的有限的位置中，感受壓迫，必須改變他們的生活方法，他們于是愈加趨于土著而從事于農業，所以後來一個很小的地帶能夠養活他們。

在歐洲 在希臘和意大利的人民迫而趨于土著之前，聖經上所紀述的

埃及人，巴比倫人，和猶太人早已有一定的住所了。當紀元的初葉，我們的祖先還是粗笨的野蠻人，他們擁入西部德意志，因此才出現于歷史的舞台上，然當時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久已達到一種高度的文化，發展了優美的美術，科學，哲學，醫學，彫刻術，詩歌和音樂，此等東西至今仍爲世所稱頌。在幾千年之前，此等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祖先也是游牧的人民，他們也是帶着畜羣到處尋找草原的。

此等地方的南部自然的產物豐富，或者因此阻止了他們的遷徙，使他們很迅速地成爲土著了。但新的隊伍既不斷地擁入這三面環海的狹小地帶，那無論此等地方的物產怎樣豐富，對於游牧的生活終覺不夠，棲息于此處的人民必須取那在巴比倫，埃及，印度等處久已取了的步驟：即捨棄飄蕩的生活而成爲土著。

土著與游牧比較，便呈出一個完全不同的進步的基礎。在牧畜業之下，雖歷千百年之久，一切情形仍舊無所改變：人們挾着家畜到處遷徙，自然界供給他們什麼東西，他們就心滿意足地接受，無復牠求。但在土著之中，他們必須在一處較小的土地上去求維持他們的生活，必須爲此目的而與自然界爭鬥，藉以取得自然界未嘗自由自在生長出來的東西；所以他們必須絞盡腦漿以求經濟的發展，同時又因此而促成全部社會關係的發展。

當希臘與意大利已經進于土著時，歐洲在經濟上和文化上便有兩種爲生產形態所分離的人民：即土著的農民與游牧的人民。這兩個文化的階段互相對抗，所以在兩者交界地方的人民差不多時常作劇烈的爭鬥。游牧的人民力求侵疆越界，而土著的人民則盡力加以阻止。就大體講，這種文化的界綫是好好保持住的。歷史上固然告訴我們，克爾特游牧的霍德一時侵入

羅馬，甚至于侵入希臘和小亞細亞；但此等隊伍不是被殲滅，就是爲文化所吸收，而改爲土著。

一切遊牧的人民逼近這種文化的界線，不能更向前進，但因後面又來了遊牧的人民，也不能更向後退，他們的經濟方法必定使之愈加適合于土著，這是人類發展中自然的途徑。所以在歐洲文化的防禦線總是由南方向北方推進的。約二千年前有文化的羅馬國的界線畢竟擴充到萊因河與多瑙河。此等河流的西部與南部是爲文化和土著之區，而北部與東部是爲極大的遊牧之區，這個區域，包含全部德意志，一直達到俄羅斯的草原和亞細亞的高原。在以後幾百年中，從這個區域出來許多尚不爲人所知道的人羣向西方遷徙。

羅馬帝國爲保護牠的疆界，防止日耳曼人的侵襲起見，從一世紀末年

起，開始建築一種強固的分界線，這種『柵欄』的巨大工程係從萊因河的紐維德 (Neuwied) 起至多惱河的列根堡止，此工程的遺跡至今猶存在。這種防禦物幾百年來未被敵人攻破，計長五百五十啟羅米突；牠有一千個守望樓，和九十個不同的大城堡是用羅馬最精銳的步騎兵防守的。還有一大批城堡——亞蘭布萊斯台 (Ehrenbreitstein)，寬恩 (Köln)，獨慈 (Deutz)，殘頓 (Xantou)，哈爾脫 (Haltern)——鞏固了萊因河以下至北海 (Nordsee) 一帶的地方。

在西方既有羅馬的勢力，在東方又有繼續跟踪而至的人民，日耳曼人實逼處此，乃不得不由游牧而趨于土著。這種改變開始于德意志的南部與西部，經過無數途徑而達於中部與東部，他們對於游牧的舊風俗習慣作劇烈的爭鬥，然經過好幾世代，此等風俗習慣才被新的關係掃除乾淨。

但是到了四世紀的末年，又有一種絕大的人民遷徙的事出現。這一回是東方的匈奴人，阿蛙人，和韃靼人，他們在兩百年之間，足跡徧羅馬帝國，並且直達到非洲。同時日耳曼人要求新土地與財富的慾望日趨堅強，而羅馬因經濟關係的敗壞——我們在後面將討論這一點——牠的抵抗力日趨薄弱，牠的疆界不復能夠保持，日耳曼人遂侵入現今的巴登 (Baden) 和魚田柏格 (Württemberg)，至四〇七年他們越過阿柏海恩 (Oberrhein) 向格利斯托斯 (Christus) 進發，而東方的野蠻人民開始侵入歐洲南部與西部的一切疆界中，這就是我們用『人民遷徙』(Völkerwanderung) 這個名詞所指的一樁大事。高度發達的舊羅馬帝國因此傾覆於勝利者不發達的關係中了。

我們于看過日耳曼人遷徙的歷史以後，特轉到他們的經濟關係的特點上去。前世紀有一批學者的工作就是研究他們此等關係。但關於我們祖先

最古的事蹟的紀述仍出於希臘，羅馬的著作家之手，因為當時此等人民因商業和戰爭的關係而與日耳曼人接觸，得親眼看見後者的狀況，以供其記錄。

凱薩 (Julius Cæsar) 大將就是此等著作家中的一人。他是第一個帶領軍隊超過萊因河，侵入德意志的羅馬人，他和萊因河左岸以至北海的一切人民戰爭八年，獲得勝利，並且統率一個艦隊前往不列顛尼 (Britannia)——即現今的英格蘭——在該處降伏了克爾特人。他在紀元前五十八年所著的迦里戰爭 (Der Gallische Krieg) 一書中記載他的行軍事件，兼及於日耳曼人的狀況。另外還有一個著作家——達細托斯 (Tacitus)——在紀元後九十八年著日耳曼尼 (Germania) 一書，也把日耳曼人的狀況告訴我們了。

當羅馬的著作家將日耳曼人的情形記載出來的時候，他們自己中間的母

語，以及其最古之書，其下，多要詞乃有幾字句，且一夫一妻而起單獨的家庭。

也已經從原始的性的關係中產生出來了。即日耳曼人也不復是遊牧的人民，但他們寄居之所還不十分固定，他們所有的土地仍是純粹共產主義的產業。

當凱薩之時——和他所報告的一樣——每一個共同居住的公社是共同從事於那業已出現的農業，並不將土地分開來。一切人都能享有農產物。

反之，在一百五十年以後著書的達細托斯只說及單個的家庭耕種土地，然此等家庭還沒有把土地看作財產，僅認此為終身享用的利益。可是我們要注意，在這一百五十年進程中，已經由純粹共產主義的土地使用而轉入私人的土地使用上去了。後來為提高農業的效能起見，又必須由這種私人的土地使用而逐漸發展為純粹的私有財產。

日耳曼人結成部落 (Völkerschaf'ten) 或氏族，而每一氏族據有一大塊

土地。此等氏族將從前圖騰聯合或同姓聯合的支派集合攏來，數以百計。一種有血緣關係的人每次共同據有一定的地方——一種馬克——即安居樂業於其上，這就是他們的土著起源的情形。

後來的鄉村是從上述的土著發生出來的。只有在德意志的零星部分，如在山地，在萊因地方，在阿登森林 (Odenwald)，在黑林 (Schwarzwald) 的各部分，在下撒克遜 (Niedersachsen) 日耳曼人才是散居的。但在他們所據有的德意志一切地方上，他們土著的模範的原則還是馬克公社。

這種馬克經濟的基礎是，凡在牠的界限內的森林，草原，小溪，川河，池塘，湖沼，田園，道路，和橋梁等都為公共的所有物。牠的界線是依森林，山脈，河流及湖沼自然的形勢而構成的。每個家庭對於土地所首先分得的是建築住所的地方，每個人可以隨意選擇他所中意的地方做住所。關

於土地的耕種，最初是經營野草的田園經濟 (Wilde Feldgraswirtschaft)，後來才發展三田制經濟 (Dreifelderwirtschaft)。即將一切農地分爲三大分，在一年之中，一分定爲夏季的播種，一分定爲冬季的播種，一分留着不用，以舒地力。

這種三田制的編制出現於德意志，俄羅斯，瑞典，丹麥，和法蘭西等處。在俄羅斯的大部分地方，此制至今仍保持着，在德意志，當十九世紀過了許多時候，牠仍是蓬蓬勃勃存在的。

每一種田又依照馬克中所住的家數再分爲若干小分，用抽籤的方法分配每家應有的農地。自從日耳曼的時代以來，我們得着『籤配地產』 (Losgalt) 這個名詞，這是住所地及其所屬的農地。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够比別個人長久享得肥沃土地的利益，或靠近住所的土地的利益，每年是要用籤重新

分配土地的。所以這種地方的一切家庭是輪流享用一切農地。

馬克的耕地經過這種劃分，變成無數縱橫方格形的小農地：即所謂綜錯的地形（Gemengelage）。鄉村的農場至今猶表現這種圖形；德意志的大部分地方近來才被所謂『成圓運動』（Arrondierungsbestrebungen）把這些小塊廢除了。

在最古的歷史時代，土地是在原始的親屬共產主義（Sippenkommunismus）和家庭共產主義（Familienkommunismus）中耕種的。當土地已經達到歸私人單獨使用的時候，馬克社員便在公共會議中決定他們必須於何時耕地，何時下種，何時收穫。這種共同的預備手段即所謂『田園的強制』（Flurzwang），這是土地成爲無數縱橫方格形的結果，這是綜錯的地形的結果。即田園中沒有寬廣路線的結果。當一個人已經播種了他的土地，另一

個人打算播種，或者當一個人還沒有割下他的五穀，另一個人就要將他的五穀送回家去，這都是不成的，因為每個人要達到他的單個的農場上，他必須經過別人的農場。

一切馬克社員固然據有同等的土地使用權，但他們負有及時耕種的義務。所有田園於下種後將圍以柵欄，在防外人或畜牲的踐踏，迨收穫後此等柵欄又被除去。這就是指此處的土地當荒廢一年以舒地力，同時並開放作為牧場。

在這種方法中經營的土地稱為分配的馬克。此外還有公共的或不分配的馬克：如草原，森林，沼澤，水道，以及一切在原始時代不能分割的公共財產都是。當人口增加，開闢土地成為必要時，此等地帶便可作為開墾之用，否則每個馬克社員也具有漁獵與採取木林的同等權利，又公共的畜羣由

公共的牧人牧於此處和荒蕪的田園中，那更是自然的。

除此以外，有一個馬克鐵匠，一個馬克陶工，一個馬克磨粉匠，他們是爲全體社員而勞動的，他們即因此取得生活品的報酬。又馬克社員對於社中巨大的勞動，如建屋等等是互相幫助的。

關於公共的事務如立法，行政，以及馬克的全部法律事務，是由成年人的公民會議決定的。他們選一個馬克首長站在他們的上面，監視公共議決的執行，並且按時向會議提出一種新選舉。會議又處理一切經濟問題和馬克的管理。牠決定土地的耕種收穫的時期。牠決定收穫的次序，規劃土地的編制籬笆與開放爲牧場，選舉馬克的職員，牧人，田園的看守者，並且監察他們職務的執行。

這種公民會議又是最高級的法院，牠解釋法律，並且處罰違犯馬克規章

的人。例如在火險或水險中放棄救助的義務，放棄依常規耕種土地的義務，侵犯他人或另一馬克的田園與籬笆，都是違法的。

關於處罰，多是屬於道德方面的，例如在會議中將罪案暴露出來，對於重罪，則令犯者遊行示衆，有時還將一隻生癩瘡的狗放在犯人的手臂上。

這樣處罰的方法一直到中古時代猶保存着，只是逐漸依犯罪的種類，而以負繩，棍，箠，車軸，犁輪等等作為道德上暴露罪案的處罰。

每一個馬克對於牠的社員侵犯另一馬克的財產或另一人的生命，是共同負責的。牠負有懲罰犯人與賠償損失的責任。

所以馬克對於牠的一切事務的處理與編制是完全民主主義的。關於服從規章，關於一切糾紛與爭議，除掉當事人外，取決於全體自由平等的人。

每一個馬克又在這種基礎上構成一個戰爭的團體，處理征戰與防禦的事務。按照古代日耳曼軍隊的組織，在戰爭中總是血統最親的人站在前後左右作戰，所以靠近每一個戰鬥員的人關係最爲密切，由此可以引起他們最大的勇氣與犧牲。每次戰爭中的軍事領袖是由公共會議中選舉的。至於軍事中的等級與職務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勇敢與能幹。

這種軍隊的組織既是民主主義的，而每個戰鬥員的體力與道德力又能升至最高點，就是羅馬十分高妙的戰術也抵不過粗魯的日耳曼的軍隊，羅馬是爲着征服日耳曼，特在那被牠佔據的迦里布防的。

每一個克馬又按戰爭的團體的方法，組織一個宗教的團體，崇拜鄉村的諸神。霍德時代的神具有保護打獵者和牧畜者的一切特質，到了土著的時候，他們又變爲具有保護田園和馬克公社措施的馬克神與鄉村神了。後來

因基督教輸入，由馬克而變成現今的教區鄉村，由馬克的祖神（*Mark-Ahnengötter*）而構成基督教保護教區的神。

這種研究使我們認識古代日耳曼的馬克公社是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小集團。一個馬克在經濟上是一種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生產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大家在共同的土地和設備上生產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至於與外界作交易的事是未嘗出現的。在這種制度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利用別人而致富，但每個人必須盡他自己勞動的義務。

馬克在政治上是代表一種獨立的小共和制，一切人民都是自由平等的，

所以佛萊達格（*Gustav Freytag*）在他的德意志過去的形象（*Bildern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第一卷七十二頁中對於古代日耳曼人能夠作下列的紀述：

「……他和馬克社員聯合，飼養他的畜牲，耕種他的田園，爲他的馬克的權利而奮鬥，以住所所有人的資格在法律場所主張權利，選舉首長，在人民會議中發表主張，參加軍隊的檢閱，在軍隊出發之前用他的武器扛起被選的軍事領袖。」

這種政治的平等完全是經濟生活平等的自然結果。在經濟方面既沒有宰制者與被壓迫者，所以在政治方面也沒有統治者與喪失權利者。自由與平等——即社會的民主主義——原來發生於日耳曼的森林中，在近世社會主義更高的階段中這種東西也正是我們所努力爭取的目標。

德意志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公共財產至今猶有殘存的。在萊因地方，

黑森，(Hessen) 圖靈根，和黑林，尚有許多公社存在，牠們有公共的大森林，公共的大草原，以及被分配而仍爲公有的土地。在好些鄉村中，粉

磨，焙麵包的火爐以及屠宰場猶保存爲農民公共的所有物。現在人民的意識上也有一種精神的遺蹟，他們覺得一切森林都是公物，每個人可以在此中採取殘枝敗葉，菌笋漿果之類，不過在道德上負有不過于剪伐敗壞森林的義務罷了。還有一般竊取魚鳥等物的人在意識上也深深覺得野的動物都是公物。凡此種種都是土地共有和產物共有時代的遺蹟。

現在便發生了以下的問題：人類社會在這種平等位置上的發展爲什麼沒有保持下去？人種爲什麼陷于不平等與階級爭鬥之中，致使我們現在要假手于社會主義的運動，去爭取我們的祖先原始遺傳物的享樂？古代的馬克組織爲什麼消滅了，並且是怎樣消滅的？

普通歷史上所慣用的一種解釋是，公有財產後來被武力推翻了，特別是被抱有個人目的侵入當地的軍事領袖的勢力推翻了。

單個的握權者的武力對於不平等的造成，常有重大的關係，這是沒有疑義的，雖是這樣，但僅僅回溯到武力上去的解釋是不夠的。在武力成爲革命工具之處，這種武力自身的起源，顯然也需要解釋。在本來民主主義的關係中怎樣會發生第一批有權力的人出來，這是必須加以說明的。我們于是說道，在舊關係自身的內部必定發生了一些原因與變遷，遂使有權力者的出現一事成爲可能的了。

人類慾望的增進也永久引起變化的原因。

日耳曼人在土著的安逸狀態之下，人口馬上蕃殖起來了，于是狹小的土地與原始的耕種方法畢竟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此外，他們和高等文化的羅馬人相接觸，遂將他們一般的慾望程度提高了。他們必須從地面上多多取得產物，他們必須用心耕種土地。想達到這種目的，對於各個人所分得

的土地，必須時常增大其處置土地的權力。最初是每年分配土地一次，後來延至三年一次、六年一次，九年一次，十五年一次；到最後，分配土地的事完全消滅了。從前用籤分配的土地因此變成私產，這真正是由農業不發達的階段中發展出來的，這真正是由必要中發生出來的。

此外，人民對於沒有分配的馬克的開墾權，使用得愈多了。一個人在一定的時期中從森林中開墾出來的農地都得視為私產。可是私有財產一經出現，不平均的現象自然也即刻跟着來了，因為各個人的能力與經濟的推動力既不相同，而每個家庭所供給的勞動力的大小又復相異，其所得的結果自然是不一致的。這種不平均的現象更因出買權，贈予權和承繼權而推廣了；總之，一經踏入私有財產的道路，社會中自然永久表現有出連阡陌的，有地無立錐的，有在經濟上獨立的，也有在經濟上倚賴的。

原始的馬克因人口增加的緣故，在距離較遠的適宜的地方建設所謂子女馬克（Tochtermarken）。但此等子女馬克從初時起在獨立管理方面即沒有老馬克那樣充分的權力，牠們頗處于倚賴的地位，和我們現今鄉下不重要的鄉村與教堂鄉村的關係有點相像。在這種舊馬克中法律上的不平等畢竟也開始出現，因為馬克首長的選舉和土地的分配一樣，也延長期限了。後來這種職務變成終身的，終久成爲世襲的，當馬克首長死後，即傳位于他的長子。此等享有世襲權的家庭在法律上和權力上遂到處超過平常的馬克社員了。

此等起首的變遷在發展的進程中逐漸變爲常態，而自由的舊馬克滅亡的種子已經潛伏于其中。在日耳曼和羅馬方面經濟發展中所表現的進一步的現象是日耳曼人畢竟征服了羅馬帝國，然遠東如潮水一般洶湧的蠻族遷徙逼

迫一切日耳曼人形成一種不可抵抗的運動，此事是有助於他們的南征的。此等戰爭時期使日耳曼人造成永久的軍事領袖。這種職務也和馬克首長的職務一樣，即刻成爲終身的，後來且進爲世襲的了。當馬克首長如果不是一身兼任這兩項要職時，那他的旁邊便有一個新的享特權的領袖出現；於是又發生了世襲的公爵的榮譽。這個曾經由自由選舉產出的領袖統帶軍隊，變成統帶，而統帶（*Herrsch*）這個名詞就是後來所指的公爵；此名稱是由軍事的職務中發生出來的。一般因此出現的領袖起初利用他們的權力，將戰爭中所獲得的土地的大部分攫爲己有，後來竟漸漸地將自由的舊馬克的土地也據爲私物了。此外，天主教的教會在時代的推移中也知道首先將一切財富，尤其是大批公共的土地，攫爲己有。

這種全部革命的開始及其內部的規律是必然形成的，因爲在舊生產關係

的範圍中，那業已出現的社會慾望是不復能夠滿足的。在這種情形出現之處，馬克共產主義必定是或遲或速地傾覆下來。這種主義必定轉入私有財產的途徑，並且終久因此陷于不平等，統治與剝削的景況中。至于因平等消滅而發生的剝削將取何種形態，這是以舊關係顛覆中歷史的時代狀況的總和為轉移的。在日耳曼人中是轉變為奴農奴工制，在希臘和羅馬為時甚早——則轉變為奴隸制。

原始共產主義的關係不僅是曾出現于德意志，還出現于希臘，羅馬，並且在一定的發展上，出現于一切人民中，和我們的一個研究者所說的一樣，「從印度到愛爾蘭」都有牠們的形影。

在俄羅斯大部分地方的斯拉夫人中，完全的鄉村土地公產至今猶有一部
子書呆字音內。至歐洲內另一方面，即任西班牙的邊境上特別是任法蘭西

的邊境上的屈倫友人 (Rybnan) 中有莊租屋自由 (莊租業) 不
爾維亞的插居洛加 (Serbische Zadruga) 數代相依的親屬組織 (Verwands-
 chaftsorganisation) 中有公共的土地產業和自然經濟的共產主義，在南部提
洛耳 (Tirol)，英格蘭，以及斯堪的拉維各地，在一切名稱上還有這一類的
 遺蹟。昂格思在杜爾靈的科學革命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第一百四十頁中說：

『一切有文化的人民原來都以土地為公有財產。當他們超過了
 原始的階段，在農業發展的進程中，這種公有財產變成了生產的
 桎梏。經過了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之後，這種財產便轉變為私
 有財產了。』

可是在馬克共產主義之前，還有原始時代的共產主義，即建築在最原始

的打獵，牧畜以及最簡陋的農業初步上面的共產主義。關於馬克公此已經有文書上的證據，就是那最古的形態也可于現今蒙昧人民的好些狀況中反映出來，因為在他們中間常有最原始的共產主義的存在。

在人類的幼稚時代，這種有干禁令的共產主義曾經普遍地存在，這雖有事實的證明，但各學校基于種種十分透明的理由，至今未嘗將此事昭示學生。近世工人運動盡力之所能及，使一般人民知道古代這種狀況，藉以補救國民教育的缺點，這便是牠的一種功績了。

第三講 古代社會的奴隸經濟 (Die auf Skla-

verei begründete Wirtschaft der antiken Ge-
sellschaft)

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的勞動在根本上和其他動物的大有區別：人類的勞動是有意識的，他們的腦袋中具有工作的目的，並且藉他們自己造成的工具去實現這種目的。我們又知道，這種勞動是在人類的共同生活中——即在社會中——實現的。最初的人類在無限長久的時期中是生息于打獵的原始的霍德共產主義裏面。他們後來由這種獵人生活更進一步，達到游牧生活，由此

又再進而趨于農業與土著了。當他們成爲比較進步的農民時，他們即構成永久的農業集團，——例如馬克公社之類，（但在自然條件不允許有這種步驟的地方是除外的，）——除掉打獵外，便以農業勞動維持他們的生活。在馬裏面，原始共產主義達到最完備的地步。

但是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達到一定的階段，即成爲向前發展的障礙物。在這種情形出現之處，此等生產關係必定或遲或速地消滅下去，而代以一種更高的生產形態。原始共產主義必然解體而轉入私有經濟，這種私有經濟——像我們在古代日耳曼人的形態中所看見的一樣——便流于經濟的與政治的不平等。一切地方的原始共產主義以及立足于此主義上面的自由平等都以類似日耳曼人中的原因而崩潰，因此使階級社會與剝削應運而生。

在階級社會與剝削之下的發展比在原始共產主義之下要快得多，有力得

多。但最大多數的人類變成被剝削者，自此以後，他們永不能充分享受逐漸增加的財富和文化！在私有財產之下，從古至今一切經濟的和文化的收穫過量地流入統治階級的懷中去了。因此人類的歷史不復是從前低級或高級人類集團最和諧的勞動互助的歷史，但是——和共產黨宣言(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所說的一樣——各種對抗階級互相爭鬥的歷史，至于此等階級爭鬥因當時剝削關係的性質，具有特別的形態與意義，以度過其歷史的命運。

自古至今有三種主要的剝削形態，即奴隸制，奴農奴工制，與現今自由的工資勞動制。

我們在第二講描寫古代日耳曼人的狀況中，已經將人類發展的進程推到四世紀末年來了，當着這個時期，日耳曼人內部的狀況已經開始產生奴農奴

工制，而外部的情形更有助於此制的發展，因為他們在人民大遷徙之下，侵入羅馬帝國，使後者的文化顛覆，而返轉到幾百年前的狀況中去了。

我們在第二講中又曾提及過，在日耳曼粗蠻好鬥的打獵氏族和牧畜氏族來到西部德意志之前——也許在千年以前——希臘，羅馬的遊牧的祖先即侵入現今的希臘和意大利，戰勝此等地方——起初在希臘——舊有的居民，而成爲統治者。大家可以說，那使希臘人勝過舊有居民的特別情形，就是前者所據有的馬匹。希臘人出現於歷史上遠在紀元前一千年以上。希臘的傳奇詩人荷馬（Homer）約生于紀元前一千年的時代，在他的伊利阿德（Iliad）和阿笛色（Odyssey）中將古代希臘的英雄及其奪取疆土的爭鬥活潑潑地描寫出來了。

當我們日耳曼人仍在野蠻階段的時代，希臘人與羅馬人達到高度文化之

域已經有好幾百年了，他們度一種豐富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說，他們是度一種近世的生活。當時商業興盛，交通發達，並且還有一種手工業的商品生產，此外，藝術與科學也盛極一時。

但這種高度文化的基礎——即經濟生活——是建築在奴隸勞動上面的。現在的統治階級是讓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去擔任一切必需的勞動，而當時的統治階級則讓奴隸去擔任一切必需的勞動。特別是在羅馬的世界帝國中，貨幣經濟的關係和大城市的關係非常發達，除掉幾種限制外，我們已經可以說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

然在另一方面，我們說：兩者間決絕的異點已經在勞動的形態與報酬上確定了。現在的資本家與勞動者在形態上是互相對峙的自由人。資本家據有生產工具和原料，這是他們的財產，勞動者只有自己的勞動力。資本

家末了又據有創造的生產物作爲他們的財產，因爲他們對於生產工具和原料所必需的勞動力是當作一種商品買進來的。

反之，古代的『資本家』令奴隸去擔負一切勞動，奴隸恰和死的生產工具一樣，都是他們的物質的財產。所有創造的生產物都屬於他們，因爲作工的人是屬於他們的。近世的勞動者要在『自由』契約的基礎上，取得工資，才從事勞動，但完全沒有法律地位的不自由的奴隸在直接的身體壓迫之下，只要能維持生活，即須從事勞動。所以在近世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變成商品，自由出賣，並且獲得金錢的報酬，此事表現資本主義的性質，比在古代的『資本主義』中要顯明得多。

但古代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最重大的異點還在當時沒有機器，可以呈出現今種種龐大的現象。當時的商品交易與國際交通大概只限

于地中海沿岸的各地，這種商業在當時的狀況中雖已經是非常重要的，然和現在比較，要算是微小極了。

在古代陸上的交通只能行于大路上，海面的交通只有有槳的船和帆船，交通既十分艱難，所以在交易上的物品，只能限于下列兩個條件以內的：第一，牠們可以經過長久的運輸而不致損壞；第二，牠們的價值甚高，可以再加入高額的運費，仍然獲得一種利潤。生產物要能適合此等條件，便不十分是羣衆的日用品，但只是富人的奢侈品：如貴金屬，貴重木材，金屬器，美術陶器之類。至于一般人民所用的東西，除掉穀類以外，所餘無幾了。

我們對於馬克經濟既已經考察過，在對於奴隸經濟的特點也要加以研究。

奴隸制是首先出現的剝削形態，因此牠也是最古的剝削形態，有人告訴

我們說，牠的起源是由于人們將戰爭中的俘虜作為奴隸。我們仔細思索一下，覺得這種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恰和那種認破壞古代馬克共產主義的私有財產僅源于武力的解釋是一樣的。我們在此處和在那處一樣，必須搜出更深一層的理由，我們要問：在最初的時候，戰爭中的俘虜為什麼沒有被作為奴隸？在生疏的霍德與霍德聯合中，在各不相連屬的社會中，從最初時起，就因奪取婦女，財富，獵場和草原而發生爭鬥與戰事。人們在發展最低的階段中，為什麼要殺戮降服的敵人，作為食品，或神的祭品，不將他們變作奴隸呢？

當勞動還沒有發達，只够維持勞動者和屬於霍德的人每日赤條條的生活的時候，役使外人是絲毫沒有意義的。他們對於戰勝的霍德或氏族絕無幫助，並且還是一種危險與擔負，所以在這種發展最低的階段中，只好簡簡單單

單用殺戮去對付他們。但是當勞動一經進步，當農業牧畜和初步手工業部門的分工一經發達，每個人所生產的物品超過他的需要的數量以上，於是將降服的敵人驅入勞動中，便可加以剝削，這是有利益的。當農業經濟與土著愈加發達，這種剝削的可能性便愈加強大，而奴隸制也因此開始了。在打獵人民與牧畜人民中，據調查所得，他們幾乎沒有蓄養奴隸。在遊牧的經濟中，奴隸的用處是很有限的。

當人類在發展最低級的階段中，他們覺得他們的物質利益是在將一切不屬於他們的團體以內的生人驅出他們的棲息地帶之外，當戰爭時，則盡量發洩他們最橫暴的熱情，對於敵人，一律加以毀滅，但是當他們進於農業的階段，他們便覺得他們的利益是在控制他們這種熱情。當他們看見讓戰敗的敵人活着，從事勞動，是有利益的時候，他們那種最橫暴的報復心即被抑

制下去了。武力與戰爭使戰敗的俘虜作爲奴隸，但在實際上，兩者只是到奴隸制的方法，不是奴隸制的原因，此等原因是具有經濟的性質！我們總要於經濟關係的發展中，或——這也是一樣——於勞動的發展中去找社會變遷最後的理由。勞動第一種大進步起於農業與土著中，在當時歷史的整個關係之下，這種進步必然引起奴隸制的思想，而戰爭又助成這種思想的實現。

戰勝者不獨是將戰敗者帶回家中做奴隸，使之作工，並且還將他們置諸戰勝者的公社社員之列，不過他們是沒有法律地位的；還有些戰事的發生是爲着要奪取土地，役使其人民從事農業，藉以達到剝削的目的。

此事在政治上——在建立國家的意義上——也自有其結果。從前社會的構成不超過血緣結合的範圍以外。但此時所發生的組織却包含有血統，文化，習俗完全不同的氏族。於是國家起來了。戰勝者以統治階級的資格

從事防範的工作。他們握有政治的權力，用立法和司法去屈服被治者，並且享有後者的勞動：於是階級社會出現，其中有統治者與被治者，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階級社會既經出現，牠的分裂與不平等總是日趨複雜的。

歷史告訴我們，現今的歐洲所產生的第一種大奴隸制是在希臘人中間。當希臘人出現於歷史舞臺之際，他們的舊馬克組織已經消滅了。在他們中間，和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間一樣，由馬克首長與軍事領袖構成一個統治的貴族，具有特別的財富與政治的特權。當侵入的希臘人一經勝利，舊有的居民一部分流為奴隸，另一部分流為僕役，到了後來，希臘自己的人民陷入僕役與奴隸的狀況中也日甚一日了。

統治階級首先令奴隸們經營一種大的種植經濟，(Plantagenwirtschaft) 主要的產物為油酒，其目的在以此和下列各種人民交換奢侈品，即東方更古

更富的有文化的人民，聖經上告訴我們的尼羅河(Nile)幼發拉底河(Euphrat)底格里斯河(Tigris)上一帶的人民，以及居於黑海——原始文化策源地——海口和南岸的人民。貴族和富人的財富愈加增多，他們的生活程度愈加提高，他們便開始離開曠野之地，在他們聚居之處，即逐漸形成古代的城市，而各種手工業，商業，雇傭業羣集於此。一般貴人爲誇示他們的財富起見，在家庭中，在街市上都有整隊的家用奴隸與奢華奴隸(Luxusklave)前呼後擁地保護他們。在生產方面，除掉田園經濟外，舉凡森林業，牧畜業，航業，裝貨，以及商業，手工業中都充滿了奴隸。在手工業方面則發生了大規模的工廠手工業，這是我們近世工廠的先驅，至於這種近世工廠至中世紀的末年才出現於德意志。在這一切企業中不獨勞動者是奴隸，即監工與職員也都是奴隸。

當時的企業也和現在的企業一樣壓迫小手工業，因為多財善買的大企業家能利用便宜的奴隸勞動，這種競爭不是小手工業抵擋得住的。在手工業方面自由勞動受了奴隸的排擠，在被排擠者之中遂發生一個每況愈下的無產階級。奴隸在銀行，交易所，大商店，零售店，和飲食店中充當職員與用人，他們可以僱用於一切業務中。他們在家庭中可以做馬夫，用人，看護婦和伴娘的職務，又可以做音樂家與舞女。此外還有一大批為公家服務的奴隸，在廟宇中，法庭中，財政機關中，他們的數目要佔一大部分，甚至於在雅典——希臘的首都——的警察署中也是如此，即在海陸軍中也有奴隸充當工人，有時且為兵士。據昂格思說，當雅典奴隸制極盛之時，每個自由人均蓄養十八個奴隸。（然各歷史家所說的並不一致；近人所指證的數目復與此相異。）

希臘人爲獲取奴隸而從事戰爭。到了後來，不獨別處地方與別種民族淪於奴隸的狀態中，即他們自己的人民也有一大部分是如此。當商品生產的數量愈多，貨幣經濟便愈加發達。此事又影響到隸屬於貴族的一部分農民，因爲他們繳納租稅不復能用農業產物，只能用貨幣。農民此時覺得他們農業經濟的產物必須送往市場，換取貨幣。商業的居間人因此乘虛而入，商業資本與出借資本開始抬頭，後者對於艱窘的農民即刻成爲一種盤剝重利的資本（Wucherkapital）。農民的負債總是與日俱增。於是統治者訂出嚴厲的債權債務的法律，使一般未嘗爲奴的農民於他們所有物的價值不足以償還債務時，即和他們的家眷同變爲債務奴隸。因此使希臘於紀元前七世紀和六世紀之中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一般被奪去產業的農民很熱烈地要求回轉到從前的狀況中去，他們要恢復舊有的權利，將土地平

均分配。此等運動在實際上引起一種立法的改良，在好些時候也頗足以減輕農民的痛苦。

當時的歷史家告訴我們，小農的農場上豎有典押的碑石，上面載有債權者的姓名與債務的多少。紀元前六世紀時，希臘的立法改良家索浪(Solon)埋怨道：

「典押碑石到處都是。有些人被強迫而屈辱於奴隸的羈絆之下。有些人受不住債務的壓迫，很悽慘地逃出境，飄泊牠

邦，他們既沒有祖國，也將自己的言語忘却了。」

奴隸的狀態充分發揚，遂使手工業，農業以及每種體力的勞動成爲可鄙的賤業，而爲自由人所不屑從事的了。於是自由人與統治者完全不習於勞動。沒有人對於生產形態——這是文化進步的主要品——的改良具有一種興

趣。此外，人們體育的敗壞與社會道德的大墮落又相繼出現。結果是人民的痛苦日增，民衆的煽動愈甚，而國家的權力日見式微。高度發達的希臘社會畢竟就在此等現象中滅亡了。

然我們對於這種不能免的最後的結果，將於考察羅馬的奴隸制中加以詳細的討論。

我們現在要考究的事件是屬於另一種性質的——我們要問：這種奴隸制可以稱爲一種社會的進步麼？就我們最初的感覺講，我們將用一個決絕的

「否」字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爲我們看見早前的人類是自由自在的，到了後來才被壓迫，陷入奴隸的境遇中。但昂格思在杜爾靈的科學革命一百八

十九頁中說得對，我們現在和古代比較，是生息於完全不同的狀況中，因此也具有完全不同的見解，我們使用道德的言詞，嘲笑奴隸制的污點，並且

帶着高尚道德的忿怒，將這種污點暴露出來，這是很便當的。歷史家的任務不是對於他所遇見的何種社會狀況一洩其道德的忿怒，他只要確切陳述這種狀況是怎樣發生的，換言之，他只要確切陳述這種狀況的形成及其在歷史上所演的任務。

大家從這個觀點出發，便必須承認，奴隸制的推行聽來雖十分刺耳，然在當時的狀況之下却是一大進步。強迫推行奴隸制，作為第一種經久的方法，去獲得一種經濟的與社會的更大的進步，這是勞動的生產力比較不發達的必然現象。古代希臘的世界哲人亞里士多德已經指出機器可以使奴隸制歸于無用。他說當織工的梭及一切工具一旦能夠自動作工，奴隸便不復是必要的了。但是要在絕大的規模中提高生產力，首先要在農業和工業勞動中實行分工，並發達交通，發達真正的政治生活 (Staatstleben)，發達更高的

藝術與科學，——想辦到這一着，只有將一切體力的勞動強迫加在一般不自由的羣衆的肩上，使自由人與統治者有閒暇的時間可以從事於更高的精神勞動：如領導生產，建造國家組織，處理國家事務，和研究藝術，科學之類。

大家從經濟的觀點出發，便可以明白看見剝削是進步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歷史上講，把一部分受拘束的生產力——牠們在從前原始共產主義的階段中是不能夠發展的——解放出來，這首先是由于蓄奴的主人的剝削。所以我們估計古代奴隸制的價值，不能僅視爲一種逆着文化的大錯誤。人們爲着使那些到處受拘束的進化力 (Entwicklungskräfte) 第一次大發展起見，必須經過奴隸制的一級，作爲時間條件 (Zeitbedingungen) 的總和中所發生的必然的過渡的進化階段。

剝削與階級統治不獨在奴隸制中是一種歷史的必要，即在以後一切經濟

階段中——從中古時代一直到資本主義——也無不如此。

當生產力還沒有發達，以致真正勞動的人口當竭全力于必需的體力勞動，無暇參加高等的社會的公共勞動，那麼，一個免除體力勞動，專門處理社會高等事業的特別階級便有存在的必要。

奴隸制把統治階級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牠因此安下了古代世界繁榮——希臘主義——的基礎，牠予近世階級史進化以一個出發點。昂格思說，沒有奴隸制即沒有希臘的國家，沒有希臘的藝術與科學，沒有後來羅馬的帝國，沒有基督教，沒有後來進化所附麗的一切成就，使之得向前發展，達到現在的狀況，再轉入社會主義。

吾黨的大哲學家雷慈根 (Josef Dietzgen) 也有相同的說法：

『古代的奴隸制，是勞動的一種組織，有了牠才有古代世界的文

化。這種文化，就是後代的人建築近世受讚美的文明的基礎。……當人民羣衆缺乏勞動的明見時，強迫他們各個人工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奴隸制的強迫勞動是使當時野蠻人的勞動力變爲有用的唯一方法。……第一個最古最大的專制魔王就是那未曾開墾的沒有理解力的自然。我們要征服自然，便當組織攏來。奴隸制是一種過渡的降服，因此在經濟上可以爲人類的利益而掠奪自然。最初的掠奪不是爲全體人類的利益，也不是爲人民的利益，但是爲壓迫者與監督者的利益，爲鞭策者與主人的利益，然我們不要因爲這一點而不認識……下列一樁事，就是羣衆雖被屏諸享樂之外，但他們對於歷史發展的享樂，是未嘗被人竊取去的。在奴隸勞動之中，生產物是屬於主人的，但勞動工具與勞

動方法的改良，便是人類的共有物。資本形成勞動工具與方法的改良，形成近世的大生產力，資本的利息雖單獨為主人所吸收，但資本的產業是屬於人類的，換言之，這種產業畢竟免不了要作為遺產歸諸人類。」

我們于這種觀察之後，再回轉到奴隸制的歷史上，並且是回轉到羅馬的奴隸制的歷史上。後者的開始較希臘的奴隸制歷史要遲些。希臘書契以前的歷史始於紀元前十二世紀，甚至於始於十三世紀，但羅馬的歷史至紀元前八世紀才起首。羅馬的開場也和希臘一樣，是籠罩在傳說之中的。羅馬的建立是在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最初並且還只是在提柏河（Tiber）岸一個小的宗族國家，牠征服後來所稱為羅馬市一帶的地方，但牠的征伐事業愈加發展，牠便成爲一個羅馬世界的國家了。

在羅馬的經濟體制也是各單個家庭所經營的農業經濟，此外還有家長經濟的殘餘存在着。然在此也恰和在日耳曼與希臘一樣，在這種狀況之前，尚有馬克公社的時代。現在意大利地方仍有許多遺傳下來的名稱足以表見馬克曾經存在。又卡濱列人（Cabirinenen）搶劫的傳說指出古代同姓的關係，依據這種傳說，古代羅馬的氏族于一個鄰近的氏族開常例的宴會時，即將後者的青年婦女們誘跑了。當羅馬歷史的開場，馬克公社的平等已經被破壞了：當時已經有一個統治的貴族，具有廣大的地產與某幾種政治的特權。這個貴族也恰和在希臘與日耳曼一樣，是從具有特權的家庭中發生出來的，至于此等家庭又是由馬克首長與軍事領袖的公共職務所佔的優勢逐漸養成的。

奴隸制也已經一樣地推行了。大地主蓄養一大批奴隸，小農民只是蓄

養少數奴隸，或一個也沒有。至于生產方面，雖已有小手工業和商業的存在，但大部分還是農業經濟。就大體講，每一個農民的經濟，每一種物品是為滿足自己的慾望而生產的。然大地主的慾望已經比一個簡單農民的慾望要高得多，因為他具有支配一大批勞動者的權力。地主的產業上通常有一個經濟的建築物，(Wirtschaftsgebäude) 內中包括畜牲的圈欄和菓實等的儲藏所，又有一個屋子為奴隸們及管事人(Villicus)的住所，這種管理人是替地主處理全部經濟的經營的，但他本身也是一個奴隸。至于地主自己另外建有住宅，到了後來——在希臘也是如此——地主總是遷居于城市中。奴隸們于一定的時期領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如衣服鞋襪之類，每人每月領得他的定量的小麥，但他自己必須將此麥磨成粉，此外他還得到酒，鹽，油，橄欖，和鹹魚等等。又管事人之外還有一個女管事，(Villica) 通常就是管

事人的妻子，她是爲一切人焙麵包和司烹調的。一切人都是共同進餐的，這還是古代原始共產主義的遺音。每一個地產上有一個特別的奴隸監獄，用以禁錮反抗命令的奴隸。如果有被疑爲圖逃走的奴隸，或曾經逃走過的奴隸，就用練子鎖着，關在地底下的牢中。這種懲罰加在各個奴隸的身上。但這樣的懲罰起初只是些例外。就普通講，奴隸的待遇是好的。他們在慶祝日也不作工，並且同樣參加家庭崇拜的儀式，共同信仰家宅的諸神。他們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他們常是從小孩子起就隸屬於此等家庭——而他們的生活方法未見得比主人的壞些。

這樣的奴隸制對於奴隸並不感受壓迫。希臘當羅馬的時代也有這種溫和的狀況；即近世的游歷家，在自然經濟存在的地方，仍舊看見這種狀況。但是當種種簡單的關係一經消滅，在羅馬的奴隸制使具有一幅完全不同的面

目——在希臘也是如此。于是奴隸們離去地主的家中，用在大營業之中，爲主人獲取金錢而服務。

此等劇烈的變遷發軔于紀元前三百年。當時羅馬國家經過一批戰爭，開始無限制地擴充到世界的統治。

羅馬最初與卡塔哥 (Carthago) 有彭尼的戰爭 (Punische Kriege)，在非洲北海岸 (即現今的突尼斯—Tunis—所在地) 有完尼集人 (Phöniziern) 所建設的大城市卡塔哥，當時正值興盛之期，牠的居民通常簡稱爲潘勒人 (Pöner) 或彭尼人 (Punier)。他們的主要職業是經商與航海，並且兼做海盜，爲人所畏。他們征服了附近的地帶；變成羅馬的勁敵，尤其是在西班牙，薩丁尼島 (Sardinien)，科息卡 (Korsika) 和西西利 (Sizilien) 都有他們的殖民地。卡塔哥最著名的將軍是漢尼巴爾 (Hannibal)，即所謂大

彭尼人。他于第二次彭尼戰爭時（紀元前二一八至二〇一年）統率十萬以
上的軍隊超越西班牙的界嶺辟倫列（Pyrenäen），經過迦里——即現今的法蘭
西——于西班牙出發的第五個月達到瑞士的阿爾卑山麓。他從此處復領軍進
至那幾乎不能上去的雲端的雪峯，最後他統帶曾經從危險與困苦中奮鬥出來
的二萬六千人達到北部意大利的薄邊（Poebene），因此他就到了羅馬的門
口，使後者的自身感受危險了。直到第三次彭尼戰爭（紀元前一四九至一
四六年）羅馬才使卡塔哥人一敗塗地，使他們的首都卡塔哥顛覆下來。

羅馬于第一次彭尼戰爭以後，二，三次彭尼戰爭之間，又有二次馬集當

尼戰爭 *Mazedonische Kriege*；第一次是從紀元前二一五年至二〇五年，

第二次是從紀元前二〇〇年至一九七年，第三次是從紀元前一七一年至一六
八年。在此等戰爭之間，羅馬於紀元前一九二年至一八九年與絨里（S）

rien) 作戰一次。當第三次彭尼戰爭之際，牠于一四六年和雅托里聯邦 (äthiſcher Bund) 作希臘戰爭，當紀元前一五三至一三三年牠又有征服西班牙的戰爭。到了紀元前一一至一〇五年牠和羅密底人 (Numidien) 作戰，同時自一一三至一〇一年和德意志的氏族集姆栢人 (Nimöern) 及條頓人 (Teutonen) 作戰，這兩種人民是曾經侵入到北部意大利的。自紀元前八八至八四年，羅馬與彭提王國 (Pontischer Königreich) 戰，自五八至五一年與法蘭西的克爾特人作迦里戰爭，後來又有在埃及所謂亞歷山大的戰爭，(Alexandrinische Kriege) 一直到紀元前三十年爲止。所有這些戰爭的結果都是羅馬獲得勝利，於是羅馬便發達成爲世界的國家了。

自從這些戰爭時期結束以後，差不多所有當時爲人所知道的地方都在羅馬的統治之下。這個國家擴充到世界上三個著名的部分上去了，即從大西

洋到幼發拉底河，從北海岸，萊因河岸，多惱河岸到黑海，非洲的沙漠，與阿刺伯沙漠。現今的英格蘭是羅馬的不列顛尼亞省 (Britannia)，現今的法蘭西是牠的迦里亞省，(Gallia 現今的西班牙是牠的希斯班尼亞省 (Hispania)，現今的希臘是牠的格列西亞省 (Graecia)，此外如小亞細亞的一部分，和非洲沿地中海開墾的地帶都是羅馬的省分。羅馬的高級官吏——都護 (Prokonsuln)——用羅馬的名義在地球上最美麗的地方行使統治權。羅馬城的居民曾經達到一百五十萬。

當羅馬在上述的劇烈戰爭中，差不多把當時知名的全部地方都征服了，形成一個世界的國家時，當牠的將軍們和高級官吏正在各處地方獲取巨額的財富，開闢遼遠的商業關係時，牠的內部民衆的幸福是受着致命傷了。此等繼續不斷的戰爭促成小農經濟的傾覆。羅馬獨立的農民本是這個方興未

艾的國家的力量所憑藉的，但經過幾世代的戰爭時期，這種農民便日趨枯槁，終且消滅了。這就是此等戰爭在經濟方面的歷史的結果。

這種結果必定是會出現的。當一般農民長久在外面服軍役，他們國內的經濟便敗壞了。農民羣衆單是爲着服軍役，終久必流于窮困。此外還有貨幣經濟迅速的發達也是農民經濟破產的第二種元素。國家要對外作這許多戰爭，在在需財，于是向農民徵收貨幣，作爲稅款，日甚一日。農民即因此弄窮了。羅馬政府將徵稅權交給所謂承征稅項的人(Steuerpäcker)，這種人使毫無顧忌地欺壓農民，誅求無厭。農民因此陷入盤剝重利者的手中，並且終久要喪失他們的產業：他們于是無產化了。但能夠取得農場的人多爲在戰爭中致富的高級官吏與承收國課的人。他們將農場聯合攏來，構成很大的地產。

然一般無產的農民並沒有被地主雇用作爲工資勞動者或佃農。這是一樁得不償失的事，因爲第一，大家總希望農民以國民的資格被召服軍役，第二，戰爭的本身帶入大批的俘虜，都被充作奴隸，從事一切工作。

被征服的各地對於羅馬國家不獨供給大批的奴隸，並且還要貢獻各種產物。自非洲與西利完全屈服以後，牠們即成爲羅馬的穀倉。羅馬政府不獨因此替牠的軍隊和官吏取得大批穀類，並且開始以濫價向市場出賣穀類。此舉自然使小農經濟首先受其影響。到了後來，全部農民都因此敗滅了。他們變成無產階級，這就是說，他們的生產工具和土地都喪失了。羅馬的社會遂分裂成爲兩個集團，即一部分是無產的羣衆，一部分是極富裕的和權勢並茂的上層人物。

然一般喪失土地的人怎樣過活呢？

他們不能在農業中做工資勞動者，因為此中的奴隸對於他們是些更廉價的競爭者。他們于是擁入城市中，尤其是擁入政治中心的羅馬，數以千計，並且開始向國家要求生活資料。此等農民雖沒有財產，但他們還是自由的和享有同等權利的國民，他們具有自由的選舉權——自紀元前五一〇至三年羅馬是個共和國——所以他們是一種政治要素，統治階級必須設法處置，他們大概是半被壓制，半被收買。布協說：（見不自由的勞動者的暴動

—Die Aufstände der unfreien Arbeiter—[五百]

『一般心懷不滿的羣衆沒有教育，沒有財產，沒有工作，而爲數又多，且深深覺得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他們對於國家與財主的統治構成一種永久的危險。』

羅馬的國家與財主對於此等羣衆予以生活資料和享樂，藉此買其歡心。

我們所看見的顯著的現象是，羅馬強迫被征服的地方貢獻五穀，牠即將此物分配給喪失土地的農民。

羅馬無產化的農民後來完全靠這種寄食的方法維持他們的生活。

所以羅馬畢竟也有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恰和現在一樣。但現在的無產階級是用牠的勞動去維持社會，而羅馬的無產階級則由社會維持牠的生活。在整個的羅馬社會中，上等階級與下等階級都是由奴隸的勞動和被壓迫人民的貢物養活的。

當時的農民對於這種經濟上的敗壞也並不是沒有抵抗，沒有爭鬥的。

當紀元前二世紀中，羅馬的農民革命運動總是從新爆發出來。一般無產化的羣衆要求收回他們的土地。格列治斯 (Tiberius Gracchus) 是這種運動

中最著名的領袖之一，他于一三四年被選為保民官 (Volkstribun)。他會有

表現當時真實狀況的下列的宣言：

『意大利的禽獸自有其棲息之所，而爲意大利爭鬥與效死的人除掉血肉與戰爭外，沒有東西可以稱爲他們自己的。他們沒有家鄉，他們必須率領他們的妻子兒女到處飄流。一般將軍于戰爭時要求他們爲祖宗墳墓之區與宗教神聖之所犧牲，其實這只是說謊。因爲在羅馬戰士的隊伍中沒有一個人還有什麼墳墓之區，只有那些被稱爲世界主人的人自己雖無尺寸土，但他們是爲財富而爭鬥，是爲奪取別人的所有以供自己的饜饕而爭鬥。』

羅馬農民的一切運動都窒息在血泊中而不得發展。格列洽斯及其信徒三百人被殺于一個爲大地主所促使的暴動中，格氏的屍身被投于提柏河。他的兄弟卡約斯(Cajus)于十年後也遭了同一的命運，因爲卡氏及其信徒數

千人都有一次民衆運動中犧牲了。

然當時也曾借助于國家的立法改良，借助于社會政策——在希臘已是如此，即現代亦然——去平息此等猛烈的革命運動。當時所制定的法律除掉奴隸以外，也力求使許多自由人得從事于農業。但此等法律畢竟沒有結果，因爲牠們和統治者的經濟慾望不一致，並且不是站在真正進化的方向的。

一般農民既有家眷，又要時常出入于戰爭之中，他們和那大部分沒有家眷的奴隸比較，自然是用費多，而又不安全。反之，人家可以用一種濫價購買奴隸，可以盡量地剝皮吮血，比較雇用自由的農民要有利得多。並且戰爭所供給的奴隸，有時數量非常之多，例如薩丁尼戰爭（紀元前一七七年）後，『像一個薩丁尼人一樣便宜』的話竟變爲成語了。在幾年以後所發生的第三次馬集當尼戰爭（紀元前一六八年）帶入一十五萬奴隸到市場上來了。

有好些戰爭簡直就是爲獵取奴隸而起的。依我們的貨幣計算，三個馬克就可以買一個奴隸。

可是原來的農民不復務農，還有一種原因。因爲他們不獨是失去了耕種他們田地的可能性，並且失去了這樣的意志與嗜好。當時的社會因戰爭所發生的思想與目的和從前不同了；在農民之中終久喪失了農民的性質。當一個人長年作粗蠻的戰士，去破壞他人的國家，搶劫外邦農民的財產，殺戮他們的家眷，或將其充當奴隸時，他自己對於家鄉田園的熱忱消滅了，對於耕種自己土地的意志也歸于烏有了。那曾經被尊敬的職業此刻爲人所輕視，並不復措意了。農民以當兵爲專業，他們喜歡過戰爭的生活，喜歡從事搶劫，不願胼手胝足，勞苦于田園之中，他們如果不當兵，就在羅馬作寄生的無產者，度一種閒惰的生活。

同時一切矯揉造作的方法想要阻止農民的敗壞，都沒有效驗。因為此等方法與社會發展中活潑潑的事實不相符合。關於這一方面的各種法律等於紙上的空談，無人尊重。在我們的近幾世紀中，一切勉強的努力保持着舊有的手工業，終歸無效，情形正與此相同。

我們現在再進而考究羅馬的小農敗滅後經濟的體制是怎樣的。

在農業方面是大規模的經營，我們用“*Latifundien*”這個術語來表示牠，現在對於東部亞爾伯河的大地產猶有應用這個名詞的。這種大規模的經營是由大隊的奴隸擔任的。至于主人自己却安安逸逸地住在羅馬。

但羅馬既從外邦獲得大量的穀類，他自己國內對於五穀的種植幾乎完全消滅，而代以牧畜業，葡萄業，和橄欖業，這是以最大的規模經營的，並且最大部分是爲着交易而起的。此外又有各種各樣的菓實的種植，並且還有

許多地方闢爲大花園，與飛鳥園，以供一般富豪侈奢的享樂之用。

這種土地種植方法的改變又引起鄉村人口的大減少。意大利的農地，從前有無數獨立的農家耕種並棲息于其上，但此刻爲成千的馬，牛，羊所盤據，僅有一隊奴隸供看守之責。這種牧人尤其是要精壯的青年男子充任，他們要時常騎馬，執武器巡視各處，以防盜賊和野獸侵害牲畜。他們是些勇敢的和半蒙昧的人，身上烙有主人的火印，他們不久便完全變成獸了。他們的食住兩項用不着特別供給；至多只要蓋一個棚子給他們避一避暴風雨的侵襲。至于食物係由畜羣與打獵供給的，他們在草原的地方常是發展一種打刼的生涯。

所以意大利曾經爲人民所棲息的地方都這樣絕滅人煙，變成荒涼之所了。從前的農業居民或在各主要地方從事戰爭，或梭巡于羅馬的各街上，

做無職業的挨餓的無產者。

關於城市中工業方面的生產，手工業的退步與時俱進，因為羅馬一切精緻的工業品是特別由東方輸入的。羅馬和希臘比較，牠只是稍微發展了一些更大的工廠手工業。

我們已經看見在希臘的奴隸制使統治階級得到閒暇的時間，從事于一切高尚的生活，從事于藝術與科學的研究。然羅馬的統治階級終久用不着再在這種方法中去活動。牠既從外邦取得五穀，牠也可以從外邦取得精神勞動，取得科學與藝術。所以我們馬上看見奴隸們不僅從事于鄉村的勞動，並且從事于城市中的一切勞動，還從事于精神勞動，這種情形是與日俱進的。我們看見奴隸們做銀行職員，營業主任，教員，圖書管理員，跳舞家，演戲家，建築師，藝術家，醫生，學者和詩人。當時東方與希臘受過

高深教育的貴族被作爲奴隸，輸入羅馬，他們即在該處從事于精神工作；而羅馬人自己——尤其是在後來的時期中——領導事業的才能便愈加不發達了。

所以羅馬自有了奴隸勞動，不獨是下等階級的自由人與體力勞動完全分離，即統治階級也與高等勞動完全分離了。一般統治者只是奴隸勞動結果的佔有者和浪費者，而一般無產的人就是這種剩餘物的領受者。一切人的牛活都建築在奴隸的身上；奴隸勞動被驅策到絕頂了。

這種純粹剝削的與貨幣經濟的發展自然使奴隸的地位壞到極處。他們從前作工只是幫着滿足家庭中的慾望，他們的工作也只以家庭爲止境。但到了後來，他們是爲主人獲得貨幣而作工，是爲交易而生產，他們的工作便沒有止境了。主人此時榨取他們，只唯力是視。

布協對於西西利虐待奴隸的事有下列的描寫：（見不自由的勞動者的暴

『奴隸的待遇是壞極了。在農業沒有得勢的地方，這些可憐的奴僕在一個自身不自由的管理人監督之下共同生活着。他們的住所是些防護嚴密的工人廠舍，係一種半在地底下的建築物，牆上的窗戶既狹小，又離地甚高，使他們的手攀援不到，藉以防止他們由此逃走。他們的身上有練子鎖着，額上和四肢上也蓋有火印，在最早的晨光中即被牽出去作苦工；要到日暮才放工。當羅馬模範的管理人老卡托（Kato）說，「奴隸不是必須作工，就是必須睡覺。」至于休息日與節日，此等不幸者是沒有分的。當那不衛生的與不充分的衣食住犧牲了幾十人，要什麼緊呢。橫豎興盛的奴隸市場有的是便宜貨色。依照一個有知

識的羅馬農民的界說，農業工具分爲三種：即能言的，半能言的和不能言的，這就是指奴隸，牛與車子。當一個奴隸年老或生病時，他便和一張不中用的犁一樣被出賣了。」

奴隸們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到幾年即因勞苦而死亡了。這恰和十九世紀美國種棉花的奴隸一樣，一個有工作能力的黑人只要作工七年就喪掉了生命。

羅馬人虐待奴隸的結果是，在大隊奴隸之中，到處發生奴隸暴動的事件。羅馬一個著作家說：『當我們的奴隸開始計算他們的數目時，我們就要遭殃了。』奴隸們有時似乎是要計算他們的數目，特別是在軍隊不能即刻趕到的邊遠省分的奴隸具有這種情形。他們在亞細亞和西西利似乎是要建設奴隸的國家。西西利島的暴動者有一次在一個宗教預言家的領導之

下，反抗羅馬的軍隊，支持至十年之久。就是在意大利本部也有奴隸羣衆從事于不斷的暴動的醞釀，不過他們沒有強固的組織上的結合。同時此處國家的權力又較爲堅強，使他們不能得志。他們在此等運動中與軍隊正式作戰，因此死亡的數以千計，迨暴動平息後，每次總是成千的奴隸慘被絞死，或被釘在十字架上，以爲暴動者的炯戒。雖是這樣，然在紀元前最後兩世紀中奴隸們總有暴動的醞釀，並且未嘗停頓一下子。斯巴達卡斯 (Spartacus) 是特拉集 (Thracien) 一個王子，他被捉爲奴，遂于此時崛起反抗。他具有很大的軍事才能與組織能力，他所統率的奴隸軍在最初兩年中屢敗羅馬的軍隊，但到了紀元前七一年他的暴動的奴隸軍在卡拉布利 (Kalabrien) 雖作殊死戰，畢竟失利，他自己被殺，遂因此變成歷史上的人物了。

所以在古代社會即有一個社會問題和階級爭鬥，而此等事件的發生是簡

簡單單由于原始社會變為階級社會這種事實。

但奴隸勞動不可避免的結果還另是一種：依照這種勞動全部的性質講，牠一達到某種限度，不獨不復有技術上的進步，並且還要退步。

一般受虐待的奴隸對於他們的勞動絲毫沒有興趣。凡每日被剝皮吮血的人對於他們的主人必定是滿懷忿恨與失望，他們對於主人自身既無如何，遂將他們的仇恨和報復的感情一起發洩在勞動畜牲和勞動工具上面。此等人到後來非常粗魯，竟和獸一樣，精緻的工具簡直不能落到他們的手中，只好將那最粗蠻的，最笨重的，最不容易損壞的——但也是最退化的——工具給他們去工作，因此勞動與生產物同樣退化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告訴我們說，當十九世紀時，美國南方蓄奴的各邦中，必須使用最古式的犁。倘若將新式的犁拿給奴隸去使用，恐怕不到一

天就壞了。又犁地不是用馬，但是用騾，因為馬受不了奴隸們粗魯的待遇。

所以在奴隸經濟中缺乏發明新工具，進步的勞動計畫或機器的活潑的刺激物。要提高奴隸經濟中勞動的出產，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從市場上廉價買入大批的奴隸，這種人橫豎是可以隨意虐待的；至于像現在所追求的技术上的改良在奴隸經濟中是絲毫談不到的。

這種經濟在技術的發展既沒有可能，那麼，當無限制的奴隸輸入一經告終，牠必定要倒塌了。

奴隸經濟的經營所產生的剩餘既不能用來作促成技術與工業進步之資，牠們也自然不能引起更高的新的經濟生活。牠們只能作為所有者驕奢淫佚與酒食徵逐的費用。

羅馬這種浪費浪用的慾心，達到怎樣愚蠢的程度，這是歷史上表現出來的。奴隸經濟中種種不可避免的傾向畢竟把羅馬的統治階級推入極端奢侈的生活之中。

近世的資產階級固然也一樣地享樂，一樣地浪費，但牠從沒有將所獲的剩餘一齊花去。不論這個階級的生活怎樣奢華，牠總是用剩餘的一部分去促進資本主義生產中技術的改良，並且把這種生產擴充到全世界上去。這是資本主義中一種內在的強迫律，即使近世資本家不願服從這種律，也辦不到，而此技術的改良與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廣，畢竟要把我們的社會驅到社會主義中去了。

然奴隸的階級爭鬥不像現今工人的爭鬥一樣，具有一定的目的，要實現一種更高的新的生產和社會。

奴隸們固然願意除去他們身上的鎖練子，但他們于恢復自由後，只願過返家鄉，回復舊來自由的狀況，他們並沒有更進一步的思想與企圖。

現今的工人是在經濟的關係中努力爭鬥，而此等關係由自身中愈加指明到人類更高的新形態，到社會主義的關係的必然性與道路。現今的爭鬥者已經認識近世此等可能性，他們知道他們共同的階級利益，並且藉一切組織和團結的方法去促進這種利益，他們向國家爭取完全平等的國民權利，以便最終奪取政權，助成種種新的可能事件的實現。然在奴隸的暴動中像這樣的目標是完全沒有的。

一個社會具有羅馬國家那樣的傾向，當牠向來的營養料所自出的大泉源——即無盡藏的奴隸供給——一經枯竭，此社會必定要破滅。這是十分顯明的。

當紀元後的最初幾世紀中，羅馬這種泉源枯竭的現象日甚一日。國家

的力量既日漸薄弱，征服的戰爭便不能向前發展。因爲戰爭已將非重難在服世界的羅馬軍隊的核仁——即自由的農民——毀滅了。羅馬人口的減少令人驚訝。牠所剩的人口已經沒有力量，足以維持此龐大的國家。一般統治者昏迷于奢侈與荒淫之中；而不結婚，不養子，以及殺死嬰兒就變成了家常便飯。一種體力衰弱，精神萎靡的人產生出來了。羅馬的脫托安利 (Tertullian) 向他的同時人叫道：『在你們的中間有幾個不殺死你們的兒子啊？你們不是把他們的生命投入水中，就是讓他們受饑受寒，讓他們爲羣犬所食。』在貧民區或荒村中的貧民，以及勞動奴隸，服役的羣衆，對於富人和統治者具有一種不共戴天的仇恨心。從前的兵士出于自由的國民與農民，他們此刻的人數不足以防護國家，于是有傭兵出現，然此等傭兵是靠不住的。只要有錢，誰也可以收買他們。從紀元後一八〇年至三〇〇年

之間，爲時雖只有二百二十年，統治羅馬的不下三十六個君主，然內中二十七君主是因被收買去的軍隊的幫助而被殺死的。政治的腐敗不可名狀。當時有一個著作家帶着埋怨的口吻說道：『國家從前所有的一切偉大的東西，現在是名存實亡了。』

當羅馬的弱點一經暴露，各種向被宰制的人民從各方面乘虛而入，這個國家此刻不獨不能再有新的征服的事業可言，就是要擋住這些從外面進逼的人民也要費盡氣力，忙個不了。同時奴隸的輸入一落千丈；大規模耕種的土地和礦山都日見荒蕪；從此羅馬的威嚴也愈加掃地了。從前許多興盛的地方竟成瓦礫之場，從前許多重要的城市也淪爲鄉村，內中宏巍的建築物也零落不堪，變爲盜賊和野獸的巢穴了。

羅馬人在這種普遍的衰敗現象中，固然是力求自救，因爲他們要恢復五

穀的種植，要恢復小農的經濟開闢。從前自由農戶自二至五戶自一之規模的農場此刻復劃為小農地。從前的奴隸，殘存的困苦農民，或因避蠻族侵襲而逃來的邊界居民都得移居於此等小農地上從事耕種，是為移民。此等農地分給他們，並不是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對於地主起初發生一種自由的貨幣租地關係(Geldpachtverhältnis)。但這種佃農不能夠付出租金，于是馬上變為一種賦役關係(Fronverhältnis)。移民必須將他們自然產物中業經規定的一部分送給地主，作為租稅，並且于一定的時期中將他們的勞動力無償地供給地主，作為他們自己所獲的另一部分自然產物的報酬。

但此等新的關係對於那因奴隸輸入的停頓而必然出現的經濟與政治的崩潰，不能加以阻止。這種新制度也沒有呈出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因為移民從事于強制勞動不感絲毫興趣，恰和從前的奴隸勞動是一樣的。

地主對於移民所加的強制勞動很多，對於他們所徵收的自然產物（作爲租稅）也很多，因此使他們幾乎不能夠維持他們赤條條的生活。還有一

層，爲阻止移民的逃亡起見，他們所殘存的身體自由馬上也被剝奪了。

馬的皇帝大康士坦丁 (*Konstantin der Grosse*) 于三三二年宣布移民是附屬

于他們所居的土地上面，不能隨意遷徙的。他們如果擅自離開故土，可以

強制帶回，並加以處罰；凡收留他們的人也是一樣要受處罰。移民並且只

能在他們主人所有地的範圍以內取得妻室；他們的後代是生而處于同一隸屬

關係中的。還有一種法律規定移民的兒子以及兒子的兒子『永遠』隸屬於

其所居的土地上，無論他們盡了什麼義務，不能夠從此地面上解放出來。

這樣的狀況和奴隸制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從這中間當然不能夠發展一種

爲數甚多的富于抵抗力精神的人出來。就歷史上講，奴隸經濟是達到一

條沒有出路的街巷中，牠不能前進，只能後退，因為牠沒有發育何種現象與力量，足以過渡到一種更高的文化上去。

當四世紀的末年，日耳曼人挾着他們強健的自然力與尋覓新疆土的慾望，愈加向羅馬帝國的疆界上進逼時，後者即支持不住了。日耳曼人的侵入就是指一種曾經盛極一時的高度文化的告終，這種文化是因牠自己內部的原因而趨于滅亡的。

羅馬的滅亡是由于不能解決牠的社會問題。然『國家消滅了，羅馬仍然存在！』這就是說，那歷史上成就的『產業』畢竟遺傳給人類了。

自羅馬帝國被征服以後，粗魯的日耳曼文化真是到處流行；古代世界陷入『野蠻的黑暗』中，即回轉到久已過去的舊時狀況中，一般人民在以後的時期中必須費盡氣力從這種粗蠻的狀況裏面奮鬥出來。在經濟方面，好幾

世紀以來，是完全停滯的，至少也是進步極緩的。然古代文化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消滅。到了後來——約從十一世紀起，在德意志也是如此——對於城市建設，商業以及工業生活從新構成種種前提，頗似羅馬國家的，於是人們相率趨向希臘和羅馬時代一切流風遺物，而日耳曼人的發展，得着這些東西的幫助，便比從前快得多了。

總之，自羅馬滅亡後，全部日耳曼的發展與羅馬國家的發展有一種有機的結合。當羅馬帝國崩潰之際，有出租小農場的出現，這就是日耳曼人中古時代後期賦役農院 (Fronhof) 的影子

當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時，他們發見他們自己開始發展的經濟制度——即賦役農場及業已形成的服役的義務——在此處已經完成了。日耳曼的貴族採取這種制度，在中古時代以後幾世紀中將此制推行于全部日耳曼，使之成

爲一種最通行的經濟制度，並且達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所以我們看見日耳曼馬克以後更高的農民經濟的組織——中古時代的農莊經濟 (Gutswirtschaft)——在牠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第一是出于崩潰的馬克自身的種種傾向，第二是由于和外國已經出現的歷史的形態結合。新得勢的日耳曼民族挾其經濟生活進步的現象完全自然地與遺傳下來的羅馬的發展結合在一塊。日耳曼人在羅馬遇着完全的經濟的圖形，這是在他們自己的中間才開始萌芽的。

我們可以說：日耳曼的中古時代在經濟方面是由舊有馬克進步的現象和古代奴隸制崩潰的現象配合而成的；此等現象同時出現，但牠們的原因完全不同，牠們的地方也完全相異。

我們在古代的發展和日耳曼的發展之間已經有了橋樑，現在將專門研究

後者前進的道路。

第四講 中古時代的地主經濟 (Die Wirtschaft der mittelalterlichen Grundherrschaften)

我們于第三講時已經在歐洲南部地方的古代奴隸經濟中遊覽過了，現在特再回到日耳曼的發展上去，以便追尋牠的主要的特點。

我們在第二講中看見日耳曼人于紀元後最初幾世紀中的經濟發展至舊有的自由馬克公社逐漸崩潰爲止。當時凡被私人開墾出來的地方都爲私有財產，因此使自由農民的財產差異日甚一日，此外向來分配給各人的公有土地，因停止抽籤分配，也變成了私人的產業，後來竟可由領有人隨意贈予，

出賣並傳給子孫，馬克公社的崩潰就是由此而起的。

新出現的私有土地的產業，單是因爲遺傳給各單個承繼人，分爲小的分子，或不平均的分子，遂使牠發生極大的變化，使牠流于支離破碎。然此外另有所謂長子承繼 (Majoratserbe)。就是爲防止土地的分散起見，將全部地產遺給一家的長子，因此發生所謂長子地產，(Majoratsgüter) 至于其餘的兄弟姊妹如果在長子產業上找得着職業，他們必須以此自足。

這種遺產的分配已經引起不平均的現象，並且在從前自由平等的馬克社員中發生一層倚賴的人。

這一切現象更因土地的購買與贈予而愈加發揚了。關於贈予一項——部分是基于宗教的理由——是以天主教教會爲主要的研究對象，這種教會是從羅馬向各處派遣牠的使者，尋求贈產的。

當大卡爾的時代（七六八至八一四年）西佛蘭克（Westfranken）的列伊克截爾修道院（Abtei i. Irszell）有地一萬五千『霍夫』（Hufe）。（凡二十至三十『莫簡』農地——各按土地的性質而異——即稱爲一『霍夫』；一『莫簡』（Morgen）就是一頭牛在一個早晨能夠犁完的一塊土地。譯者按『莫簡』即早晨之意，等如一英畝。）瓦姆斯（Worms）的洛芝（Lorch）修道院有兩千起地產，聖加倫（St. Gallen）修道院有四十起地產，丹格海姆（Dangerheim）修道院有一萬一千起地產，佛爾塔（Fulda）修道院有一萬五千起地產。

基督教傳播到加里——即現今的法蘭西——比傳播到德意志爲早，當七世紀的末年加里的地產有三分之一在教會的手中，所以此處必須制定特別的法律，防止人民濫給土地于教會。這種教會知道利用牠的精神上的勢力去維

持並提高牠的現世的勢力。

大家必須懂得，當時的教會對於人們比現在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

牠專心于牠的信徒永久的幸福，從幼年起至老年止，予他們以宗教上的拯救方法，向他們打開或關閉幸福之門；每一個勸導懺悔的傳教師，每一個聽罪師 (Beichtvater) 可以影響人們的良心到最大的限度。無論什麼人要想望

上帝的好待遇，或要懇求聖徒代為達意，他必須對於教會有一種贈予，才得達到目的。人們于是將產物和田地送給教會；尤其是死後以教會為財產的承繼者一事成爲一種風氣。教會不僅無限制地支配信徒的良心，牠也是精神教育的主要機關。牧師與修道士是唯一懂得文字的秘密和拉丁言語——爲當時科學的言語——的人；他們擅長醫術，這是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書籍所記載的；他們又擅長羅馬古代的高等勞動技術，他們教導人民從事田園的工作，

他們教導人民建築良好的屋宇。不獨他們的信條對於來世令人生畏，同時又令人富于希望，他們對於貧民與病人也更爲溫和；凡可憐的乞丐，殘疾人，以及無家可歸者逃到他們那裏，即獲得衣食住與保護。此等事實使他們深獲得一般小民之心。同時教會又得到君主與大官的利益，因爲牠對於他們的事業和目的能夠貢獻意見，予以幫助，特別因爲牠能夠代替他們撫綏被壓迫的反抗的民衆。一種對於各界如此有效的精神勢力變成一種同樣強固的現世勢力和政治勢力，這是不用奇怪的。一般大官很喜歡教會；他們給予牠以特權和巨大的地產，因此修道院長和教監督變成有力的地主。

教會不僅是藉宗教的影響獲得牠的大地產，牠並且運用最卑鄙的手段，不惜僞造大批的文書，欺騙農民，奪取他們的土地。

然這種毀滅古代馬克組織的特質的大地產不僅是大批地集中在教會中人

的手中，在更早的時候，牠以更大的規模集中于大官——一般王公的手中，起初並且還是因戰爭奪取而來的。

我們已經看見那曾經由自由選舉產出的軍事領袖的職務——馬克首長的職務也正是如此——因出兵的頻繁而變成世襲了。當人民遷徙的戰爭時代，這種出兵的事愈多愈繁；從前自由選舉的領袖變成公爵，而世襲的公爵的職位又因征服地帶的擴大，變為王的職位。勝利的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地帶有一最大部分是分給了軍事領袖，即畜牲與被征服的人民——後來變成農奴工奴——也是最大部分歸他們享有了。所以在早前的時代，已經因軍事領袖而發生一個閥閱，這個閥閱據有龐大的地產，同時又據有必需的勞動力，可以作為開墾並耕種此等土地之用。當五世紀的末年，佛蘭克的諸王及後來的墨洛

衛格族諸王 (Merovinger) 在里德海恩 (Niderrhein) 協爾德 (Schelde)。

索姆河 (Somme) · 息列河 (Seine) 直達洛爾河 (Loire)，並現今的南部比利時，北部法蘭西一帶地方構成一個佛蘭克國家，從那個時候起，發生一種習慣，就是一切新被征服的土地都歸入于君主的手中，到了後來，即國內各馬克間沒有分配的土地，尤其是豐富的森林地帶都不復為人民所公有，盡為君主攫取去了。從前的民衆土地到處變為王地；君主並以人民代表的資格要將一切沒有標界的土地作為一己的私有物。

在君主的下面有一批大官抬頭起來了，他們一刻不獨在經濟上是凌駕一般普通的農民，並且逐漸開始剝奪他們舊有的一切權利與自由。

自由農民從前在馬克會議中有決定他們自己公事的權利，到了王政和大官制度之下，他們最初仍享有古時這一切權利。但農民的生存既永久是專繫于辛辛苦苦耕種他們的土地上面，而各項會議又因地域與公共事業的擴

充，須時常作長時間的討論，於是農民畢竟沒有工夫如期到會了。古代原始的民主主義只在很小的地域內才有效用。這種民主主義不能夠超過馬克公社的地帶。但後來的會議不僅以公社為範圍，並且擴充到郡縣，因為土地的關係和地主關係較前複雜多了。此等會議一開就是幾天。伊拉馬，斯特列格在德意志經濟史第一卷一四七至一四八頁中描寫這種情形，說道：

『農民的一生花費在可憐的勞苦的生存中，他竟沒有工夫，以自由公民的資格，參加公社和郡縣所召集的會議，行使他的權利，發表他的主張，使之實現出來。』

然一般大地主據有大批服役的奴僕與勞動力在他們的田園中作工，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參加一切會議。他們馬上得完全操縱這些會議，而農民參

加會議的人數總是一天少似一天。但農民既不復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利，在實際上此項權利已喪失了牠的重要性。

所以在大官制度底下的組織即刻就不復具有古代日耳曼式的內容，所謂古代日耳曼式就是古代日耳曼的民主政治，軍隊的組織，司法和警察事務由人民決定，這些東西此刻都由人民的手中轉入君主和大官的手中了。他們總是獨自制訂法律，獨自決定宣戰媾和的事件，他們舉行課稅，並且以國王的名義頒佈國家的行政法。古代的平等，經過好幾世代的武力與習慣的侵襲，遂完全消滅了。

這種新狀況已經胚胎于日耳曼的舊狀況中，這是我們看見過的。此外，從外界又來一衝擊。當日耳曼人征服羅馬帝國時，他們發見該處已經有一種完全成熟的大地產，並附着農民的納租稅的義務和服役的義務。日

耳曼的大地主學得羅馬大規模的農場，當中古時代，他們即此制輸入日耳曼。（所謂中古時代通常是從羅馬世界帝國的滅亡——紀元後五世紀——算起，至大發見的時候爲止，即至十五世紀的末葉爲止。歷時足有一千年。在五世紀以前的時代稱爲古代，在十五世紀以後的時代爲新時代。）

當國土一經擴充，當公爵的職位以及君主的職位一經出現，君主的左右便有一羣人圍繞着，君主爲達到他的全部目的起見，爲設置政府，實行治理起見，總說一句，爲行使他的統治權起見，不能夠缺少他們，然他們既爲他服務，他必須在何種方法中予以報酬，以上所舉的事實都是十分顯明的。當純粹自然經濟的時代，貨幣未興，報酬的自然方法就是給予土地，這也是十分顯明的。

一般君主爲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大官起見，便將許多方哩的土地賜給此等

人，作爲『封地』(Lehn)；這些封地起初是可以再收回的，但後來也變成世襲的了。所以大批的土地及其居民落入一般大官的手中，因此發生一個大地主閥，是爲封建的王臣，後來他們內中有好些人的權勢與財富幾乎和君主相等。

君主對於他的封建諸臣所要求的就是宣戰與媾和中的特別服役。在國家的行政方面，發生一種特別是在佛蘭克國家——一種所謂『高』(Gau 譯者按『高』即郡之意)的制度，這是在伯爵的治理之下的。到了後來，在『高』的位置上有省與郡(Kreis)的出現。萊因高，(Rheingau)亞爾高，(Aargau)伊爾慈高，(Illgau)格列芝高(Kraichgau)等的地名至今猶含有當時的遺跡。一個『伯爵』站在『高』的上面，是爲君主的行政大員。但在戰爭之中，此等大官對於君主供給武裝的和騎馬的扈從，這就是所謂『兵役

義務』。歷史告訴我們說，此等大官有時發生爭議，不肯履行兵役義務。當他們想要對於君主擴充他們的權限時——例如行使裁判權——他們尤其會有這樣的反抗。但關於軍役一項，在種種發展的狀況之下，古代日耳曼的農民軍也逐漸消滅了。到了幾世紀之後，到處是富裕的地主與伯爵，他們從沒有自由的農民中訓練一羣騎士，這種騎士逐漸變成一個享特權的閱閱，即中古時代的騎士閱 (Ritterstand)。

可是一般最大的地主末幾又以小的土地封給一部分的騎士。此等騎士于是變為大地主的家臣，在這種小土地上的農民對於他們負有賦役的義務，而他們自己對於大地主的呼喚有隨時應召的義務，即因此喪失他們的生命，也是分所當然的。

所以各種倚賴關係的整個的組織逐漸發達起來了：這種組織的絕頂為皇

帝與君主，在他們的下面有各級的俗界與宗教界的大地主，古代的高級貴族是由此發生的，在他們的下面有騎士，這是一種小貴族；此等階級超出大多數喪失權利的和服役的羣衆之上，日甚一日。然此外到處也還有些舊來的自由農民，他們只承認君主能高出他們之上，但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權也是彼此完全不同的。所以就大體講，此時在大多數倚賴的羣衆上蓋着一薄層大地主。

此等地主很懂得利用他們的武力和政權來謀他們經濟上的利益。他們的土地既必須成爲一種大的自足的經濟，所以他們開始將他們的地產用籬笆圍起來。不僅農地被圍，即草原，水道，和森林都囊括無遺。凡地主所不喜歡的人對於此等地帶即無從染指。這就是後來農民戰爭一個主要的原因。一般農民埋怨地主將他們生存的主要地帶——草原與森林——奪去了。

所以中古時代的詩人佛萊丹克 (Freidank) 在一二三〇年一首著名的歌謙遜 (Bescheidenheit) 中說：

『田園，水道，邱嶺，森林，

河魚，家畜，走獸，飛禽，

王公有武，囊括無存：

貪心未已，四顧縱橫，

茫茫天際，欲肆瓜分，

嗟我小民，以此爲公。』

一五二五年農民戰爭的宣言十二條中說：

『第四，貧民具有捕捉飛禽，走獸或水族之權力，這是向來的習

慣。……

『第五，關於森林的經營，我們也感受困難，因為我們的地主將一切木材單獨據為己有了。……』

『第十，關於公有的草原和農場也有好些被強佔去了，這是使我們感覺不便的。……』

一般地主並且進而設置完全自主的管理機關，有自己的警察和自己的裁判權。每一個地主的家宅要求永久設置他自己的裁判所。當十世紀的時候，一般地主已經獲得最高的裁判權，即生死權，這種君主的權力落入他們的手中，是由于大貴族對君主政府長期爭鬥的結果。

大地產的耕種初時在外表上差不多完全是依照自由的馬克公社的制度進行的。牠經過三田制的經濟，有被分配的與未被分配的馬克。不過在農民住所中的，不復是從前自由的馬克社員，只是些負有賦役義務的農民。

此等沒有自由的勞動力是地主從被征服的地方取來的，但有些一向自由的馬克社員因私有財產和承繼權的發生而喪失了他們的財產，他們也是此項勞動力的一個來源。地主們從君主處受封，獲得無限大的地產，居民，或現成的財物，他們對於君主負臣下所應盡的義務，同樣農民從地主處也獲得住所和小塊土地，他們對於地主也負有納租稅的義務。不過農民是失去了政治的與身體的自由，他們是些農奴。所以此刻所發生的馬克制度只在外表上表現古代馬克制度的特點；至于在內部，地主就是最高的保護主；他的手中有立法權，警察，裁判權，和軍隊的組織。

當時代向前推移，一般本來享有自由的農民，為情勢所迫，自願置身于這種新制度底下的，便為數日多了。

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各種對內對外的戰爭，時常出現，並且歷數十百年

不會停止。但是古代馬克社員無償的兵役義務，在此等戰爭中便加到每個自由民的身上了。只有不自由的農奴工奴才得免除這種兵役義務。反之，自由的農民必須自備武裝，自出糧餉至三個月或六個月之久，並且凡屬戰爭中所必需的一切器具都要自己捐助。可是軍隊中的武器與騎兵服役愈加完善。武裝配置的費用便愈加增多。農民既是不斷地在出征之中，他家中的經濟——恰和古代羅馬人有一個時候一樣——自然要倒塌。除掉這種不斷的向外出征以外，國內還有各王公大人的掠奪戰爭。此等戰爭自然的和常規的結果是小民成爲王公大人所歡迎的掠奪品，而小民的位置便不能堪了。一般本來享有自由權的農民，爲免除連綿不絕的戰役，輸將供給，以焚燒爲要挾的徵取軍費 (Trandschatzung) 和各種侵害——這都是自由的地產所當擔負的——起見，總是將他們的自由財產送給教會，君主，或王公大人，然後

作爲有稅地 (Zinsgut) 或封土 (Lehengut)——這是負有繳納租稅義務的——再受回來，或者自己完全作爲農奴，從事耕種。農民這樣一來，固然是不自由，固然喪失了政治的權利，但他們却因此免去了兵役，因爲他們所依附的地主此刻將以他的扈從替他們執行軍役；同時他們又可仰仗他們的地主作保護主人，使鄰近的強盜不敢再加暴行于他們。

所以人們爲在重大的擔負與危險之前獲得拯救起見，便相率而趨于不自由一途，至于這種擔負與危險畢竟是由自由自身帶進來的。

人們稱這種拋棄財產與自由爲加入一種保護關係中。

可是一般農民如果不甘心情願去尋求這種保護關係，那麼，君主呀，地主呀，強暴的官吏呀，權勢薰心的教會呀，便要利用各種陰謀詭計與武力來督促他們。每一個勸導讖悔的傳教師，每一個橫暴的伯爵，每一次內亂，每

一次外敵的侵襲！如羅曼人（Normanen），阿蛙人，和斯拉夫人的侵襲——要驅策無數的自由人入于奴役之境。到了後來，沒有地產應當缺少保護主人這句話竟成爲一種基本原則，而大卡爾（Karl der Grosse）的命令中且明白宣布一個自由農民，如果不願意將他的土地送給一個教監督，或一個修道院長，或一個伯爵等等，便當將他時常送往戰場服役，一直等到把他弄窮了，無論他情願與不情願，將他的財產交付出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六九三頁對於這種狀況說道：

『兵役一項使羅馬平民的滅亡愈加迅速，然這也是大卡爾使德意志自由農民加速轉變爲農奴的一種主要方法。』

伊拉馬斯，特列格在德意志經濟史第一卷二五一頁中也說：

『一般王公大人將農民送入戰爭中，次數既多，歷時又久，一直

等到他的財產耗盡，他的經濟毀滅，然後將那要使他屈服在倚賴的羈絆之下的壓迫放鬆些。」

古代有些戰爭是因獲取奴隸而起的，此時有些爭鬥也是因為要使自由農民變為農奴而發生的。

所以在征服羅馬帝國以後的幾世紀中，除掉由內部發生的種種狀況使自由的馬克解體以外，還有其他的狀況使自由的農民差不多完全消滅了。一羣農奴代自由農民而興起；全部人口分成兩個主要的大集團：即自由統治的貴族的大地主與不自由並負有租稅義務的農奴——恰和現在分為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一樣。

自由農民的存在到處只是些例外的現象。有某些地方的農民不管怎樣的壓迫，仍得保持自由——例如在南部施瓦崩（Schwaben）和擺陽的農民，

在北部，撒克遜好戰爭與自由的人民——他們是住在亞爾伯河，里德海恩和北海之間的內地廣平原中的——尤其是在北海沿岸沼澤地方的佛利孫人（Frisingen）。關於他們的力量和自由的情感已經有羅馬的達細托斯爲之標出一個最足敬仰的證據，而基督教的宣傳師衛佛利德（Bonifazius Winfrid）也是死于他們爭鬥之斧下面，因爲他的活動在他們獨立不羈的衝動上，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然在那些高燥地方的農民在好些場所也一樣不自由，他們要屈服于布列密人（Bremer）的大監督和霍爾斯台（Holstein）及撒克遜的王公大人之下。反之，住在亞爾伯河口的撒克遜人恰和佛利孫人一樣，保持他們充分的自由至幾世紀之久。蒲特耶丁格人（Butjadinger），沃斯特人（Wurster），哈德列人（Hadler），克丁格人（Kehdinger），和笛特馬協人（Dithmarschen）的自由獨立的農民共和國差不多在整個的中古時代是保持

着的，這自然也只是一般王公大人，霍爾斯台的伯爵，以及俗界宗教界的貴族血戰的結果。詩人里里克羅（Lilienron），在他的辟德，盧恩（Pidder-Ling）中把佛利孫沼澤農民自負的卓絕的形態表現出來了。此等地帶的農民至今還保持着一種強固的自由的感情和人格的感情。

上面所描寫的發展是因地而異的，然就大體講，牠已經使大地主獲得勝利，當地主的黃金時代——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他們的地產從一萬『莫簡』擴充到六萬『莫簡』，並且還超過此數。

此等地主權構成幾百年中主要的形態，並且構成中古時代經濟生活的特質。這種經濟生活的高度發達約從十世紀起，我們現在對於牠的細目，大體地來檢驗一下，恰和我們對於古代馬克經濟與奴隸經濟所做的一樣。

說明野戶寺七君期的設施，至大卡爾皇帝均文書中獲得完全確切可

黨的報告，這種文書是被稱爲『牧師會的法典』(Kapitularien)，內中是些分章的命令，具有帝國法律的意味。

大卡爾(七六八年至八一四年)出于佛蘭克的馬斯·穆塞爾(Moesel)，和萊因間的一個氏族中，他把佛蘭克國家——此國家以科洛德衛芝(Chlodewich)爲第一個君主，後復由墨洛衛格族諸王加以擴大——擴充到全部日耳曼的大陸，並且還超過此處。他經過四十年的長期戰爭——單是和撒克遜人戰了一年——將他的『基督教』國家的疆界從辟倫列和中部意大利擴充到北海，霍爾斯台的埃德(Eider)——漢堡(Hamburg)與伊截荷(Izehoë)是邊疆防禦地——亞爾伯河，薩列諸河，以及撥門森林(Böhmerwald)和維也納(Wien)森林的山系，這是防禦異教徒的斯拉夫人，韃靼人，馬基亞人(Magyaren)，和土耳其人的。洛列(Lohne)全流域，洛林(Lothringen)·波爾干(Bur-

Gund)，羅曼笛(Normandie)——法蘭西整個的北方和巴黎——以及現今的比利時，現今的荷蘭，都在這個龐大的國家版圖之內。日耳曼的言語是到處通用的。至八〇〇年羅馬教皇替大卡爾加上羅馬皇帝的金冠。

這位統治者當着他的治理的承平時代，即以立法者與教育者的資格，用理想的方法，對於他的大地產的管理方面，加以有計畫的改善。他于八二二年頒佈一部農業法典，對於他的大農場的經營有極詳細的規定與訓令，此等訓令是後來俗界與宗教界的一切大地主所視為典型的。

在這種法典裏面規定主人對於服役的勞動力的態度，主人對待和處罰農奴的權限，繳納租稅的定額，和勞動時間的長短；內中又規定每年須將工作器具，畜牲，生產物，全部財產目錄總括起來，清算一次，得到一個結果；內中並且規定田園中應種何項菜蔬，應栽何種菓樹等等。

羅馬的奴隸及其管事人就是這種法典中的直接的標本。

我們試對於這樣一種大的農莊經濟加以實際的考察。

我們首先看見的是賦役農院，內中有地主及其職員和僕役的住所，有畜牲的關欄，有穀倉，有一大批工作場，還有靠近賦役農院的平地和森林。地主有直接住在農莊中服役的勞動力可供這種土地耕種之用。然農莊經濟並不以此爲限。牠還包含一批零星的，常是遠在許多哩以外的農家與地產。所以農莊不僅是一種很大的形體，並且是一種很散漫的形體。這種大面積與散漫的情形在經營管理上必須有一種詳細的和大的區劃。我們首先來看賦役農院自身是怎樣經營的。

中古時代的大賦役農院上面有一個總管（Vorfeher）指揮全部事務。

但這全部中每一個經營部門是各自獨立，由一個特別職員管理的。此農院

中有田地勞動者，森林勞動者，手工業者，課稅人，養蜂者，打獵者，園丁，栽培葡萄者，有牧畜經濟，有婦女勞動——每一個單獨的勞動部門有一個特別的事務所，由一個職員管理。當必要時，並得增加助理員。此等事務所稱爲『部』，(Ministerien)而一般職員則稱爲『部員』(Ministerialen)。部員全住在農院內，他們也是奴僕，恰和普通的僕役一樣。他們也一樣要受地主的法律裁判與嚴格的訓練，並且還要受體刑。後來的農院貴族(Hofpartei)就是由這種原來與普通奴僕相差無幾的農院職員中發展出來的。我們眼見他們的職位就是現今政府中各部的濫觴。即現今的職官與部長在起源上和農院的奴僕也相差有限。

當此等賦役農院一經擴充，每一個上級職員尙得到一些必需數目的下級

現在的宰相 (Kanzler) 就是由這「輔佐員」而來的。那位監督指導全副農院事務的總管 後來變成「主事」(Amtmann) 或「村長」(Schultheiss)，當賦役農院發展到一個城鎮時，他就稱為「守城官」(Burgvoert)。君主的賦役農院稱為「宮院」(Pfalz)，宮院的總管稱為「宮院伯爵」(Pfalgraf)。後來的自由市就是由這樣的王家農院發生的。可是宗教界和俗界中每一個較大的地主此刻都按照這種王家農院的圖形布置他自己的農院。

這樣的農莊能夠達到的範圍是怎樣廣大，可以從聖加倫修道院至今猶保存的一種原來的計畫表現出來，依這種計畫書上的題名篇着，牠題上一個從八一六年至八三七年在該院服務的院長的姓名。依照這種計畫 修道院的規模包含一個教室，一個墳園，修道院院長，修道士，教師，和醫生的住宅，學校，醫院，有體面的和貧苦的巡禮者與賓客的住所，浴場，麵包製造

所，麥酒釀造所，植藥園，蔬菜園，畜牲關欄，穀倉，和儲藏室，養狗場，搗碎工場，以及裁縫，鞋匠，製楮匠，製刀劍匠，製革匠，銅匠，漂布匠，鐵匠，金銀匠，和桶匠的工作場。依照這種計畫，這個修道院好像一個小城市，由此也可以看見因這樣有計畫的大農莊經濟的建立，即有巨大的經濟的進步，比較在古代馬克公社的農業經濟中那種很小的經濟的發展，便不可同日而語了。

凡靠近賦役農院的一切土地是由總管親自指揮，大概由農場的奴僕耕種，至于散在各處的許多單個的農院與土地的管理工作是由地主委給所謂『管事』(Meier)去擔任的，他們從賦役農院得到一切命令，並且還以必要的職權付託他們，以便便宜行事。這種管事在他所照顧的地帶上，令農民于賦役日(Fronitag)從事勞動，並且監督他們有計畫地實現這種勞動，他于

此等日期又接受農民的稅課，務使一切產物于指定的日期送到主人的農院中。蘭浦列施特 (Lamprecht) 在德意志史 (Deutsche Geschichte) 第二卷八九頁對於此事說道：

『地主對於每一羣鄰近的農民設置一個收租處：他因爲此事將一「霍夫」土地交給他的大半使用管事這個名稱的奴僕；這種管事接受農民所交來的自然產物，替主人計算起來，並且監督地主的田地上賦役農民的耕種與收穫的勞務。在一個中央的機關之下有大批的管事星羅棋佈。』

但農民所應履行的賦役勞動是有數十百種的。他們必須替地主犁田，播種，收穫，替他的建築籬笆與爐竈備辦木材。替他的屋頂和馬匹預備蘆茅，爲夫役往來和運輸事宜預備小舟，並且將地主所需要的一切產物從管事

農院用車子送到地主農院。

農民除掉此等手業賦役 (Handdienst) 和車馬賦役 (Spanndienst) 外，還要貢獻自然產物，地主對於此等產物，沒有一樣是不要的。他們對他供給蜜糖，蜜蠟，亞麻，大麻，五穀，木材，酒，牝鷄，燻肉，蛋，牛酪，油，乾酪，手套，皮貨，布匹，皮革，水蛭等等。

除掉農業中此等自然產物外，其他奴僕又供給他們所從事的實業品和手工業品。

我們對於中古時代的——以及日耳曼人——經濟中的手工業至今幾乎不知道一點。當古代馬克公社的最初幾世紀中，人類的生活只是建築在不完備的農業與牧畜上面，一種成熟的手工業幾乎還沒有出現。至于耕種土地，建造房屋，裁製衣服，以及打獵，戰爭等所需的手工業勞動是由各農家自己供

給的，或是由馬克社員共同擔負的。至多也不過逐漸產生一個鄉村冶工、製造鐵器，犁耙，大鎌，車子等物，此外也許還有一個陶工。冶工和陶工是日耳曼古代最初最重要的手工業。此外手工業的勞動和家庭經濟，牧畜及農業勞動是密切結合在一塊的；那些由農業經濟所供給的原料如獸皮，羊毛，大麻，木材等等是由各家自己在所謂自行生產中製造的。日耳曼人得着他的馬克社員的幫助，從森林中採取樹木，造成他的粗蠻的木屋；又最重要的農業器具，爭鬥的武器，以及皮鞋皮衣等，他也知道製造。婦女們紡績亞麻和大麻，並且用她們自己所織的麻布與自己所鞣的皮革製成必要的衣服。她們釀造啤酒和蜜酒，用手磨磨穀，焙麵包，並烹調食物。當時的人還用不着特別的織工，裁縫，毛皮匠，製革匠，鞋匠，磨粉匠，麵包製造者，釀酒者，和木匠等等，他們自己勞動的種類是非常之多的。後來所發

生的獨立手工業的勞動最初完全包含在家庭經濟的勞動中。

然在業經出現的私有財產之下，因財產承繼分配等等的結果，一部分馬克社員沒有土地產業，於是許多無產者遂不復作農業勞動者，從事于田園工作了。他們以最簡便的方法，學習一種手工業，便以手工業者的資格向其餘的人們獲取生活資料。除掉首起的鄉村冶工，鄉村陶工，鄉村磨粉匠的工業外，此刻又形成一種所謂『上門的手工業』(Störhandwerk)，這種工業不是在手工業者自己的工場中用自己的原料作工的，他只是備有一些拙劣的勞動工具，帶到附近的農民家中，用他們的材料，從事工作，他因此獲得生活品，作為報酬。但是此等手工業者後來也一樣淪為奴僕，他們不能像農民一樣供給自然的產物，必須向賦役農院貢獻手工業的產物：如盤碟，金屬板片，鍋釜，銅器，刀剪，鉗子，椿臼，斧頭，杯子，馬鞍，馬蹄鐵，

手套，農用器具，家具以及其他一切器具。

地主們于一年中有許多次所謂『農院日』(Hofstag)，所有上述各項物品必須如期送到各農院中。

除掉這種上門的手工業外，在各農院中又逐漸發生一種發達更高的手工業，這也是當時高度發達的慾望中一種必然的結果。

爲數甚多的下等奴僕必須棲息于各農莊中，而一般上下級的職員以及地主隨身的扈從所滿足的慾望，和小農家比較，便是一種大得多與豐富得多的農院生活。這一切慾望的繁多與複雜早就足以引起一種愈加有計畫的分工。然這樣的分工要到此時才是可能的，因爲地主已經得自由支配很多的勞動力。例如一個奴僕對於冶工的勞動表現特別的技能，他終久自然會從一切農業勞動解放出來，專心致志于冶工勞動。在賦役農院的冶工從事于

一切種類的金屬勞動，內中也許有一個人特別擅長精巧的製造物，如兵器之類。于是人們就讓他先做或專做兵器，因此發生兵器工匠的一種新職業。金匠與銀匠也是以同樣的方法由冶工產生出來的。每一個賦役農院既代表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這種經濟和小農家以及從前的馬克公社一樣，必須生產舉凡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因此當賦役農院的財富與慾望不斷的增加，分工也會愈加精密，愈加完善。于是賦役農院中逐漸養成各種手工業者，因為他們已經是用更完善的工具，在特別設備的工場中從事工作的。

就是大卡爾的訓令也明白規定要在農莊中養成一切必需的手工業者。

他的命令中所指定的是：鐵匠，金匠，銀匠，鞋匠，旋盤工匠，木匠，製楮匠，漁夫，鷹匠 (Falkner)，捕鳥者，石鹼製造者，麥酒釀造者，葡萄汁製造者，麵包製造者，製綢者，以及其他一切手藝工人。所有這一切手工業

都是由奴僕實行練習的。後來著名的城市手工業是以農莊奴僕的手工業爲出發點。

婦女勞動對於賦役農院的經濟也極爲重要，這種勞動是預備常用的粗布的材料。在更大的農莊經濟中有特別的婦女室，使奴隸婦女紡績羊毛與亞麻。大卡爾命令對於婦女室供給亞麻，羊毛，大青（Woad），緋色顏料，茜草染料，梳麻具，羊毛梳，石鹼，缸鉢，以及從製造原料到染色所需要的一切東西。

修道院對於當時的發展，特別是對於手工業的發展也很重要。德意志修道院中最初的修道士多爲外國人，尤其是多南方人，他們是在一種更古與更高的——卽羅馬晚年的——文化中生長出來的。他們不獨是比當時的德意志人具有一種更高的精神教育，並且在技術上，在一切勞動的熟練上也要比德

意志人進步得多。這些優越之點特別使他們能夠出來做手工業的教師，他們也知道在修道院的半俗修道士 (Laienbrüder) 和奴僕中造成一派優秀的修道院手工業者。修道院對於推廣與造成建築業有重要的功績。德意志的建築物一直到八，九，十世紀中差不多全是木材的建築物，即大地主的住宅與宮院也無不如此。一般修道士首先捨棄德意志的木材建築物而創造石頭建築物。于是修道院的貴族所建築的修道院，修道院教堂，長方形的修道院 (Basiliken)，以及王公大人所建築的宮院宅第都用石料。我們的羅馬式圓頂屋與公共建築物的建築師多為修道士；許多有技能的修道院的建築手藝人，泥水匠，石匠，以及這一類的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造成公共的建築物。修道院對於當時進步的重要意義是必須為人所承認的；古代羅馬的文化因牠的基督教而遺傳于世界了。

我們現在統觀一切新表現的活動範圍，考察其分工與進步的技術，我們的心目中便有一種複雜的進步的經濟生活的圖形，一種財富的圖形，一種高漲的精神文化的圖形，在古代馬克公社之下這一切都是不能夠發展的。至于當着『農院日』，封建主的院中的貢品簡直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拉塞爾在他的巴士提，舒爾茲 (Easiat-Schulze) 一書中曾經根據第一流的可靠的著作描寫這種日期中的形形色色，說道：

『地主的院中充滿了小麥，大麥，母鷄，燻肉，牛，豬，蛋，牛酪，油，菓實，蜜蠟，蠟燭，蜜糖，糕餅，花束和玫瑰花冠！裁縫與鞋匠……則將衣服與鞋子送給地主，這是他們于賦役時期替他和他的家人製就的。製手套人，製杯盤人，造桶人，和木匠也一樣要對於他的慾望供給無償的勞動，冶工和鎖匠必須將練

子，箭子，以及各種各樣的馬蹄鐵，釘子貢獻給他。……一切種類的刀，剪，鉗，斧，杯，壺，瓶，桶，罐，碗，鑊，馬鞍及其他器皿都在貢獻之列。當這種奴僕有牛肉出售的時候，必須將牛舌和牛脚送給地主。當他們有酒，啤酒以及其他飲料的時，也一樣要送一部分給他。可是他倘若沒有酒樽，他怎樣處置這種酒和啤酒呢？所以酒樽，板桶，圈箍，和銅鐵鍋釜，蓋屋板，以及其他修理屋頂所需的材料也是必須供給的。擔夫負有「對我的最仁慈的主人搬運酒類」的義務，而製酒器人也負有「對我的最仁慈的主人供給一切酒器」的義務。

『冶工必須以踢馬刺供給主人，製檯布者必須以六亞倫(Hillo譯者按一亞倫等于四十五英寸)桌布和一種「手帕」供給他。』

「每個移民的妻子……當供給一段麻布和一段毛織物，並且要預備釀酒的麥芽，焙製麵包。有些婦女必須用現成的物品供給他，並且還是使用她們自己的材料，有些婦女不要自己的材料，只須加工製作，還有些人除掉供給小豬，亞麻種子，扁豆等等之外，並須將製過的亞麻送到主人的工作室中。漁夫必須將一定時期內所捕捉的鮭魚及其他「貢魚」供給他，並且用小舟載他和他的鸚鵡出遊，當他寫有書信時，屠夫便要首先當差，做他的使者，騎馬送信。

「我們現在花費許多寶貴的金錢到跳舞場，戲館，和這一類的地方去行樂。但那些封建主用不着這樣做！他們有的是應當此項差役的奴僕，一個扮演醉漢，另一個表演滑稽的跳躍，第三個

就對他的太太唱一個情歌。」

當我們回顧前一期馬克經濟，我們便很顯明地看出農莊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最發展的形態，是一種更高的經濟生活的組織，農莊經濟所引起的農業力量的發展比古代馬克共產主義所能引起的要高得多。達到這種進步的前提雖是古代自由平等的消滅，階級社會和剝削的出現——從前土地是自由農民的公共物，人類只是替自己勞動；此刻農民羣衆必須養活大地主——一般貴族雖是攫去一切政權，宰制國家與法律，依他們的利益而形成全部社會關係，然就歷史上看，貴族的大地主在一定的時期中却是社會進步的推進者。

此外，農民的奴役——即指他們的剝削——至十世紀爲止，尙屬溫和。農民的賦役總可以因地主相當的報酬而抵消一些。農民有使用地主未曾分配的馬克之權；他們可以將他們的畜牲放在地主的草原上牧畜，可以從地主的

森林中採取木材；當着荒年的時候，地主還要接濟他們，並且保護他們，使不受強盜的侵凌，與違法者的壓迫，他又設置焙麵包的爐竈，渡船，磨粉場，爲他們公共使用之具。他只要能夠和他的扈從過奢侈的生活，大概就心滿意足了。

當商品貿易與發展的貨幣流通還沒有開始時，地主們對於農民勞動所取的，便沒有超過他們和他們的扈從所能消耗的数量以上的必要。因爲他們多取了，也終成廢物，沒有用處。所以在中古時代最初幾百年中，剝削形態的溫和恰與奴隸制的初期相等。

然這種情形沒有延長到中古時代的末年。當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一經出現，農民對於各種自然產物的供給，日見增加，不獨是這樣，一切租稅且變成用貨幣繳納了。在另一方面，地主對農民從前的恩惠也一齊消滅了。

他們只顧一己的私慾，忘記了他們的義務；他們只是被宰制的羣衆的剝削者，他們將羣衆的擔負無限制地增加了，因為他們對於金錢的慾望是沒有底止的；他們掠奪農民和工業奴隸時代有些相像。一切種類的貨幣租稅都施行起來了：如地產稅金，人頭或人身稅金，房間稅金，保衛稅金，草稅金，紡績稅金，蛋稅金，母雞稅金，筲把稅金，紡絲稅金，蜜蠟稅金，蜜蜂稅金，燕麥稅金，市場稅金，水稅金，風磨稅金，家畜稅金，學習手藝的稅金，小孩發蒙的稅金，和准許遷移到另一鄉村的稅金。地主對於農民遺產的出售，具有優先購買權，這就是說，他可以要求最好的家畜，如無家畜，便可以拿衣服，或床等物。當農民訂婚，必須得地主的許可，對他繳納婚稅。與此事相連的就是地主在第一夜要和新婦同睡，即所謂『初夜權』。但地主常是將此項權利讓給他的管事人，而管事人也可以向新婦徵收一種稅

金，放棄這種權利。地主如果出外旅行，農民即負有招待供應的義務。

古時的文書對於招待主人及其賓客含有極詳細的命令。那些沒有田地屋宇而在農民家租一棲身之所的貧苦手工業者，必須付出各種各樣的法庭費，保護金。地主又享有無匹的打獵權，農民于他們打獵時，負有追逐野獸的義務，並且還要讓他的最仁慈的主人的野獸在農田中馳騁，不得加以阻止。

地主所加的負擔是沒有止境的。墨爾林 (Franz Mehring) 在他的葉那與提爾細特 (Jena und Tilsit) 的小冊子中說……

『一個人如果要將一切流行過的封建的壓迫計算出來，他必定充滿整本的書。當法國的貴族于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晚上在革命的影響中拋棄牠的特權時，那特權的數目不下一百五十種。』

這種供給與服役的增加，及其轉變為貨幣，是由于商品交易與貨幣經濟

的出現，而兩者的出現約開始于十二世紀，自此以後，牠們便愈加發揚了。中古時代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貨幣經濟是無限制剝削的原因，因此引起賦役農民與其他奴僕的經濟完全破產，恰和古代奴隸制中的情形一樣，這種過渡也使奴隸完全被毀滅了。

我們在奴隸制中曾經看見生產力每一種進步的發展是被阻遏了。所以在奴隸制中增加生產，不是由于技術的進步，但是由于對人數日增的奴隸，作無限制的剝削。但是當蓄奴主人的剝削達到殲滅奴隸的境界，那麼，等到新奴隸無限制的輸入一經告終，他們自己同時就將奴隸制的基礎破壞了。這種期的出現正在紀元後最初幾世紀中，當時的情形是日見嚴重。從這個時候起，那建築在奴隸勞動上面的剝削方法陷入絕境，不復有出路可言：從前的新輸入的奴隸被大批地用作創造財富的廉價生產工具，任意凌虐，但

到了輸入停頓之時，生產即向後退步。古代即由此告終，因為牠沒有力量，沒有方法可以發達到一種更高的生產形態，牠的狀況只是普遍的貧窮與充分的衰落。最後的結果是陷入野蠻狀態之中，這就是說，回轉到幾百年前曾經經過的陳舊的經濟關係中，後來要慢慢地才得從這種狀況之中衝出來。

我們在中古時代也看見統治階級于貨幣經濟出現後，完全在奴隸制的同一方法中使幾世代的農奴與工奴的體力都被摧毀了。社會退化的危險又從新出現。但生產與社會的發展已經取了一個方向，可以由此開出一條新路：即城市經濟的路；這種經濟是建築在商業和自由的手工業上面，牠並且供給現今龐大的資本主義以一種根基！

城市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們曾經看見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城市生活是發達很高的。羅馬人廣大的國家也包含現今的南部和西部德意志的大部分，當紀元後最初幾世紀中，此等地方已經發生了一大批興盛的城市。我已經說過，羅馬人爲防止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國家起見，沿着萊茵河，多瑙河以及其他軍事要地建築一綫堡砦和要塞。當時卽有一大批大小的羅馬城市從這些要塞地方或萊茵，多瑙，列卡 (Neckar) 和穆塞爾 (Mosel) 一帶的防守地方發生出來了，例如康斯坦茲 (Konstanz)，巴塞爾 (Basel)，斯居拉斯堡 (Strassburg)，瓦姆斯·斯排耶 (Speier)，科布列茲 (Koblenz)，寬恩，墨茲 (Metz)，黃金的梅茲 (Mainz)，皇帝臨幸的居利 (Trier)，佛利德柏格 (Friedberg)，火慈海姆 (Pforzheim)，巴登，巴登 (Baden-Baden)，奧格斯堡 (Augsburg)，列根堡·薩爾茲堡 (Salzburg)，帕沙·布列根茲 (Bregenz)，齊利迪 (Zü-

rich) 和其他城市都是。在此等城市之間闢有羅馬的大道，但此等大道現在已有一部分成爲森林了。那些被發見的水管的殘物以及我們博物院所保存的羅馬貨幣，武器，家具，紀念碑，祭壇，和裝飾品是此等城市高度文化的證據。此等城市最初的居民是兵士，商人，飲食店主人，酒保商人，以及其他扈從軍隊的人，他們是克爾特人，日耳曼人，和一批被羅馬宰制的其他人民。有些城市，如居利，寬恩，奧格斯堡，在當時是非常開展，並且在商業上也極重要。例如奧格斯堡卽是一個商業重鎮，爲日耳曼和意大利間貿易的樞紐。寬恩在當時有三萬居民，這種數目一直到中古時代的後期才重新達到，居利在一個時候爲羅馬皇帝臨幸之所，牠當時所達到的範圍比現在要大一倍以上。在居利臨幸的羅馬皇帝建有偉大的城堡，浴場，圓形劇場等等，這些東西的遺蹟至今猶存在。

所有這些羅馬城市當着人民遷徙的蒙昧時代，在日耳曼人的襲擊之下，都成灰燼了。當四世紀時，此等城市在羅馬帝國普遍的衰敗之下，已經日漸退化。迨日耳曼人征服此等城市，他們即加以毀滅，將城牆破壞，使成瓦礫之場。于是此等城市變成沒有人煙的荒野，至多也只是些糟糕的鄉村。由佛蘭克的和阿列曼尼（*Alemanni*）的農民佔據着，將他們家鄉的粗魯文化移植于此。佛萊達格說：『古代穆塞克之地（*Mosaikboden*）變為鷄棲之場，』而羅馬人家的餐堂放着斬草的用具。

要到了幾百年之後，德意志才重新發生城市。在南部與西部，城市發生的最多，但在亞爾伯河，阿德河（*Oder*），以及維克塞爾一帶也有一些。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德意志的城市星羅棋佈，其數目之多，幾乎與現在相等。尤其是前此被破毀的羅馬的城市在幾百年的

廢址上又蓬蓬勃勃地興起來了。內中有好些城市當羅馬時代已經是基督教會的監督駐在地，迨城市復興時仍保持此制；新的駐所又繼舊的而起，于是君主的行宮也建設于此等地方。然無論如何，我們不要以現今的面積去比擬當時的城市。例如寬恩在一千二百年的時候只有一萬以至一萬五千居民，要到十五世紀牠才增到三萬以至三萬五千人。至于其他大多數的城市，人口更少。斯居拉斯堡，魚恩柏格 (*Nürnberg*) 和烏爾姆 (*Ulm*) 在十五世紀時約有二萬居民，奧格斯堡和漢堡約有一萬八千居民，巴塞爾約有九千居民。梅慈約有六千居民，北零根 (*Nördlingen*) 佛萊堡 (*Freiburg*) 和魚伯零根 (*Überlingen*) 約有五千居民，歐格爾 (*Eger*) 約有七千居民，萊比錫約有四千居民，諸列斯登 (*Dresden*) 約有三千居民，梅森 (*Meissen*) 約有二千居民；當十四世紀末年盧伯克 (*Lübeck*) 住有二萬二千人，梅恩河

的佛郎克佛 (Frankfurt) 和齊利池住有一萬一千人。城市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商業的興起。

然我們對於商業，至今尙少說及。一種原始的商業，更適當地說，一種物品的交換，當最古的時代即已在我們中間發生了。當紀元前好幾百年，施列斯衛格，和霍爾斯日 (Schlesweg Holstein) 的北海沿岸即發生一種琥珀的交易，後來又從東海沿岸達到希臘和羅馬。沿海岸的氏族將琥珀賣給近鄰的氏族，而這種氏族又將琥珀轉賣給附近的氏族，如此輾轉相賣，就是此項交易進行的方法。不列顛尼的錫當時也是這樣輸入希臘的。因

此伊息斯 (Isis) 女神的青銅像發見于格列孫 (Guesen)，而約彼得的像 (Jupiter tetue) 也發見于鬧息慈 (Lansitz)，里德[寧]寧 (Niederbarnim) 的利芝頓柏格 (Lichtenberg) 以及佛萊恩森林 (Freienwald) 中。瑞典發見

紀元後一二世紀中的羅馬德拉 (Denar 譯者按此爲貨幣名) 約五千枚。約特蘭 (Jütland) 曾經掘出一種青銅器皿，上面刻有一個工場主的名字，他的器皿也發見于漢洛活 (Hanover) 英格蘭，和瑞士。

就是在更古的文化階段中，也確有交易出現；不過當時不是爲看獲得貨幣的目的而交換商品，只是將能夠滿足實際慾望的應用品互相交換。各種掘發和有史以前的發見均足以證明在最古的時候卽有這樣的一種交換。例如北部法蘭西的一個洞中以及其他地方發見有古代的石製武器和工具，這種東西所用的岩石的原料在此處以及離此很廣大的地方是找不着的。因此可以證明在此等地方棲息的人所遺下的這一類的工具，必定不是出于自製，而是由其他方法得來的。在好些場所，此等物件也許是由劫奪而來的；他們可以從對敵的霍德或氏族方面強搶得此物。然就常規講，我們只能想到因

交易而有此物，即現今仍然存在的蒙昧人的習慣也可以爲此事的佐證，因爲在他們中間，獸皮，投標，楯，某幾種木材，網，紡絲，和釣鈎等等都構成有規則的和平交易的對象。所以石頭做石斧或磨石的材料，構成最古時代的一種交換品，牠並且還可以做其他應用物品的材料。從地中的掘發可以證明在瑞士法蘭西，德意志和比利時的穴居野處的人已經用印度洋的貝殼作爲裝飾品了。

然這樣的交換是以勞動發達到某種高度爲前提的。考茨基爲說明這一點起見，舉了下面的一個例子：一個氏族棲息于一處地方，因自然的關係而從事于牧羊，並且于維持生活之外還有剩餘，但他們找不到造石斧與工具的合宜的岩石。另有一個氏族因另一種地理的關係，據有剩餘的石斧而缺少綿羊，當這兩個氏族互相接觸時，他們的中間很容易發展一種交易。他們

可以各將剩餘的綿羊與石斧互相交換。從這種完全原始的與最初純粹偶然的交換漸次發展一種經常的和有規律的進程；於是長久爲交換而起的正式生產發生了。人們總是將自己應用的物品多生產一部分，作爲交換之用。交換成爲生產發展的原動力；交換並且促進文化的發達，因爲牠將一個人羣所獲得的技術的結果輸入到另一個人羣，供其享用。

我們在此處所舉的例子是講一個氏族和另一個氏族交換，或一個霍德和另一個霍德交換。這種例子是完全正確的。因爲當交換發生之初，我們不要以爲這已經是在兩個私人中間進行的。一種交換的前提是要有兩方的存在，各方都有充分處置交換物的權利。在原始社會中還沒有私有財產，只有公有財產。因此在霍德和其他共產主義的公共團體中不是單個的私人從事交換，但是整個的公共團體和另一公共團體從事交換。所以馬克思說

（見資本論第一卷五四頁）：『在一個公共團體和另一個公共團體接觸之處，商品的交換才開始。』當私有財產，不平等，以及產業階級的高等慾望愈加發展，交換便愈加增高。我們曾經看見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中爲要求東方的奢侈品起見，發生一種怎樣豐富的交換，而他們爲達到交換與獲取貨幣的目的起見，又發生一種怎樣興盛的以奴隸勞動爲根據的直接商品生產。

交換的關係既是由零星的偶然的狀況達到一種更高的程度，所以爲圖便利起見，必然發生一種交換工具，現今的貨幣就是履行這種任務的。在現今發達的交換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投身于一種川流不息的交換中，然使商品從一個人手中達到另一個人的手中，從一個國家達到另一個國家，貨幣便是一種完全不可少的工具；牠並且還是一切商品表現牠們價值的尺度。但我

們試想沒有貨幣的時代，交換的關係是怎樣困難。當一方有一種剩餘的物品要去交換，並且還要換得這一方必需的物品，那麼，牠首先要得一個對手方，對於牠所需要的物品恰有剩餘，同時這個對手方又願意取得牠的剩餘的物品才能夠成功。在一種交換能夠出現之前，這樣的情形是何等的麻煩。就我們的關係看來，是一個織布的織工將他的布獻給製麵包的人和屠夫，換取麵包與肉。倘若製麵包的人和屠夫已經儲有布匹，不需此物，這種交換便不能夠實現；織工不能夠售出他的布，而製麵包的人和屠夫不能夠售出他們的麵包與肉。在不發達的狀況中的人們為免除這種到處感覺得到的困難起見，即已養成一種習慣，將他們願意出售的物品先和第三種物品交換，然後用這第三種物品交換他們所需的一切東西；這就和我們現在對於貨幣所發生的關係一樣。

關於貨幣一項，在文化程度甚低的人民中起初不是金屬貨幣，但是完全另一種東西。五穀，菓實，皮貨，鹽塊，礦石，以及裝飾品如貝殼，金屬板片，玻璃珠子，和武器，工具等等都用作貨幣，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今的野蠻人中猶是如此——此等物品或是在他們的本地地方容易產出，且為數甚多的，或是由外地輸入，對於他們本地的狀況有重要意義的。馬克思說（見資本論第一卷五五頁）：『貨幣的形態或是由於外來的最重要的交換品而成立，……或是由本地財產可供交易的主要物品——如家畜之類——而成立。』在實際上，一切種類的家畜曾為古代一切人民買賣間的支付工具。這種遺蹟現在仍是存在的。貨幣在拉丁文中叫做 *Pecunia*，家畜在拉丁文中叫做 *Focus*，前者是從後者變來的。在我們時常應用的術語“*Pekuniar*”中也恰恰令人想起從前所謂『貨幣』就是指『家畜』。

可是金屬品逐漸將其餘一切物品驅出貨幣任務的範圍之外；例如當紀元前一千年的時候，希臘的詩人荷馬的詩歌中，于牛以外已經稱銅為交換工具了。我們于希臘人中看見一個過渡時代，就是他們于舊有的支付工具牛以外，已經應用金屬品了。然金屬品終久要驅逐其他一切交換工具，因為依牠的材料價值，牠是一種商品，而牠所具的許多性質足以使牠負起貨幣的任務。金屬可以應用于各種最不相同的目的上；牠可以製武器、工具，和器皿，又可以製一切裝飾品。金屬比起其他一切物品（例如五穀或家畜）較能持久，不致于腐爛，也不致喪失價值。金屬更容易轉運，因為牠——特別是貴金屬——能以很少的數量代表一種很大的價值。金屬因為能夠溶解，所以牠也容易分開，牠能夠分為最小的片子，這種性質對於一種交換工具尤為有用。此外，金屬是比較地最能保持其價值而不發生變化的。因為牠的

數量——特別是貴金屬的金子——不是隨便可以改變的，所以牠不像其他商品一樣，容易消滅牠的價值，這一點對於貨幣的任務也是特別有利益的。金屬既具有這一切性質，所以使牠作為交換工具與支付工具的趨勢，日甚一日。然金屬最初並不是以鑄幣的形態使用的。最初用的金屬是一種沒有鑄的片或條子，秤過重輕，然後履行牠的任務。後來人們將特別的金屬片造成一定的重量和標準；一般王公大人或富商大賈在上面打上他們的印子，而我們現今形態的鑄幣就因此發生了。

在近世的國家中，鑄幣是政府的特權（貨幣鑄造權），法律規定應用何種金屬鑄成貨幣（貨幣本位），應用何種比例為各種鑄幣相差分量的標準。德意志的法律規定：『鑄造一種金幣，計純金一鎊鑄金幣一百三十九枚半。這種鑄幣的十分之一，稱為馬克（Mark），一個馬克又分作一百芬尼（Pfen-

金子是現今貨幣制度的基礎。在以前的時代，生產是爲着滿足自己的需要，商品的交易只是一種例外，因此銀幣和銅幣還可以夠用。但自資本主義的生產發達以來，買賣的數目日益增大，即用銀幣支付，尙虞不足。現今因國際的協定，採用金子爲普遍的法定的支付工具。這就是指各國的金幣所含的金子的價值必與額面所標明的數目確實相等，例如一個值二十馬克的金幣一經溶化，牠的金屬價值仍須有二十馬克的價值。其他一切貨幣却不是這樣的。銀幣，鎳幣，銅幣額面所標明的價值都多于牠們金屬的價值。牠們只是些輔幣，只是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小買賣中的。牠們是十足貨幣的貨幣標記，牠們所以能夠通行無阻，因爲牠們可以換取十足的貨幣。紙幣也正是如此，牠是純粹的貨幣標記，如果沒有國家或城市的擔保，牠的

價值直等于零。

紙幣和金屬貨幣一樣，最初是由私人的用途發生的。一般商人在旅行中帶着貨幣，十分危險，他們于是將此物寄存在金匠，布商等人的手中——此人後來變成銀行家——後者因此予以某種形態的支付書或匯票。此等匯票起初是些手寫的券，後來為省事起見，一達到某種整數，即刻印出來。所以銀行鈔票是以匯票的形態而發行的。匯票由銀行自己發生出來，一經送回，必須付以現金。紙幣本來沒有材料上的價值，牠所以能够照票面所標的價值流通，是因人們相信銀行或國家存有實在的價值——尤其是現金——作為準備金，足資支付。紙幣如果沒有準備金，便完全沒有價值。所以當大戰前，一切在市面流通的銀行鈔票依照法令常有三分之一——在實際上還更多些——的準備金存在國家銀行中。但在事實上一切銀行鈔票並不同時回轉到

國家銀行來，所以國家銀行雖只有三分之一的準備金，也不致于不能支付牠所收到的鈔票。現在的紙幣這樣跌價，是因受了大戰的影響，使市面流通的銀行鈔票與金庫券無限地增加，其數量遠過于交換的關係中所必需的，而舊有現金的擔保又久已不復存在了。德國在大戰前所流通的現金與紙幣一共只有四十億，到了一九二一年秋季，單是紙幣一項已經發出一千億，因此使商品的價格飛漲，這就是說，貨幣的價值減低了。

我們因講貨幣的起源，離題已遠，現在再回轉來講我們日耳曼人的狀況。

當羅馬人在邊界上和日耳曼人接觸，在兩者之間即有一種交易，他們將雙方的產物各帶出並帶入境內。羅馬商人帶着美麗的衣料，裝飾品，和奢

侈品，這都是當時的德意志絲毫不知道製造的生產物；他們又帶着些鐵，銀和金，這也是日耳曼人很歡迎的並且不知道從自己的地中採取的物品。羅馬商人因此等物所得到的交換品爲琥珀，皮貨，獸皮，鴨毛，——供羅馬富人灌枕褥等之用——日耳曼婦女金黃色的頭髮，——供羅馬的富家婦女作裝飾品之用——日耳曼婦女所製的並偽裝可以使頭髮變金黃髮的石鹼，羅馬人的盛筵上所視爲美食的蕪菁類，以及其他產物。

然自人民遷徙以後，此等密切的商業關係即告終止，而德意志在好幾百年之中在經濟上差不多是完全孤立的。自從外面沒有刺戟，自己即不能發展一種顯著的商業，這種弱點是伏在不發達的生產關係裏面。日耳曼人最初要披荆斬棘，到處有的是事做，如用火把與斧頭疏通原始森林，並開墾荒蕪的土地，到處建設農家村落農莊之類。日耳曼的社會尙待創造，他們的

田園和森林所產的結果足以滿足現有的一切社會慾望，而人們對於少數高等生產物的慾望，因偶然的交換是可以滿足的。社會中必須首先有常規的和更大的高等慾望的發生，而此等慾望又非固有的經濟方法所能滿足，然後能夠發達一種顯著的商業。此等新的高等慾望的發生是由于農莊經濟發展中階級分化的出現。一般課取賦役的地主扈從日衆，財賦日增，而他們的奢侈慾望也日益發達，同時教會的豪華也日益增進，兩者于是開始向發達較高的國家採辦他們所需要的——非本地的生產所能供給的——物品。此刻在商業中所經營的最初的商品也和在古代一樣，是東方的產物，一般商人最初都是外國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和猶太人。

至于商品的輸運是取了著名的世界道路，內中有六條路是從意大利出發，經過阿爾卑山和加里地方，達到英格蘭，另一條路經過日耳曼地方達到

北德意志的沼澤地和平野以外，還有一條路是從東海出發，經過德意志、波蘭，俄羅斯，達到裏海，再轉往波斯和印度。除此等主要的大路以外，又按照商業的情形分成支路，並且將各主要大路連貫起來。此等道路有一部分是從前羅馬人所建設的軍路和向東方的通商路，一直到現在猶有存在的。例如圖靈根的『競走道路』是最古的載重大車所經過的路；又那條穿過北德意志平原從萊因達到維塞（Weser）的『光明之路』（Hilweg）或者還是大卡爾所建築的一條路；那一帶地方最初的重鎮是發生于這條路上，在這些重鎮中最有勢力的就是索耶斯特（Soest）和多特蒙德（Dortmund）。

可是真正的商品交易最初還在開闢的地方，旅行的商人於一定的時期經過此等地方，各停留若干時；然他們特別是在羅馬古道的交叉地點經商，因為一般教監督，王公大人，俗界和宗教界的貴族都喜歡將他們的教堂，宅第

建築在此等地方；旅行商人其次就在修道院與巡禮的場所經商；總之，凡有大筆的人偶然集會之處，可以出現交易的機會，都有他們的足跡。在此等經商之所，最初出售商品是偶然的，沒有常規的，到了後來此等居留地方即發達成爲長久的建築堅固的市場，這就是中古時代前期城市的細胞。

城市是以一種建築堅固的市場的形態發生的。這種堅固的建築，即于城市以第一種外表的性質，使牠自別于開闊的居留地。古時有句成語說：『市場與牆壁是市民對農民的區別。』這種建築的堅固是必要的，因爲大量的價值積集在城市中，而教堂與神殿也在此處，最容易引起搶劫。在不安全的時期尤甚，故必嚴加防護。最初的城市只是用土牆和濠溝圍繞着，後來對於土牆加以木柵，使臻鞏固。到了最後，才廢去木柵，代以石垣，並且建立高塔以備守望，安置門戶以供出入。有些城市從初時起即有石牆

圍着。這樣的例子尤其是在曾經有羅馬古城市之處，因為此等地方的建築材料如石頭瓦礫等都有大批的存在，隨時取用，甚為方便。城市居民的專名詞“Bürger”（市民）也是表示穩固的意思，此字是由“Burg”（城堡）而來的，此外好些著名的姓如 Burkhard, Borchardt, Borchert 之類也是由“Burg”變化而來的；這種名詞指明市民是一個保護週到的地方的居民，這種地方常是為着保安而發生城堡。許多舊城市在名稱上也表現這一點，如漢堡，馬格德堡 (Magdeburg)，布蘭登堡 (Brandenburg)，魁德靈堡 (Que-
dlinburg)，薩爾堡 (Saarburg)，和薩爾茲堡等等都是。

在這種圍牆之內便開始發展一種特別的政治和經濟的城市生活。城市在政治上變成一種特別的法律，裁判與管理區域，在經濟上變成新的文化中心點，農莊上曾經萌芽的手工業與商業在此處使日益發揚，愈加興盛了。

這種發達在教監督所居的地方最爲迅速，其次則推王宮所任之地。我們已經看見教會據有怎樣多的財富，行使怎樣大的無限的精神勢力與吸引力。在教監督駐節之所，建有莊嚴宏大的教堂，內中有埋葬著名聖徒或遠近欽仰的遺骸的墳場，因此在一定的時期中有大批的民衆前來巡禮，遂予商人以出售商品的機會。凡因宗教的儀式招致大批民衆的地方，從古以來卽爲商賈雲集之所。我們一讀聖經，便看見基督曾經將販賣人與錢商逐出沙羅穆 (Salomo) 廟之外；他們『將他的父親的屋子變作交易場所了。』我們的大市場和歲市的起源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教會的儀式。當着神聖的彌撒祭 (Messe) 時，大批的人民踴躍參加，因此而起的歲市 (Messen)，就是借用彌撒這個名詞的。卽現今的大市 (Kirchmarkt)，歲市，和年市 (Jahrmärkte) 也常是在教堂的前面舉行的，在那些舊城市中有好些老教堂仍舊和

從前一樣表現有露店和小賣店，此等店狹隘矮小，伏處在哥提式 (Gothic) 的窗戶之下，是直接與教堂的外牆連同建築的。所有這些東西至今猶足以表 商業與教堂生活起初有很密切的關連。教堂自身因敬神的緣故，也需

要許多精緻的織物，刺繡，金銀器皿，革製品，木材彫刻品和香料等等。

所以凡教監督駐在之所即成爲重要的城市，這完全是合理的。如布列門

(Br.m.n) 漢堡，敏斯脫 (Münster)，帕德邦恩 (Paderborn)，阿斯拉布盧克 (Osnabrück)，希爾德海姆 (Hildesheim)，寬恩，梅慈，居利，斯排耶，

斯居拉斯堡，康斯坦慈，奧格斯堡，魚慈堡 (Würzburg)，薩爾慈堡，馬格

德堡等等都是。即修道院從前也使舊來的市場變成城市 如埃施斯特 (Ei-

chstatt)，博格斯特霍德 (Buxtehude)，聖加倫，魁德靈堡，亞省 (Essen)，

漢堡 (Hamburg)，高德斯海姆 (Gandersheim)，阿俠分堡 (Aschaffenburg)

等等都是。又王宮所在之地尤其有這樣的一種發達。在宮院之地常是軍隊和王公大人聚居之所，此等人有增無已的奢侈慾望足以使商業和工業呈出很活潑的氣象。所以在宮院所在的地方發生一大批城市。這也完全是合理的，如梅恩河的佛郎克佛、阿痕 (Aachen)，多特蒙德，洛德浩森 (Nordhausen)，苗爾浩森 (Mühlhausen)，哥斯拿 (Goslar)，烏爾姆，魚恩柏格，亞斯靈根 (Esslingen)，安德拉哈 (Andernach)，博帕德 (Boppard) 等等都是。

此等城市幸而在一條可以航行的河的岸上，如在古代的交通孔道的萊茵河及多惱河，或在一條重要的陸路上，或在出產貴金屬（佛萊堡）和鹽（哈列——Halle）的地帶間，那麼，牠們後來的商業與手工業總是向前發展，有增無已的。

到了後來，又逐漸形成聯合的商業地帶，有些城市即變成此等地帶的主要城市。

例如阿柏海恩與齊利池，康斯坦慈，及瓦姆斯成爲聯合商業地帶；梅恩河趨向魚慈堡，和班姆柏格 (Bamberg)，而以梅慈爲主要城市；里德海恩的商業地帶從濱根 (Bingen)，居利達到多特蒙德和河口的地方，而以寬恩爲中心點；多惱河的商業以列根堡爲中心點；亞爾伯河一帶以巴多衛克 (Bardwick) 和漢堡爲重鎮。這種商業後來不復是由外國商人獨力擔任的。德意志的農民中間也發達一種勇敢而熟練的商人，越山航海，到各處去經商。寬恩的商人擴充他們的商務尤爲盡力，他們總是順萊因河而下，渡過北海，直達英格蘭和佛蘭德 (Flandern)，出售酒與布匹，再從此等地方帶回美麗的羊毛與錫。當一千年的時候，寬恩商人在英格蘭已經獲得重要的特權，並

日在倫敦建設一個居留地，叫做『鋼鐵院』(Steel Court)。到了後來，時常有好些城市出來與寬恩作商業競爭。

這種發達後來因十字軍的興起，愈加促進了。至于十字軍出兵的年限，第一次在一〇九六年，第二次在一一四七年，第三次在一一八九年，第四次在一二〇二年，第五次在一二二八年，第六次在一二四八年，第七次在一二七〇年。這種歷時二百年的向東方的出征對於歐洲的文化與發達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自有此舉，而新的物品，新的工業技能與組合得輸入歐洲，使牠的工商兩業都蒙其利益。

十字軍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市富裕與興隆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二百年間的出征對於牠們的市民就成爲一種興盛的運輸事業。意大利的各城市除掉取得收入的泉源外，並且因十字軍運夫的運輸，替牠們的商人獲

得一切商業特權，例如在十字軍運夫所宰制的帕拉斯提那 (Palastina) 得豁免一切稅捐，而他們往東印度所經過的陸路又得安全。當意大利的商人取得東方大批的商品，他們即由海道運回意大利，再由該處循陸路送往法蘭西，佛蘭德，英格蘭，和德意志。東方的生產物如美麗的毛織物，天鵝絨，絹絲，胡椒，其他調味香料，藥材，顏料，沒藥 (Myrrh)，皮貨，珠寶，金製的精巧品，象牙，武器，以及這一類的東西都輸入西方各國，並且日甚一日。意大利的各城市因此非常興盛，尤其是維列笛格 (Venedig) 變成十五世紀國際貿交的主要區域了。但意大利市民在經濟上的勢力與重要一經高漲，他們對於自由與獨立的政治要求也高漲起來了。他們在長久的流血的爭鬥中，驅逐意大利封建貴族的政治勢力，構成中部意大利有名的城市共和制。

但是這種發達的波浪傳達到德意志，也是與日俱增，此處的商業，工業和交通總是向前進步的。在南部地方有奧格斯堡著名的佛格爾（Fuggar）和維爾塞（Welser）兩商家崛起，在魚恩柏格有托黑（Tucher）和帕姆高特列（Pamgartner）兩商家的發生；當十四世紀中葉，商業興盛城市中最重要城市在北部地方，已于北海、東海，里德海姆結成中古時代著名的商業同盟會（Hansabund），在中部地方，則已于馬格德堡結成這種同盟會，在好幾百年中，此會對於這些城市，在水陸兩方是一種有力的和可怕的防衛工具。這種商業同盟會到處保護牠的會員的商業利益，並且以自備的商船和兵士為會員裝貨與防衛之用，使他們雖遠在外國也獲得有力的憑藉。同時牠根據契約強迫外國對於德意志的商民開放有利的商業市場。同盟會的商人從德意志販賣食鹽，從法蘭西販賣酒類，從佛蘭德販賣布匹，從英格蘭販賣羊毛，

從瑞典與丹麥販賣皮貨和乾魚，從俄羅斯販賣五穀和木材。同盟會在倫敦，布魯格 (Brügge)，柏爾根 (Bergen)，丹麥格 (Danzig)，和那角洛德 (Novgorod) 等處建有『事務所』(Kontore)，內中的規模很大，有辦事處，有貨棧，有旅商的寄宿舍。同盟會的勢力非常之大，有一次牠所選舉的盧伯克城市的市長竟用一切的形態向丹麥的君主宣戰，並且獲得勝利。要到十六七世紀有新的歷史的變革出現，這種商業同盟會才衰落下去。到末了只剩下漢堡，盧伯克，和布列門留在同盟會中，此等城市至今仍稱為商業同盟城市。

然除掉商業同盟城市以外，德意志其他一切城市也總是一天一天脫離封建政治的。牠們一個一個都爭得獨立。此等城市都變成歷史上高等的組織，在這些組織內的勞動脫離了從前奴僕的形態，並且遠超出農莊經濟之

上，然却發展了一批倚賴的力量，此等力量又造成現今時代的前提。

然在東部德意志城市發生所取的途徑與西部的復不相同。在亞爾伯河

（當日耳曼人總是向西方進逼時，斯拉夫人即佔據此河）以東的地帶所發生的城市差不多和西部德意志的城市是同時的，不過原動力却完全不同。在西部的城市是經濟關係中徐徐地有機發展必然的結果；在東部的城市是些人為的組織，牠們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但是建設起來的。顯理第一（即捕

鳥者顯理——*Henrich der Vogler, 919—936*）對於大卡爾在日耳曼土地

與斯拉夫土地間所安置的界限，開始推廣。他因為防禦那沒有完全帖服的斯拉夫人不斷的暴動起見，建設一批堡壘，此等堡壘特別是在十二世紀中被擴充為城市，作為軍事的根據地。可是戰爭的征伐，以及基督教都不足以使斯拉夫人變成德意志化。後來藉西方來的殖民的力量，才達到這種同化

的目的，此等殖民是擅長農業與城市的建設的。霍爾斯台的亞多爾夫第

二 Adolf II 伯爵于 1140 年將斯拉夫人逐出墨克倫堡 (Mecklenburg)，率領佛列密 (Frisisch)，荷蘭和佛利孫的移民入居其中，並且在斯拉夫人巴卡 (Baku) 的位置上，于 1143 年建設盧伯克，這便是東海岸第一個城市。大熊亞爾布列芝特 (Albrecht Der Bär) 是布蘭登堡第一個馬克伯爵，(Markgraf 1134—1170) 他號召荷蘭與萊因的移民加入這個馬克。教堂形成布列蒙斯居拉特塞教派 (Primonstratiner) 和集斯特集塞教派 (Zisterzienser)，以及德意志的騎士約翰尼特派 (Johanniter) 和田格列派 (Tengeler)。牠們這些派別也從事移居，並且藉血戰的武力所征服的地帶，遠過現今的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那些王公和教會從西方招致必需的農民往此等地方，作為殖民，允許給他們以土地和自由。一般沒有土地的農民受

不住西方農民狀況的壓迫，總是攜帶家室到斯拉夫地方去，到一個奇異的地方去，因為人們在該處可以有自由，有土地，總說一句，有一種比家鄉優美些的生活。

德意志的農民從里德蘭一帶地方 (Niederlanden)、威斯特華倫 (Westfalen)、里德撒克遜、萊因以及施瓦崩等處移往東方，直達到俄羅斯，又移住匈牙利，卡帕田 (Karpathen) 和細奔博爾根 (Siebenbürgen) 等地。

一般商人和手工業者即刻就跟着此等人進發。德意志人在那些定任的地帶建設城市，併且依照他們家鄉的習慣來滿足他們的慾望。在其他地方的城市大部分帶着一種軍事的性質，當地方一經平靜，軍隊即逐漸退回去。但此等城市是由開創人和主人建設的，他們會依照從前在紙上所定的計畫，從此處取得豐富的收入，恰和現今企業家進行一種新組織一樣。因此這些

城市的建設比較西方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這都是些倉卒的人工的創造

物。一般居民爲表示愛家鄉的緣故，對於此等地方，常冠以家鄉的地名。

所以我們看見有一個普魯士荷蘭 (Preussisch Holland) 有一個佛列明 (Fleming)，在柏林有一個寬恩 (Kölln)，有一個佛郎克佛 (Frankfurt, A.O.)，在烏克馬克 (Uckermark) 有一個斯居拉斯堡，在亞爾伯河有一個阿克 (Aken 卽由 Aachen 變來的)，在細奔博爾根有卡爾城 (Karlstadt) 等等。

可是在這一切城市中，當商業與一般的繁榮狀況一經增加，市民的覺悟也跟着增加，于是此等城市的發達和我們在西方所看見的一樣了。商人和手工業者開始毀滅城市的封建政治而建立一種自由的城市政權。

第五講 城市及城市手工業的發達 (Die Ent-

wicklung der Städte und des städtischen

Handwerks)

我們在第四講中對於描寫城市的發展跑得太快，現在必須回轉來一件一件地觀察城市的內容及其狀況。

城市政治上起初總是在一個課取賦役的地主統治之下，因為城市原是在他的保護之下建設起來的。城市最初的居民首先是由這種地主，及其職員，僕役，和隸屬的手工業者，農民成立的。次則為那些保持着身體自由的

定居農民，以及寄居經商的異鄉人。但後列這兩種人的數目起初是非常之少的。最初的城市大半不過是君主和教監督的大莊院，與平野地方這一類大莊院大致相同，只是前者有一道牆壁圍繞着；就經濟上講，牠們大都為農業城市 (Ackerstädte)。市民的主要職業在很長久的時期中仍是農業與牧畜；他們的田地和草原就在城牆以內。據十世紀一個亞拉伯的遊歷家的報告，城牆以內農地田園的面積比屋宇的面積大得令人驚訝起來。他描寫梅慈這個城市中有很優美的香料出賣，這種東西本來只有遠東地方才出產的，此外梅慈是一個農業城，『內中只有一部分地方住人，餘為耕種地』。他又說，『梅慈在佛蘭克地方的一條河——叫做萊因河——上，產物富於小麥，大麥，裸麥，葡萄園，和菓實。』到了後來，城市中的農業才逐漸被排擠出去了，尤其是由于十世紀及十一世紀商業的發展。可是一般商人和新出現

的獨立的手工業者，除掉他們的主要職業之外，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總還多少以農業爲副業。特別是製麵包者，屠夫，磨粉者，啤酒釀造者，爲使他們的職業所供給的廢物有用起見，從事于喂豬的事業。舉凡豬，鷄，以及其他一切家畜在那污穢的和凌亂的街道上到處亂跑，尋找一切廢物和污水，作爲養料。

因爲早前的城市並不是清潔的地方，和我們現在所習見的一樣。街道十分污穢，並且沒有加工鋪築。矮小的屋子和家畜的草棚雜在田園，草原，葡萄山與肥料場之間，自由農民或俗界與宗教界地主的住宅也是零星四散的，要靠近城市的中心，即教堂以及商人和手工業者的住所所在地，那些建築物才是相連接的。就是此等地方的街道，也不見得要好許多。因爲當時沒有特別的步行道路，沒有鋪石的道路，沒有街燈，也沒有掃街的。

只有在特別的機會中——如王公的降臨，年市，彌撒祭，或大遊行之際——才有人將廢物渣滓除去，將稈草，蘆茅，花之類散在地上，使街道上可以行走；同時屋前面懸燈結彩，以為點綴。但在平常的時候，大家都將一切廢物順便拋棄在街道上。舉凡從屋頂上，畜牲飲水場和汲水井中流出的水將街道上弄得盡是爛泥，據歷史上說，佛利德利芝第三(Friedrich III.)皇帝（十五世紀下半期）于巡視托特靈根(Tutlingen)和萊特靈根(Reutlingen)兩帝國直屬城市(Reichstädte)時，他和他的馬同陷在此等城市無底的污泥中，不能動彈。擺陽的苗爾多爾夫(Müldorf)在十四世紀下半期所發生的城市法，要求凡堆積在市場上的肥料不得超過兩星期，這樁事便足以明白表現城市的污穢了。葛庭根(Göttingen) 13330年的命令與墨協爾(Me-

除乾淨；當一四九〇年魚恩柏格有一首讚美歌極力讚揚該處特別用一個城市僕人將拋棄在街道上的死斃家畜以及廢物載往他處，『因此使街上清潔』。就常規說，凡城市中牆後和門後的一切地方最醜陋，最殺風景。直到十四五世紀，那些最重要的城市中才有些零星的街道開始用石頭鋪砌起來。盧伯克于一三一〇年開始鋪街道，魚恩柏格于一三六八年開始鋪街道，柏恩（Bern）和佛郎克佛于一三九九年開始鋪街道，列根堡于一四〇〇年開始鋪街道，布列斯蘭（Breslau）和奧格斯堡距此時不久的時間開始鋪街道；至于各小城市要過後很久的時候才從事于此。所以我們思想中所熟習的中古城市的豐富影像完全是逐漸開始發展的。

外來的商人——多為南方人和猶太人——是這些城市社會中新增的第一種人口。他們如在城市中獲得定居之所，那便是從城市中課取賦役的地主處得

來的。他們因此必須繳納一種年租，同時並以地主爲他們營業中的保護主人。

我們已經看見城市是以建築堅固的市場的形態而起源的。建築此等市場之權起初是君主唯一無二的權限，但一般大官旋即開始爭取這種權利，後來一般大人物——尤其是教監督和修道院院長，但也有好些大官——因爲君主的授予或爭鬥的結果，也具有建築市場的權利。這種爭鬥的原因尤其是帶一種財政的性質。因爲有市場即有收入，例如城市的鑄幣，各種關稅，交通稅，商店稅，和享受特別的『市場平安』(Marktfriede)的捐稅等等都是。

當一個市場一經固定，牠即有一種異于鄉村法的法律狀況出現，即所謂

『市場平安』。這種狀況對於來到市場的人，特別是對於旅居其中以及來往旅行商人——當市場平安能達到郊外時，可以保護商人的旅行——予以市場主

人的保護。凡侵犯市場平安及其旅客的人當受市場主人的武力嚴重的懲罰。在好些場所，市場平安所達的限度甚大，當一個購買人，或出賣人在市場以外犯了罪，只要他站在市場平安的範圍之內，即不致受法律的制裁；反之，別人對於他所犯的罪就要受特別嚴厲的處罰。人們最初插一個簡單的草把作為市場平安與市場自由顯明的標誌，到了後來，他們就插上王旗——因為最初差不多一切市場都是君主的——或一個十字，此等東西與王的身體的形態，以及帽子，徽章，手套，和劍都被裝飾作君主威權的標誌。在以後的時期中，此等標誌與市場的自由結合起來，發生了石製的羅蘭像（Roland），特別是中部和北部德意志的好些城市中豎有這樣的石像。

當無數大小商人集于城市中時，他們並不隨意散居各處，但完全集在一個地方。例如當九世紀的末葉，佛利孫的商人已經住在梅茲城中最優良的

地方。佛利孫人是一個日耳曼的氏族，他們首先將織布業造成一種獨立的手工業，使此項出品得供商人的販賣。當大卡爾的時候，他們即挾起他們所寶貴的毛織物，遊行內地，成為旅行商人。當後來德意志的城市發生時，牠們中間有好些街道因佛利孫布商的緣故，命名為佛利孫街。

馬格德堡于十世紀時即為外來的商人特建一個教堂；此教堂就叫做商人教堂，或市場教堂；盧伯克在十二世紀中有一切種類商人的商人區域；列根堡在很早的時候，即有一個特有的商人城區和一條由此經過的世界大路，此路至今仍存在。由此可直達薩爾慈堡，此外如瓦姆斯，斯排耶及其牠許多城市都集有大批的外來的商人。

舊城市中有無數街道與場所的名稱至今仍舊是指示此等關係的。

那些名字有一部分是因本國人所講的民衆名再而導名，或是否也門衣了

中投宿的地方名稱而得名，例如在盧伯克有英人街 (Engländergasse)，在瓦姆斯和布蘭施奎格 (Braunschweig) 有佛利孫人街，更有所謂蘭白特街 (Lampertgasse) ——即浪已登街 (Lombardengasse) ——瓦倫人街 (Wallengasse) 之類；此外，差不多沒有一個老城市沒有一條猶太人街的。到了後來，一般手工業者各依照職業特別聚處一起，並開設他們的小賣店，他們也將他們職業的名稱冠在街名上；如織工街，皮匠街，屠夫街，陶工街，裝釘工街，輪工街，理髮工街，掘工街，書寫人街，彫刻人街都是些顯著的例子；又彌撒路，監督路，牧師街，教堂街，小教堂街是表示宗教的生活；城堡路，城堡自由路，賦役農院街，賦役街，城堡街，礮台街，騎士街，比武場是表示城市的舊政治生活。又東街是指由此可達東門，北街是指由此可達北門；牛路是放牛達到草原之路，拖柴路是市民從森林中拖出木材之路。一

個自由農民的住宅所在之地叫做『太陽封地』或『上帝封地』，就是指『他的封地是從太陽』或『從我們的上帝』得來的。舊街道的名稱表現當時城市全部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生活。

當一般商人與手工業者愈加從鄉村中遷入市場，將城內的田園和草原變作報酬豐富的建築場時，此城市的農業與牧畜業便愈加受排擠。這種發展對於課取賦役的地主沒有妨害，他們仍可從鄉村中的農奴滿足他們一切農業上的慾望；因為他們在城外還有充足的土地。可是這種發展對於城市中一般自由的平常的農民却發生影響，他們因此不復能從事于純粹的農業。他們不能因生活發生危險而移居鄉間，取得補償，必須在城中尋找一種新的事業。他們和外來的商人一樣，在那日趨重要的商業中找着他們的職業；城市的舊農民總是一天一天將農業和商業連結起來。此事的出現尤多在教監

督所在的城市與修道院所建設的城市中，因其中住有大批的自由農民。這些農民具有轉入商業的可能性，第一，他們都是人，知道保持身體的自由，不致受地主的宰制，第二，他們是自由的人，享受過某種程度的幸福，和農奴比較，也具有一種更高的精神教育，使他們容易變成商人。

所以此等城市農民向着這種全新的經濟方面的努力，不是出于何等嗜好，但是出于強迫，出于經濟關係變化中所產生的社會的必然性，在此等努力之後即有完全的政治關係的建立跟着出現，這也是必然的。中古時代的城市縉紳閥就是由這種轉入商業中的城市自由農民形成的，在幾百年之中，凡城市長官的位置、議員的位置，以及其他可信託的職位，與政府的職位都被這個縉紳閥所佔據，成爲牠的獨享的特權了。

在政治方面，城市從初時起即形成一種自由的生活，這也是牠和鄉村

同的地方。在城市中地主不復是唯一有力的統治者，此處是由皇帝授予的無數特權所樹立的一種城市組織的政治觀念，這是與農村的政治狀況不相同的。我們曾經看見城市怎樣由馬克裁判所構成一種特別的裁判權，依照這種權限，于治理城市的官吏以外，即商人，農民，和教士也加入為裁判官。

這種裁判權同時又構成一種特別的行政權，和一個——在許多問題上——自決的並自選的長官。自由農民在城市中規畫他們的事務又是依照古代馬克公社的制度的。他們從前共同規畫他們的事務，由馬克首長為之執行，此刻他們就由一個常選的市民委員會來處理他們的事務。這個委員會後來變成多頭的自由的城市會議（*Stadtrat*）。從前的馬克會議，後來的『高會議』

（*Gauversammlung*），即此刻的城市會議。所以一個城市團體從初時起即比鄉村具有一種較大的獨立。不過這種城市馬克的自治及其自由選舉的長

官之上，起初還有課取賦役的地主爲最高的長官，因爲他的手中具有對於重大案件——即所謂刑事案——的裁判權，此外，他又取得保護金與市場組織中的收入。當城市生活日趨重要的時候，此等地主便想將城市會議的職權拿在他們的統制之下，特別是要取得城市會議開會時的主席位置。關於這一點，他們于一個長時期中在好些城市是達到目的的。反之，在舊有的居民發達成爲一種富裕的並有覺悟的市民之處，他們就排斥此等地主原來優越的統治勢力，務使全部政權落入城市會議之手。在商業與工業興盛之處，即發生一個富于抵抗力的有組織的縉紳閥，于是嚴重的革命的爭鬥——早前在意大利即是如此——發達起來，此等爭鬥在十二世紀中已經開始，到了後來，到處是城市地主敗滅下去，而城市富裕的縉紳閥升入統治的地位。

在此等爭鬥中，那伴着商業而出現的城市手工業者一致加入縉紳閥方

面，反抗地主！

我們現在特來詳細考察城市手工業者發達的過程。

手工業在古代的馬克公社中已經興起了，當時即有一個鄉村冶工，一個鄉村陶工，一個鄉村磨粉工人，他們是為滿足馬克社員的慾望而作工，因此受此等社員的供給，藉以維持生活。自馬克公社解體後，一部分農民因受承繼權等等的影響，已經沒有土地可資耕種，他們既不願作為奴役的農業勞動力以謀生活，便學習一種手藝，在附近一帶地方從事于上門的勞動。然我們在賦役農院中又看見發生一批奴隸的手工業者，他們的技能比普通的手藝要高得多。這種高等技能的原因就在地主具有指揮大批人的全權，可以令擅長某業者專精一業，而他的全部經濟方法也要更有計畫。此外，地主發生了高等慾望，這是必須滿足的。我們在第四講敘述農莊的發生時，

曾經看見農莊中除農業外，手工業也十分發達，每一單個的職業有許多細密的工分，每一種職業並且是在一個職員有計畫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我們于此便獲得事實的證明，知道各個人的私有財產與統治權是技術進步的原動力。

我們于古代奴隸經濟出現時也曾經看見完全同一的事實——即在私有財產與階級統治的影響之下，生產力提高了——在希臘是得力于奴隸制，因蓄奴者的指揮權及集合大批手工業者于所謂手工業的工廠中，便將勞動的生產力提高了。所以向來的生產達到更高發達的途徑是由于統治階級的高等慾望和統治權促成的，我們在古代第一次看見是這樣；在中古時代第二次看見又是這樣。

在農莊經濟中勞動力的數量逐漸增大，而勞動的生產力也增大，每個人

勞動的產物不是僅夠滿足他自己的需要了。

因此賦役農院的手工業者除掉爲地主作工而外，還可爲他自己作工，並爲別人作工。不過最後這一着必須獲得地主的允許。當此等主人對於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已如期收到，他們可以准許隸屬於他們的手工業者到別家去作工，不過因此要課取一種稅。

此等手工業者只能在城市中找得雇主，即找着商人與縉紳做雇工。手工業向來只服役于賦役農院與農民的家，此刻又開始和商業發生關係了。手工業者因此得蓄積物資，稍微增進他們的福利；不過當他們對於主人的擔負與貢稅一日存在，無論如何，他們總是不自由，總是不能達到一種較高的地位。然他們因新出現的經濟方面的可能性，可以自立，而他們所處的不自由的境遇，是一種不適宜的關係，決不能夠長久存在，這是很明顯的。

地主們對於隸屬於他們的手工業者狀況改善的一切結果倘若能夠預先看出來，那他們一定是反對此事的；但他們並不是先知者，他們對於工奴狀況的改良沒有驚疑的地方，他們並且喜歡在當時宴會和集會的光華燦爛之中顯示他們的奴僕外表狀況的增進：俄羅斯一直到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取消農奴制爲止，有好些大地主對於他們奴僕中的富裕者，引爲榮幸，藉作誇口之資。

手工業者當時的全部隊伍是開始脫去農院的隸屬關係，轉入城市中謀得獨立的生活。有許多手工業者每年向城市地主納一種稅，藉此贖身；但在鄉村的工奴不使他們的主人知道，私自逃入城市中，另求生活，這種企圖是日甚一日的。一般市民對於這樣逃來的工奴也不願再交回給原來的主人。城市中的地主對於他們剩餘的土地既能夠一塊一塊租給新來的人口作爲建築地基，所以他們大概就來利用這種私逃的人；同時原來定居于城市中的商業

主人也可以利用這種人作爲生財的工具，到了後來，並可作爲反抗地主的政敵。所以他們歡迎新逃來的人，並予以保護，不再將其交回去；然他們對於這種人不以平等相待，不予以政治上的權利，使得參加城市的行政事宜。後來發生一種城市法，規定凡寄居城市的工奴至一年之久，未爲他的主人捕捉拘回，他在事實上是得到自由，不准他的主人再要求將他帶回去。「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一語就是由這種發達的法律狀態中發生出來的。因此城市成爲那脫離舊的賦役義務的工奴改良生活的地方；當這種可能性愈加增大，城市便愈加成爲鄉村人口集中之所，當城市的人口日見增加，城市的範圍即超過牠起初的城牆，而愈加推廣了。這無數寄居城市的手工業者造成他們有名的行會組織，此等組織起初在政治上是幫助縉紳，反抗地主的。

那些從原住城市的自由農民發展出來的縉紳在這種爭鬥中並不是爭人身

的自由——他們已經具有這種自由——但是爭完全的統治權；他們的目的是在造成沒有地主參加的自由市政府。反之，一般手工業者參加爭鬥，就是爭身體的自由，並要推翻對於地主的一切貢稅，他們認此等貢稅是一種壓迫，足以妨害人們勞動的熱忱與勤勉，並阻塞上進的道路。

縉紳與手工業者固未嘗具有同一的目的，但他們却有一種共同的敵人，這是他們雙方必須努力殲除的，因此使他們能夠合作。他們在爭鬥中互相幫助，結果是縉紳閥及其同盟者到處獲得勝利。每一個城市都經過此等爭鬥，不過時間的距離有時相差很遠罷了。此等爭鬥直經過三百年之久——即從十二世紀起至十五世紀止。『舊的黃金時代』浪漫的頌揚者以爲中古時代的發展是在和平與和諧中實現出來的，其實真正的狀況並不如此；這個時代的全部歷史恰和現今的歷史所表現的一樣，是經過一批革命的爭鬥，在

此等爭鬥中起初是城市反抗地主的統治權，後來，我們行將看見的——便是城市的手工業者反抗縉紳的統治權。

*

*

*

*

*

我們現在再稍微回顧一下，便可以看出一種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從中古時代的經濟——這是與奴隸經濟對峙的——產生一種爲此等狀況中所固有的原動力，達到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更高的發展。原始的日耳曼農民經濟達到一種更大的技術進步的第一種可能性是由于大地主的形成：地主們已經使農業經濟高踰遠蹠的和有計畫的發展了。他們在他們的大農莊上第一次形成一種詳細的分工——直達到各種手工業有次序的發達。因爲分工，因爲生產力更加增大的緣故，便發達一種更大的財富，一種更高的慾望，起初只有地

主甚田七，後長所欠文下是完句又也。也主文其言定空益句曾用引也寄來

的出現，這就是城市第一種的出發點。手工業的工奴生產力的增加足以超過農莊經濟的需要。手工業本來只是農莊經濟的一部分，此刻發達成爲上門的勞動，成爲替城市中商業服務的勞動。上門作工與城市予手工業者以經濟獨立的可能性。一般市民脫離地主一切保護的運動，一天強固一天。兩個層次的市民——手工業者與縉紳——在他們的爭鬥中互相幫助，這兩種運動必然的發生是由于物質（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的發達，不是由於個人的惡意，不是由于任何『教唆者』橫暴的努力。

手工業因生產力的進步，遂使地主對於牠的支配權不復是一種向前進步的元素；但變成牠的一種桎梏。地主這種支配權使在歷史上可以形成的生產力不能充分發展，于是手工業者努力掃除這種奴役，對於種種改變的關係，另行豎立一種適宜的法律狀況，——此等努力便成爲一種歷史的必然事

件了。一般手工業者的心目中具有那在歷史上可以實現的社會進步，所以他們必定是會勝利的。商業的縉紳對於封建統治的爭鬥也是事同一律——即現今勞動者對於資本家支配權的爭鬥也無不如此。

從前既有一種歷史的傾向促成馬克經濟的解體，此刻也有一種歷史的傾向促成農莊經濟的解體。由這種傾向發生出來的爭鬥最終的結果是城市脫離地主的統治，勞動脫離農役的關係。被解放的人集于城市中，為數日多，他們此刻變成新形成的經濟生活的擔當者，而這種經濟生活是資本主義的先驅，也是資本主義直接的前提。

但市民對於地主的勝利，只是手工業解放的階級爭鬥中第一種大進步。城市的手工業者自驅逐地主後，身體上獲得自由，然他們在政治上是有權利的。一般縉紳獨握政治的統治權，他們設置城市會議，操縱城市的行

政；而手工業者沒有權力可以過問。因此凡在驅逐封建統治的爭鬥告終之處，又發生一種新的衝突：即手工業者要求參加城市政府的爭鬥。同盟者抵抗封建制度的陣地現在分裂爲手工業者與縉紳兩種互相仇視的新勢力；手工業行會爲着奪取城市統治權所起的爭鬥，恰和從前的爭鬥一樣劇烈，並且是訴諸武力的，在此等爭鬥中勝利的方面常是作最殘酷的報復，用殺戮與放逐去對付失敗者，可是到了城市發達的第二期，一般縉紳或是必須與手工業者共同統治，或是獨自攫得城市的統治權，此等爭鬥即因此告終。我們對於城市爭鬥的形勢概括地說明如下：自九世紀至十一世紀是地主當權的時代，至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縉紳們因不斷的爭鬥得驅逐地主，樹立他們的威權；自此以後，在十四五世紀之中各行會經過劇烈的爭鬥，得以參加城市的政權。

至于行會在歷史上是導源于農院權 *Hofrecht*。各種不同的手工業在農莊中已經因規定生產而組織起來了。不過此處的組織還帶着強迫的性質。手工業的工奴自己不能決定他們的事務，地主將領導的權限交給一班居農院各職業領袖地位的農院職員。可是一種職業有組織有計畫的進行所得的結果遠過於單獨散漫的進行，這種經驗，這種組織的思想在農莊中已經深深印入手工業者的腦筋中了。城市的手工業者即依附這種由農莊遺傳下來的模型組織攏來。他們初時是站在地主或縉紳的管事之下。但此時他們排斥主人的支配權與監督權，形成他們自由的組織，不過此等組織最初具有很重的政治的色彩。

手工業者是依照馬克公社的舊方法來建設他們的自由行會的。行會的會長也和馬克首長一樣，是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最初的任期並且還只有一

年。可是此處也和彼處一樣，歷時既久，一切人平等的內部的設施被破壞了。行會會長和有一個時候的馬克首長一樣，變成一種終身的職務了。

當中古時代，凡最重要的，最古的和人數最多的手工業的行會首先獲得勢力。尤其是織工的老手工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此項工業即刻就伴着商業，發展成爲德意志第一種工業。此外硝皮匠和毛皮匠也很重要，因爲中古時代用皮貨做衣服，遠過于現在。凡和製服裝有關係的其他各業，如鞋匠，裁縫，染匠，和漂布者等等即與硝皮匠及毛皮匠結合起來。其次則爲供給軍器與武裝的各業，如兵器匠，甲冑匠，劍匠，盾匠，手套匠，踢馬刺匠和馬鞍匠等等結合起來，在好些城市中金匠與銀匠也在內。建築業如木匠，砌匠，石匠，老的生活品業如製麵包人，屠夫，漁夫，園丁，葡萄酒挑夫，桶匠，啤酒釀造者都與武裝手工業結合。砌匠勞動和石頭勞動比較地

出現最遲，因為石料的建築到後來才盛行；一直至十四世紀為止，大部分的屋子都是用木材造成的，即城市中也是如此。

梅慈織工的行會文書（一〇九九年），瓦姆斯漁夫的行會文書（二〇六年），魚慈堡鞋匠的行會文書（一一二八年），寬恩被褥織工和車工的行會文書（一一四九年和一一八〇年），馬格德堡鞋匠與盾匠的行會文書（一一五八年和一一九七年），布闊施歪格金匠的行會文書（一二三一年）要算是最古的東西。依據此等『行會文書』或章程，自由行會的發展開始于十一世紀的末葉，至十二三世紀而愈加繁榮。當十四世紀的時候，各大城市平均有四五十個公開的被承認的行會。

講到行會，不僅手工業者有此等組織，其他許多職業，如老的商業，小的商業，店員，飲食店主，船員，甚至于妓女，『遊女』，在各大城市中

有此等組織。他們各有會所和特別的章程，他們並且因獲得有權力者的特別保護，興高彩烈，喜不自勝，至于這些當權者用貢稅的形態向此等職業獲得特別的收入，他們此等舉動，不像現在一樣，是恬不以爲恥的。

行會是具有同志精神的職業組織，此等組織對於牠們會員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利益負有保護的責任。牠們對於手工業予以當時必需的保護，使牠能夠生長並發育起來。

可是行會的任務旋又擴充了。牠們注重會員宗教的義務，和社交的利益，同時並自任爲風俗習慣的保持者。總之，行會對於人類生活的每一方面差不多都要伸手去照顧的。每一個行會又是一種宗教的社團，牠有一個特別的職業神聖，有好些行會在教堂中設有自己的祭壇，或自己的教堂；梅慈的織工行會于一〇九九年即已自建一個教堂。但每個行會在教堂中至

少有牠自己的香燭，因此也得執行香燭師的職務。行會對於死去的會員唸彌撒經。當一個會員死後，一切同業人員都去送葬。當喪家窮困時，行會即擔負葬費，此外，如孤寡，病人，和窮人都由行會予以救濟。

行會對於晚間在『酒館』中的集會負有設法使一般會員親愛交接的義務。當一個會員結婚時，一般會員便在行會會所，或市議會，或戲院中共同慶祝婚典。

每個行會都有自己的紋章與旗幟。每當慶祝之際，行會帶着紋章與旗幟用密集隊伍參加。每個行會尤其是構成一個特別的戰爭部分。每個會員必須視他的正確註定的武器為財產。當警鐘一鳴，一切會員必須齊集於會所或報警地點。每個行會於爭鬥時在自己選舉的領袖之下形成一個特別的集團。當承平的時候，各行會要負經常的城市守望的責任。牠們各派

定特別的門，塔，或城段，各自置崗守衛，在戰爭的時候牠們對於派定的地段必須從事防禦。所以一般行會第一即構成城市的軍隊，依照行會所任的戰爭部分而加以編制。行會在城市的政爭中也知道利用牠們的武裝勢力，牠們的會所有時防禦十分強固，在暴動中竟受得住敵人正式的襲擊與圍攻。

行會後來在行使政治權之處，即成爲真正的選舉團體。現在是依照選舉區域選舉的，但當時是依照行會選舉的。只有在行會的會員有參加城市官吏選舉之權。每一個行會主人必須參加經常的行會會議，在此等會議中也有選舉，其中所討論的不僅爲手工業方面的事件，即其他一切城市事件，也一樣涉及。各種稅捐不常是由各人零星繳納，但由行會徵集攏來，替大家一起送到市政廳。

行會也有牠們自己的行會裁判權，起初只涉及于會員中一切工業方面的

事件，後來就是其他爭端也受裁判。只有犯法的事件出現于高級裁判所。行會爲執行牠們的判決起見，也有執行命令的法警。此等行會裁判所就是我們現今職業仲裁所的先驅。

此外，行會又是道德的守護者，牠們監視會員的道德生活，會員如有違犯善良風俗的行爲，即加以處罰。

各單個的手工業如果因人數太少，不足以獨自形成一個行會，即由許多手工業聯合攏來，成爲一種共同的行會組織。

自一般手工業者獲得勝利以後，他們的行會在經濟方面即開始充分重要的發展，尤其是因行會能詳細決定當時生產與消費間的規則。行會的規程對於經濟生活的每一方面，沒有不開始過問的。

行會能夠訂下這一切規則並且使之見諸實行，其根本力量就是行會的強

制 (Zunftzwang)。我們知道，現今關於所謂工人的聯合恐怖主義 (Kontaktskristianismus)，有某一方面加以一切的虛構。其實這種聯合恐怖主義恰起源于『善良的舊時代』。凡不屬於行會的人不得從事于手工業，從初時起，這就是行會一種主要的保證與基礎。凡不願意組織起來的會外人是不能容忍的。到了後來，行會開始停止這種干涉的行動，這便是牠們衰落的時期了。當牠們的全盛時期，強制與重罰足以制止一切反抗，工人如果被驅逐出會，即不能謀得生活，因此將一切退出的潮流保持住了。一切規則因有這種行會強制，才能够見諸實行。

行會的規則規定每種職業應有的老板數目，和每個老板應有的幫雇工與徒弟數目。幫工的人數總是很少，所以每一個老板必須共同作工，而不致于流為純粹的剝削者。『行會的法律極端限制幫工的人數，有計畫地妨止

老板變成資本家」。(見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 工作時間的長短是被規定的——有人認當時的工作時間特別長，這不是事實，要到後來的狀況帶了一種資本主義的色彩，長時間的工作才出現。按當時的規則，作工的時間只以白天爲止，星期日勞動和紀念日勞動是被禁止的。當時的宗教紀念日比現在要多得多，然一般企業家對於天主教的教堂並不因此感覺不方便。

每單個手工業在生產方面是有界限的，這就是說，一種手工業可以從事于某些工作，另一種手工業必須保留某些工作，都是明白規定的。這樣的規定有時恰恰可笑並且十分小氣。粉牆工人不能夠修理敗壞的牆壁——這是砌匠的工作；砌匠不得使用槌和鐵器，否則他篡竊了彫刻師的手藝；彫刻師對於他的作品不得加以顏巴——這是畫匠的工作；木匠在他的工作場中不

得使用鐵釘——他在他的工作中只限于用木；染匠不得漂布，而漂布匠不得染布，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每一種勞動是由章程規定，只限于牠的特別的範圍，即極細微之點也經舉出。單是製帽業要分成五個特別的行會。

當一種手工業中老板太少時，即依照行會和城市會議的議決，從外面招致必需數目的新老板。在一般老板中，是用最嚴厲的方法，制止不正當的競爭。凡誘惑別個老板的顧客或幫工，使之斷絕關係，是被禁止的，至少是視爲可責備，和不道德的。爲使每個老板能够和其他老板儘可能地同樣競爭起見，各種商品都有一定的價格。幫工的勞動工資是一致規定的；行會並且替大家共同購買原料，以同一價格分派給各個老板。有些行會甚至于對於各私人不容易舉辦的某幾種較大的基本工業，如漂布廠，染坊和布廠等等，特爲大家建設起來，以同一的租金，准每個人使用此等東西。凡工

作的進程是被規定的，即一切會員出賣商品的機會也是平均分配的。

有了這些規定，不獨能保護商品生產者的利益，使之不受自由競爭的弊害，並且也顧到消費者的利益了。消費者也同受保護，不致受劣等原料，劣等工作，或過度的價格的欺騙。

行會爲監視一切規則強迫實行起見，起初對於工作場，後來對於商店，行使一種經常的支配權。牠們設置所謂『監察職務』，上面有『監察長』監視商品的原料是否良好，工作是否優美，商品是否按照規定的方法製造出來的。如果商品的原料惡劣，工作不良，老板將受罰金的處分或受體刑的處分，如果這類的商品是生活品，將被沒收，在市場公共分配給大家。行會的老板在市場上各有出售商品的小店，互相連接，他們的住宅也在同一街上，或同一市區中，所以他們大家出賣商品的機會也是平等的。

行會對於學習手藝的強制，徒弟學習的年限，幫工遊行作工的年限，都有詳細的規定。當我們從此等時代中聽到武裝徒弟的爭鬥，我們要知道這些徒弟多為成年人，因為在許多手藝中習藝的期限規定至七八年之久。徒弟要想脫離原來的地位，必須能做幫工的工作；幫工要想做老板，必須能做一種特別的老板的工作。我們的工業博物院還保存一些優美的作品，這就是當時老板的作品。

徒弟與幫工在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中，對於老板並沒有特別的階級對抗。他們中間的爭端是例外的。徒弟與幫工的食住都在老板的家中，他們就和他的家人一樣。幫工並且知道他終有一日也要做老板的。在此等安穩的時代，幫工和老板是站在同等的社會地位上。到了後來，當由幫工變成老板的途徑被一切陰謀詭計所阻礙，難于通過，當幫工的人數愈加增多，他們

幾乎要終身做幫工，不能上進。當他們受老板的剝削日甚一日，如工作時間的延長，工資的減少，飲食的降等之類，於是幫工與老板間嚴厲的對抗形成了。從這個時候起，幫工開始組織他們特別的幫工行會，這是反抗老板行會明顯的爭鬥的組織。

行會與手工業最大的勝利是在十三，四，五世紀中。當時的手工業具有何等作事的能力，在佛萊堡，斯居拉斯堡，烏爾姆和寬恩的教堂，在列根堡和魚恩柏格的行會廳，以及其他許多建築物都指示給我們看了。當我們一經想起此等工程的計畫不是由有學識的建築師作成的，但是由簡單的手工業老板作成的，便使我們更加驚訝，更加讚美了。此外，如鐵匠，金匠，銀匠，木材工人，釘書工人等等優美的工作使我們對手工業的技術同樣具有最大的敬意。

現在有某幾層的人提出一個問題，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的統治和牠『對於各種力量的自由操縱』，以及無限制的私人致富作為營業的原動力等等將來如果不復表現，則社會中勞動的歡樂與藝術的創造可以好好保存着，因為中古時代繁榮的藝術就是一種明證了。當時勞動的擔負者——手工業者——同時能行使政治的權力，形成一切條件，使他們的勞動能夠好好發展，於是著名的歌師，著名的畫師，和著名的彫刻家恰恰出現于這個時代。現今勞動的擔負者——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如果取得政治的統治權，訂出種種條件，使勞動的一切力量可以充分發展，那麼，現今世界上的創造力，勞動的歡樂，以及藝術上的成就，也是不會消滅的。

行會的規則是對於當時及其狀況予以安全的保證，即在原始公社精神的意義上予以安全的保證。牠們對於購買者保證能獲得一切必需的生產物，

對於生產者保證能獲得工作。在這種工作之中，既不致流于過剩的生產與失業，而大家的營業狀況與一切經濟的生存條件又是平等的。佛萊達格在他的德意志過去形象中說：『德意志城市的行會後來嚴格規定每個老板應有若干幫工與徒弟，使他的同事不致因過度的活動而受損傷，這種顯明的限制是出于公社同事同等權利的觀念。』

早前在馬克中以及後來在農莊中的共同勞動，現在發達成爲城市中更高的形態。每一個城市在分工中和牠的附近的鄉村構成一個儘可能的自足的生產地帶。鄉村供給生活品和原料，如獸皮，硝皮，苧麻，亞麻，木材，五穀之類，城市則供給工業生產品。凡只能由輸入品滿足的慾望，則借助于商業，同時手工業又供給商業以輸出品。現在這種規模愈大與部門愈多的城市經濟形態是社會進步主要的擔當者，然此中的生產與消費仍是受規

定，並且十分穩定的。

我們在我們的考察中已經屢次看見每一個生產階段有規正生產關係的設施出現。並且這種規正的目的總是要使生產在一切部分都適合於當時消費正確的比例。就是在霍德中，當石斧生產得太多，生活品生產得太少，馬上必須將必需的勞動移在生產生活品上面。我們又看見一種原始的分工在霍德中也發展出來了。

這種規正在馬克中所達的步驟又要高得多。馬克是在公有的土地上生產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每個家庭自己完成必需的器具和衣服。冶工與陶工等等替大家服務，大家對於他們的活動即予以生活品，作為報酬。商品的生產與商品的販賣是沒有出現的。如果有一種原始的物物交換發生

了，這也只是偶然的，並且是恰恰適合雙方目的的。凡馬克中公共的建築，道路，和橋樑等都由大家共同參加創造，也由大家共同享用。馬克係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牠的消費是由經驗確定的，牠的生產是依照這種消費量有計畫地進行的。這就是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中生產的規劃。

在中古時代封建的農奴與工奴經濟中，滿足人們生活慾望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土地，——又人類的勞動力——這種東西已經落入地主的手中了。因此這裏是——和馬克對抗——一種階級社會的經濟。可是人們在賦役農院中起初並非着交易而生產商品，只是生產專供自己需要的物品，恰和在馬克公社中一樣。農奴與工奴生產物品，供給地主及其所屬的扈從與僕役之用。但勞動的種類與生產物的分配，已經是由地主獨自決定的。他從農工奴的勞動中首先取得滿足他自己慾望的東西。至于農工奴所剩的物品，是由他恩

准的，爲數有限。這已經是對於勞動結果的一種剝削，這是以生產工具爲私有財產的階級社會中一種經常的現象。

不過在農莊經濟的生產總還是有計畫地去適合那預先知道的物品需要的。這種生產的規劃適當，在牠的各部門中不會發生生產與消費間不相稱的毛病。地主們如果力求某種數量的過剩生產，那他們只是因防備荒年，戰爭或其他不測的事變而起的。

我們在奴隸社會的自足自給的經濟中也恰恰看見生產和消費適相符合。當商業愈加發揚，利慾薰心之事跟着出現，這種生產與消費的互符合才成泡影，在農莊經濟中是如此，在奴隸經濟中也是如此。然此等現象是後來才發展的；我們如果就純潔的方面去估量此等生產制度，則在霍德與馬克中有原始共產主義自由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在農民奴隸經濟與賦役農院經濟中

便有不自由的勞動力所經營的自給自足的經濟。

在中古時代的城市中又有些單個的營業者。他們是些獨立的行會手工業者，他們的勞動不復是供自己的需要，但大部分是製造商品，起初係由別人定做，後來逐漸在市場上出售。每個手工業者自己的需要是由他的商品與別人的商品交換來補充的，而這種交換因為有貨幣作交換工具，故十分便利。

但商品生產的數量起初還是估計得到；上門的營業與市場的慾望可以由經驗推測出來，所以每一種職業的手工業者能够有計畫地組織他們的生產。他們防備着各項職業中的老板不得太多，而老板所用的幫工與徒弟也不得太多，他們又注意不使任何商品製得太多，其他商品製得太少，必須使生產與消費永久恰恰相合。所以此處還是一種有計畫的經濟。

可是我們現在講到和現今經濟方法決絕不同的一點來了。——一個手工業者雖不知道他的商品是否能夠依常規的方法售出去，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生產商品，大家對於這個手工業者作何種感想呢？我們可以說，這個問題是多餘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一個這樣完全無意識做去的手工業者！各個生產者的行動不會完全這樣無意識，但就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體講，卻在這種沒有計畫的形態中從事生產。

自近世資本主義的生產出現以來，人類不復是為一個估計得到的市場而勞動，也不是為一種預先確定的需要而工作。城市的市場擴充到一個全世界的市場。資本主義的社會對於消費的數量不復能夠計算；商品的生產與商品的消費也不復有有計畫的組織上的關連。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是盲目進行的，商品是由遊行商人到處兜售的。到了後來，當商品堆積在貨倉

中和市場上不能脫售的時候，企業家出來向工人宣言道，因為過剩生產的結果，必須開除許多工人。否則他們只能在減少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條件之下工作。所以過剩生產對於工人就是指失業與困苦。

無怪乎工人在這種經濟方法之中要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因過剩生產而感受困苦，這是不能改變的麼？——在生產與消費之中不能恢復有計畫的進行麼，大家對於社會勞動的結果不能有正當的分配麼？

在早前的經濟階段中，我們曾經看見生產與消費之間是有計畫的：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方法中才完全喪失這種計畫。因此我們如果說，資本主義是經營一種無秩序，無計畫的經濟，我們的話是對的！這種有計畫的經營要配上最進步的技術和科學，才得重新出現，這就是近世社會主義所要求實現的一種經濟！這又是一種共產主義規制的經濟，不過牠是達到了歷史上可

能的高度了。

人類要達到近世社會主義這種可能性，必須經過從前一切經濟狀況，那都是發展中必然的階段。在每個階段中，那些在經濟上佔優勢的社會集團要履行一種歷史的必然的任務：就是，無論牠們願意與不願意，無論牠們有意與無意，牠們必須挾着牠們統治的手段對於以後要跟着出現的更高的階段，準備種種前提，道路與力量。在馬克中和在以後農莊經濟中出現的當權者——後者是不願意的——都做過此等事業，在城市中的行會手工業老板也做過此等事業。

城市手工業老板的統治權在歷史上解決一種任務，就是牠儘可能地使手工業中的技術改良，工具改良和實行細密的分工。行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是向着這個目的做去。牠們那些可笑的和多餘的規訂，如限制各手工業從事

于一定的活動等等，卻促成一種更細密的分工，因此引起一種更大的技術的進步。有了中古時代的分工，才能够引各種職業的出現，這是當時工作組織的性質使然的。現在的分工早已超過每個人從事于許多職業這一級，而進于擔任各單個部門中一部分的工作，所以在近世的營業中，一種生產物的完成要經過許多部分工人之手。

行會關於幫工到各地遊行作工以及要做老板的幫工須呈驗優美的作品等等的規定，足以引起技術的改良，工具的進步，和新發明，新出品的出現。

當手工業的時代有一批新發明出世了，如航海需用的羅盤針，改變戰爭方法，並使騎士的爭鬥術歸於無用的火藥，以及練鋼，印刷術，製紙等等都是；此等東西是新時代的輔助工具，牠們對於資本主義，在技術上做了一番預備的工夫。在行會經濟中的勞動發展替機器業開關了一個地盤。因為

要『手』工業工具的完善達到牠們的最高點，機器才能够出現。

當行會在可能的生產技術與社會的設施中能够滿足一切業經出現的慾望時，牠們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凡反抗牠們的爭鬥不會獲得勝利。因為牠們是一種根基穩固的經濟制度。但是等到更高的慾望與技術的可能一經發生，而兩者在行會式的生產範圍中不復能够滿足與利用，那麼，行會的組織便開始表現不適于生存，並且帶着一種退化的性質了。于是幾百年以前反抗地主制度與統治，並促成進步的種種條件，此刻對於新出現的慾望成爲一種障礙了。這些新的東西開始代表歷史的進步。行會要保持牠們陳舊的過時的生產關係，作種種反動的努力，然終久會歸于失敗。在幾百年以前，地主對於行會作種種在歷史上退化的努力的爭鬥，畢竟一敗塗地，行會此時所遭遇的命運也正復相同。就是現今資本主義的種種努力的爭鬥終久

也一樣要歸於失敗。因為資本主義不是社會發展中最後的與最高的階段。

○ 一種經濟生活因時代的推移而失去牠的存在的權利。哥德(Goethe)說得對實在新的歷史狀況之下，合理的東西變成荒謬的東西，好事變成壞事，全部社會關係也正是如此。

我們如果總括一下，便可以說，城市的制度比較以前賦役農院的制度，在分工上要細密得多，在組織上要有計畫得多；城市制度發展一種新的精神的活動，一個技術等級(Kunstlerstand)和一個學術等級(Gelehrtenstand)；並且因這種制度對於外界的結合甚多，遂將全部人口的眼界擴充了。到了後來，尤其是商界集有巨額的貨幣財富，只要可以招致充足的勞動力作為工資勞動者，只要有充足的大銷路，作為資本主義大量的商品生產的卸貨場，這種財富即可變作近世的工業資本，造成新時代的開場。這種新時代狀況

的運動是由好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推廣的，而美洲的發見尤其具有特別的意義。

大家對於人類向來所經過的全部路程如果從此回顧一下，必定更容易了解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發達的途徑觀察的正確。馬克思對於這種觀察曾經有下列的一種說明：

『在一種社會形態還綽有餘裕，足以容納一切生產力發展之前，牠決不會滅亡，在更高的新的生產關係沒有在舊社會的懷中養育牠們物質的生存條件之前，牠們決不會出現。所以社會所提出的問題總只限于牠能够解決的，因為詳細考究一下，便會發見，只有在解決問題的物質條件已經出現，或——至少——正在形成之處，此問題的自身才發生出來。』

昂格思對於這種觀察也說道：

「現社會的設施不合理，不正當，合理的東西變成荒謬的東西，好事變成壞事——當此類的見解日見增加，這就是指明，在生產方法與交換形態中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了變化，那在從前經濟條件之下形成的社會制度不復能與之相適應了。同時這也就是指明，那剷除此等被發覺的不良狀況的方法必定是——十分發達或不及發達——伏處在這些改變的關係中了。此等方法不須從腦袋中發明出來，只須藉着腦袋在現有生產的物質的事實中發現出來。」

第六講 協作，工廠手工業和機器業的資本主

義生產 大資本主義及其達到社會主義的固

有的傾向 (K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 durch

Kooperation, Manufaktur- und Maschinenbe-

trieb. Der Grosskapitalismus und die ihm

innewohnenden Tendenzen Zum Sozialismus)

當中古時代的初期，地產具有絕大的威權，直至數百年之久。因此土地是在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之中。至於商業與獨立的手工業還沒有發達。

人們殆不知有貨幣。主要的財富是由農業產生的。但土地以及附屬於土地的東西——人也在內——是落在貴族的大地主的手中，受他們的指揮與支配。大部分的羣衆是爲工奴或農奴。然新時代的種子在此等封建的自然經濟的狀況中逐漸萌芽了。商業以及商業所託足的城市應運而興，城市中獨立的手工業也逐漸抬頭。城市手工業的組織——行會——在劇烈的爭鬥中推倒了貴族的統治權，將城市的政權拿入牠們自己的手中，在行會統治之下，手工業達到牠的最繁盛的時代，並且代表當時經濟進步的最高形態至幾百年之久。

當城市手工業的經濟和主要部分的人口物質的利益以及思想，努力等等不相抵觸時，對於這種經濟也不會發生什麼有結果的爭鬥。但是到了後來，有許多事變引起一種對於商品和商品生產新的可能的慾望，而行會手工

業下更自多前已比季所的要求。因此手工業不復能爲進步效力了。

在這個重演的時代變化的門前，突然現出美洲的發現（一四九二年）。跟着又找出往印度的新航路。自許久以來，歐洲的商業即已想望此處地方被人傳說的財寶，但只有一條舊的商業道路，就是經過君士但丁羅堡，黑海，前亞細亞才能够達到此處。然土耳其人于一四五三年征服了君士但丁羅堡（Konstantinopel），毀滅了畢參提帝國（Byzantinisches Reich）這是六世紀人民遷徙時代所建的東羅馬帝國，後來並佔據了牠的首都君士但丁羅堡或畢參慈（Ezantz）。——這是原來建設此城的希臘人所命的名稱。文化落後的土耳其人現在宰制着塔塔列倫大道（Dardanelleustrasse），阻礙東方與西方的商業交通。德意志與上部意大利商業城市及沿海城市交通最古的商業大路——即維列笛格——一天寂靜一天，而德意志的商業和手工業當時已經失去一個重要部分的銷場。

自新航路發見以後幾十年之間，歐洲各國的經濟慾望趨向印度了。當一四八六年笛亞慈 (Bartholomaeus Diaz) 已經發見了非洲南端的一個尖角，起初名爲風浪角 (Kap der Stürme)，但隨即改稱爲好望角 (Kap Der Guten Hoffnung)。自美洲發見六年之後——一四九八年——迦馬 (Vasco da Gama) 已經因圍繞非洲的航行，發見往東印度的新航路。因此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商業交通受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意大利的城市完全喪失了牠們對於當時世界貿易的優勢。利薩邦 (Lisabon) 遂繼續列笛格而爲世界主要的商業市場。

自此以後，各種發見相繼而起，至數十年之久。卡布拉爾 (Cabral) 于一五〇〇年發見巴西，馬迦列 (Magalhães) 于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一年週 當時所知道的全部地球，科特慈 (Cortez) 于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一年

征服墨西哥，辟插洛 (Pizarro) 于一五三二年征服秘魯。所有此等土地的發見與開放予世界貿易——這種貿易向來是經過意大利的，尤其是從維列笛格經過德意志的——以另一種方向。商業的重心現在由地中海趨于大西洋的沿岸。這種經濟上顯然的收縮引起向來在經濟上佔優勢的商業國家政治勢力——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制——的崩潰，並且促成德意志商業同盟會的衰落。以後幾百年中的發達，在意大利的城市和德意志停頓了，西歐各國，即大西洋沿岸各國走入經營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的潮流中；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格蘭在地理的形勢上都是最爲便利的。

此等國家現在正站在重要的位置上，然牠們恰因此要首先經過革命的大爭鬥，此等爭鬥是起于那因資本主義而出現的大中等階級反抗專制的王權和封建政治的餘燼；這些國家首先經過那種到中等階級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革

命。里德蘭各地當時是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其北部各地（即現今的荷蘭）于一六四八年已開始反抗西班牙，經過幾十年的血戰，卒被承認爲共和國。同時英格蘭（一六四九年）對於英王查理斯第一（Charles I）處以死刑，第一次中等階級的革命由此告終，而中等階級在全部國家政治上的參預權也由此確定，並且日見鞏固與擴充了。此等轉變的原動力是出于經濟關係中已有的和正在發動的變化。向來只限於舊世界的商業自各種發見以來，即發達成爲一種真正的世界商業。海上貿易超過陸上貿易了。

磁針與羅盤予海上旅行以一種更大的安全。有許多向來不爲人所知道的生產物，如珈琲，穀米，白糖，可可，煙草等都因海運開通而輸入歐洲；又馬鈴薯也輸入給我們了。至于歐洲商品的卸賣與商品的製造是有一種新的和向所未有的大機會，尤其是被美洲巨大的金銀礦的開闢推廣了。

依據歷史的報告，辟插洛對待所發見的地方，非常慘無人道，當時西班牙傳播『文化』的人們用極殘酷的手段，強迫美洲的土人對西班牙供給整船的金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美洲金錢產地的發見，土人在礦山中的被驅策，殺戮和活埋，東印度的開始被征服與被劫奪，非洲的被作為獵取黑人的奴隸貿易場——如此等類指明貿易資本主義生產紀元的曙光。』

歐洲的自然經濟已經因城市經濟而逐漸消滅，自大批金子流入歐洲後，貨幣經濟即開始代替自然經濟，既十分迅速，又很普遍，同時生產也變成資本主義式了。『在歐洲以外直接由宰制，搶劫，和殺戮而獲得的財寶流入祖國，變成資本了。』（見資本論第一卷。）商業資本最初總是直接佔勢力的。商業與搶劫，欺騙，暴力是聯合一起的。從東方帶來綢緞和其他貴重物品的商人不僅是精明強幹的人，並且還是持有武裝的強暴的人。劫

奪其牠隊伍商人以及在海洋行劫是與商業相輔而行的。哥德對於此事說道：

『商業，搶劫與海賊——

三位一體離不得。』

一般商人與原始人民交易，更是以無價值的東西換取他們貴重的物品。（在近代殖民地貿易中，商人仍是用酒和雜色玻璃珠子換取土人的大財富，如貴重的象牙，家畜或土地之類。）自十六世紀的近世發達以來，這一切事情都出現了。歐洲起首最大的資本是于美洲與印度發見後從該兩處搶來的。在寄居美洲的吮人血的暴徒中，西班牙的科特慈和辟插洛是最著名的人，然因此等暴徒的搶劫，他們的祖國都富足起來了。

首先從事于資本主義的生產並開闢印度的民族是荷蘭人。馬克思對於

他們的殖民史說道，這種歷史展開「一幅無與比倫的背叛，賄賂，暗殺和卑鄙的圖畫。」新出世的荷蘭資產階級爲獲得勞動力，向爪哇殖民起見，簡直從事于搶人的勾當，並且是完全有計畫地幹去的。凡被特別組織的搶劫隊捕捉的人都關在收留牢中，直等待奴隸船來到，然後運往殖民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及過一種官場報告，內中描寫馬卡薩 (Makassar) 城市中『充滿了秘密的牢獄，一個比一個可怕，所有牢獄都滿關着用鎖練子鎖住的人，而此等人是由基督教民族的資本從本國搶來的』，並且是作爲奴隸送往殖民地的。馬克思又提及一樁事，就是荷蘭人對於馬拉卡 (Malacca) 城市的葡萄牙總督行賄，准他們入城，迨他們達到目的後，即殺死葡督，將從前幾十萬賂金取回，並且將此城佔據了。

荷蘭既有了滿身血腥的貨幣，牠的資本即開始在本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生

產方法，當印度的人口被掠奪到皮破血流時，荷蘭本國的下層民衆也因一種新的勞動制度而愈加大批地受剝削，這種制度使他們比從前更加窮困了。

英格蘭人也和荷蘭人一樣地幹去。當一六〇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

(Die Engsch-Ostindische Komp. n e) 在倫敦成立了，這是資本家私人的一個團體，約在一八五〇年牠即享有在印度『經濟開放』的充分自由，這就是說，享有依照矯揉造作的規則，掠奪印度的自由。這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一七五七年至一七六六年的十年之間讓印度人『送了』一萬二千萬馬克的禮。印度人因為『送了這些禮』，他們自然是迫得過極苦的生活。我們

為表示英國人的致富方法起見，只要舉出一個例子：在一七六九年與一七七〇年之間，他們對於『送了豐富禮物』的印度，引起一種人為的饑荒，因為他們收買了一切米糧，屯積居奇，非獲得絕大的價格，不肯出售。英國的

資本家因這種居奇餓死了無數的印度人，但他們賺的錢確是不少。當英國人後來開闢新英格蘭（在美國的西部海岸）時，他們懸出特別的價格，殺戮土人。凡從十二歲以上的土著男子的首級和婦女，小孩子的首級，都有一定價目表。中等階級的著作家霍衛特（W. Howitt）著書描寫殖民地所用的掠奪方法，壓迫方法，和此處所述的事項，他在殖民與基督教（*Kolonisation und Christentum*）中說：

『所謂基督教的人種對於他們所能宰制的每一民族，每一種人民所表現的野蠻態度與殘酷行爲，在世界史的任何時代，任何人種——無論此等人是怎樣蒙昧，無教育，無同情心，無恥——中是無與比倫的。』

英國的國會討論殖民地的事件，宣言要殲滅美洲和澳洲的土人，凡砍下

他們的頭顱，敲取他們的骨髓，都是完全聰明的並被許可的殖民方法。資本主義的世界向非洲獵取黑人，每年有無數千萬的黑人輸入美洲作為奴隸，這種最無恥的販賣人口的事延長至三百年之久，這是被世人允許的。尤其是英國人自十六世紀以來，參加輸入美洲的奴隸貿易。那些比牛馬還不如的人在輸送之中，因待遇不良——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照例要死去三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二；然殘存的人可以賣得更高的價格——此等人是依照所有在運輸中的人平均的費用計算的——便足以補償死亡的損失。海列（Heleno）的奴隸船（*Sklaverschiff*）和托姆叔父的帽子（*Onkel Toms Hütte*）就是敘述此等慘酷的黑奴狀況的小說，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在幼年時代讀過這種小說，牠並且引起前代的人對於美國黑人解放爭鬥的同情。

荷蘭人，英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是這樣做，法國人以及德國許多

富商大賈也是這樣做，因為他們對於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往美洲及印度的商業隊伍是同樣參加的。到了十五世紀的末年，德意志的各城市中就已經有人賺到幾十萬甚至於幾百萬戈爾登（Gulden 譯者按，一戈爾登約合墨銀一元）。就中在奧格斯堡的維爾色，佛格爾，帕姆高特列，和合格斯特脫（Hochstetter），在魚恩柏格的托黑等家都是比較著名的。最重要的貨幣的來源除商業外，還有礦產，家庭工業的建設與剝削，和貨幣的出借。

當時以極高的利息，將貨幣借給窮困的王公大人，獲得巨大的利益。當一四八七年的時候，佛格爾家的財產為二萬五千戈爾登，至一五一一年增到二十五萬戈爾登，至一五二七年增到二百萬戈爾登，至一五四六年是牠的極盛的時期，竟增到四百五十萬戈爾登。這種盤剝重利的事業是完全和現在一樣進行的。當時一般從事於大資本家已經聯合起來收買全部產

物，大家相約非在一定的高價格之下不得出售，此事開始于對意大利義的貿易中，後來漸及于對內貿易，甚至于涉及于農業生產品。他們因這種商品的盤剝獲得巨大的利益。可是一般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等非常痛恨他們，當時最重要的人物如伊拉斯穆斯 (Erasmus)，慈衛格立 (Zwingli)，霍頓 (Hutten)，漢斯薩克斯 (Hans Sachs) 等等都發出激烈的言詞，藉以洩憤。馬丁路得 (Luther) 宣言道：『他們將一切商品攫入手中，為所欲為，他們恬不知恥地任意增加並抑制商品的價格，他們壓迫一般小商人和鱈子魚吞噬小魚一樣，他們儼然是上帝所造的人類的主人，不受一切信條與博愛的制裁。』他在另外一節段中又說：『人們對於攔路的強盜與暗殺者，處以車裂和斬首之刑，然他們對於一切盤剝重利者尤其應當加以詛咒，驅逐，車裂和斬首的處罰。』

起首的資本是發生現今經濟制度重要的先決條件，馬克思對於此等資本歷史的起源情形說道：『資本的出世，自頂至踵，一切毛孔都滴出血質和穢質來』；不獨馬氏這種可怕的話是對的，即目觀這種過程的歷史上重要人物也立刻看出此過程的擔當者是一些重利盤剝者和強盜，並且指摘他們的旗幟上所書的是：以任何代價求得財富！這種行爲是對中古時代一切舊的習慣挑戰，而受人們的唾罵，然牠在歷史上革命的將來的遠大意義却不爲當時的人所了解。

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除掉集合大批現金外，造成大批『自由勞動者』也是緊要的，所謂『自由勞動者』是指既非奴隸，又非奴農奴工的工人，他們對於生產工具和所生產的商品沒有所有權，他們只是出賣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的人，無論在何處，只要有工作的機會，他們即從事于勞動。『貨幣所有

人要將貨幣變成資本，必須在商品的市場上找得自由的勞動者，所謂自由的勞動者，具有兩重意義：第一，他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將他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第二，他沒有其他商品可以出賣，他對於實現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一切東西都是一無所有的。（見資本論第一卷。）

這樣的勞動者是有的，同時因商業及其他金融事業的盤剝，殖民地的征服與搶劫，必需的資本也有了。至于此等勞動者的來源大概如下：一，行會手工業中有過多的幫工，他們沒有希望升到當時老板獨立的地位；二，封建侍從的解散，這是由于法律的督促，（例如在英國，）與騎士閥的衰落；三，在宗教戰爭中修道院的被廢棄——凡這些地方不復容納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都變成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可是統治階級強奪農民的土地，驅逐農民，因此從農業人也造成大批的『自由勞動者』。此等工人層（Arbeiter-

chic ten) 社會形成的歷史和最初資本形成的歷史一樣，是以血腥和殺戮為標記的，暴力是接生婆，在彼處是如此，在此處也是如此。

考茨基在他對於托馬斯·穆爾(Thomas Morus)所著的一部書中描寫英國以怎樣可怕的方法驅逐農民離開土地，以便初起的工廠毛織物業獲得羊毛和工人。這位著名的英國大法官和天主教的聖徒穆爾在他烏託邦(Utopia)一書(一五一六年出版)中說『人是被羊吃了』。他于一四七八年出生于倫敦，至一五三五年以『叛逆』的罪名被處死刑了。他的烏託邦中說：『一個貪婪無厭的人真是他的出生地的瘟疫，他可以兼併幾千畝土地，圍以籬笆，運用暴力和侮辱驅逐原來的土地所有人，所以此等人迫不得已，要將他們的一切東西賣掉。他們因受種種不正當的方法的播弄，日趨貧窮，愚魯，困苦！他們這些可憐的男女老少，鰥寡孤獨，資財既少，人數又多，

因爲農業本來是需要許多人的。他們既要離開長久相識相安的家鄉，又找不到棲身之所；他們的家具雖沒有很大的價值，然若在別種情形之下出售，也可以得到一筆款；可是他們忽然被驅逐，便不得不依照濫價，脫貨求財。當他們四處飄蕩，牀頭金盡的時候，除掉行竊以外，還有何事可做？啊，這麼一來，他們要受一切形態法律的制裁，被處絞首之刑，或是落入乞丐的隊伍中。他們于是又會被捕入獄，因爲他們是不勞動的流氓；其實他們雖具有熱忱，願意勞動，也沒有人雇用他們。」

英國的女王伊利雜伯慈 (Elizabeth) 埋怨：『到處是貧民！』她在一
次巡幸之中親自看見將教會的地產賜給貪婪的寵臣近倖，或賣給投機的佃戶
與城市富人，他們即驅逐向來棲息于此等土地上的大批農僕，使他們的小經
濟一齊破產。在英國是如此，即在法國，荷蘭，德國，以及其他牠跟着進到

資本主義的一切國家也無不如此，此等國中最初用于工業的自由的勞動力是由農民中『製造』出來的，因為牠們直截了當地奪去農民的土地，迫令農民放棄農業。

然『自由的』勞動力從此等泉源中流出來非常之多，以致那尚未發達的資本主義，對於牠們的數量和適用的程度，馬上就不復能夠容納了。依他們的適用的程度講，起初只有智識的手工業工人能够適應于新狀況的關係。可是農業人民對於新生產方法的要求，缺乏一切職業的預備，因為他們是從完全不同的生活方法中被驅逐出來的。所以有許多農民無事可做，陷入窮困之中，變為流氓與強盜了。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當時有大批的乞丐和貧民出現，這個可怕的流氓無產階級有一部分被嚴酷的法律殲滅了，有一部分被『訓練』為資本主義服務了。英國于一五三〇年用法律規定對於

一切流氓當處以鞭笞之刑；到了一五三六年又增加條例，對於一切流氓當割去半隻耳朵；凡偷竊東西而被捕捉的人即處死刑。英國單是從一五一〇年

至一五五〇年之間（在顯理第八統治之下）絞死竊賊在七萬二千人以上。

一五三〇年規定：老的和沒有工作能力的乞丐當持一種特許的行乞券。反之，身體強健的流氓就要受鞭笞。他們被綁在車子上挨打，一直到皮破血流，才令他們發誓回到他們的出生地或他們最後三年停留的地方去，『從事工作』。這是一種殘酷的命令，因為要他們找得工作去做工人，是不可能的！他們在流蕩中如果第二次被捕捉，除掉照例鞭打以外，還要割去半隻耳朵，他們到了第三次被捉，即被視為公共的仇敵與要犯而處死刑了。

所以現今工人階級的先驅被迫而變成流氓與乞丐，就是這樣去加以矯正的。

英國取締流氓的法律共有四五十種，都是屬於野蠻的刑罰之類，如打火印，傷殘肢體等等。在德國和其他國家中也有相似的嚴刑酷罰。馬克思說：『一般喪失土地，橫被驅逐，因而到處流蕩的農業人民就在工資勞動制度所必需的訓練之下被鞭笞，被打火印，並被處其他身體刑。』

這樣訓練大批羣衆成爲『自由的』工資勞動者的形態是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發展中第一種必需品，恰和最初資本的共同搶劫是一樣必要的。這種暴力是兩者的催生婆，在自然的發展律不能十分迅速形成生產條件之處，牠就毫不憐恤地加以督促。

生產根本上的變化就在牠不復由一個城市的各行會聯合附近的鄉村作爲原料與生活品的供給者，造成一個狹小的城市市場，牠是要滿足世界市場巨大的新慾望，這種任務是侏儒形態的手工業擔負不了的。手工業生產的狹

小容積因此要爆裂。 以手工業的勞動方法自然不是簡簡單單完全被消滅，全部行會權同時被勾消，解決這種歷史任務的途徑是在利害不同互相對抗的兩方經過幾世代之久的爭鬥；這種爭鬥是應用經濟的方法，但同時也應用政權作為輔助，因此打破行會制度的狹隘限度，開闢新制度的自由途徑，行會制度畢竟要在這種新制度之前消滅了。 一種經濟制度決不會一次完全消滅，而代以一種新的經濟制度；要等到後者佔得十分堅強的地位，前者才因不適于生活而死去。 可是舊的制度在新的制度的旁邊總要存留到很長久的時期。 要使新的經濟制度布滿全部陣地，這是一種長久的社會利害爭鬥的事業，在此等爭鬥中要從一定的階級獲得牠們的救援，從當時的狀況獲得牠們的任務與形態。 在當時的商人是第一種革命的勢力，這種勢力因手工業的生產方法，對於牠過于狹小，發生障礙，遂向之宣戰，引起一種新的生產

形態，這種形態在我們現今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又加擴充了。

向來的商人只是從行會手工業的工場購買現成的商品，再轉賣給別人，但他們此時自己開始供給資本，製造大批的商品，以便銷售。

他們到鄉間雇用貧困的農民從事家庭內工作，至于原料，如羊毛，麻，紗，甚至于織機，是由他們供給的，他們以低廉的工資，令此等農民將原料織成布匹，藉在世界各地獲取重利。或者他們又雇用習于手工業的帮工與老板各在自己的家中，用自己的手工業工具從事工作，而製造品的虧贏則由商人擔負責任。所以商人假手于農民的家內勞動與手藝工人的工場勞動使生產變成資本主義的大營業。

他們並且更進一步，從事于大規模的工廠手工業，在這種工廠手工業中許多勞動者因集合在一起勞動，取得聯絡，遂使生產提高了。手工業的家

內工場制度——包含許多住所與小工作場——和手工業的工廠制度兩者都產生一種在歷史上可能的並且必然的生產增加，這是行會經濟制度的範圍內不能夠達到的，但這種生產的增加是指一種超過手工業的進步，即是手工業經濟組織開始滅亡的表徵。

在資本主義的家內工場制度中，舊的手工業式的生產與手工業的工場勞動兩者的差異尚不十分顯明。因為舊的手工業的勞動方法在後者中仍然存在；反之，在工廠手工業的勞動中所有勞動已經是精密的部分勞動。一個工人從頭至尾完成一件東西——這種手工業的方法，現在是被拋棄了。

自勞動劃分為部分勞動，各種工具因為要適合各部分勞動，便愈加改良了。還有一層，自有部分勞動，一大批簡單的勞動可以由那些未經學習的工人擔任。所以未經學習的勞動力第一次出現了。

勞動的生產力在這種手工工廠業的勞動中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尤其是機器出現的前提已經造成，而機器將勞動的生產又大大地提高了。最初的機械並不是用蒸汽發動的，但是用人的手足，或風力，水力推動飛輪的。所以凡要用發動機的工廠起初總是儘可能地設置在流水的旁邊，以便利用流水作為發動力。

自英人瓦特 (James Watt) 于一七八五年應用蒸汽作為機器發動力後，真正的近世資本主義時代才出現，這種蒸汽的應用在經濟發展中所引起的變化大于並速于其他任何種發明。自有此事的發生，我們的時代才開始，這個時代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分割了地球的各處，但同時牠使階級爭鬥達到最劇烈的形態，只有假手於社會主義，才能夠使這種爭鬥告一個結束。

蒸汽機的應用一直至十八世紀末年為止，只限于英國。到了十九世紀

的上半期，這種機器傳播到全部近世文明世界，作爲勞動工具和交通工具。可是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葉，製造機器仍是極其有限的。蒸汽機真正佔優勢的時代，始於工作機的出現，這種機器使機器的製造臻於完善的地位。當一九〇七年的時候，德意志有九十萬七千零四十八人從事於製造機器的工業。

當資本主義生產的開始，即已使一批物質的和理論的附屬現象 (*Neben-erscheinungen*) 日趨發展。水陸交通與郵政制度都有進步。在政治上，是構成帶着資產階級色彩的國家組織，並且發生一種立法，規定本國生產及商業的權利和自由，以及國外彼此間商業權利的關係。可是因應用蒸汽所呈獻的巨額生產的增加已經使每種社會現象大大地發達了，在一個短時期間——象馬克思所說的一樣——地球的面目全部改觀了。

例如在七八十年之前，我們德意志的勞動差不多還是專由人力擔負的。當一八四〇年普魯士只有六百三十四架蒸汽機，共計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八匹馬力；至一九一〇年，普魯士有六萬零一百二十二架固定的蒸汽機，共計八百萬八千四百零五匹馬力，這就等於一萬九千二百萬個人力。因為一個機器馬力是作為二十四個人力計算的。

要發動機器尤其需要煤炭。普魯士在一八二四年只需要一二百萬噸煤炭。至一九一三年全德意志帝國需要一萬九千萬噸煤炭。製造機器以及製造其他物品的材料尤其需要鐵。德意志（盧森堡也在內）毛鐵生產在一八八〇年只有二百七十二萬九千零三十八噸，至一九一三年增至一千九百三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噸。

那種由煤炭火力所產生的蒸汽力又已經被一種更強的力量勝過了，即被

自然力所發生的電力勝過了。在大電力中心點的山中，水力因電氣技術的進步，產生光，熱和運動力，用線通到很遠的工廠，作坊和住宅中。人們在很遠的約丹 (Ejordan) 用電氣熔爐熔鐵，要節省許多勞動力，並且鑄成各種有用的形態。在大工廠中不用煤炭，但用電力做發動力，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有一個爭持的問題，就是要將海潮漲落偉大的力量和太陽的熱度用在電氣之中，當這個問題一旦解決了，那麼，從空氣中間取得電氣去達技術目的的新聞就會出現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所發展的商業，其範圍的廣大是前所未聞的。德意志的世界貿易在一八三〇年輸入與輸出共只有六萬六千萬馬克，至一九一三年已經有二十一億馬克。

在交通工具方面——這是保持近代世界生命的血管和腦筋——鐵路代替了簡

單的郵政馬車和商業馬車，汽船代替了帆船，至於遠地的消息交通也是由騎馬傳遞而進於一種新式的郵政傳遞，最後則進於電報與電話。

這全部龐大的發達的機構是比較新近的，自我們看來，好像是當然的現象，然我們的祖宗却是第一次見着這種機構發生的。斯提芬孫 (Stephen-

son) 是一個伙夫的兒子，他起初做牧童，後來做馬夫，伙夫助手，照顧機器的人，至十八歲才開始讀書寫字，他於一八一四年成爲近世鐵路機關車的創造人了。但直到一八二五年英國才有最初的鐵路出現。一九二五年九月

二十七日是近世鐵路制度出生的百年紀念。德意志至一八三五年才有鐵

路，並且只是從魚恩柏格至瑞特 (Firth)，僅長六啟羅米突。自此以後所

修的有布鬧施歪格至瓦爾芬布特爾 (Wolfenüttel) 鐵路。一八三九年有萊

比錫至諸列斯登鐵路，一八四〇年有萊比錫至馬格德堡鐵路，敏興 (Mün-

hen)至奧格斯堡鐵路，佛郎克佛至梅慈鐵路，曼海姆 (Mannheim) 至海德爾柏格 (Heidelberg) 鐵路，一八四一年有柏林至安哈爾特 (Anhalt) 鐵路，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至歐爾伯費爾德 (Elberfeld) 鐵路，寬恩至阿痕鐵路等等。德國的鐵路網在一八四五年不過二千一百三十一啟羅米突，至一九一三年已經增至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啟羅米突。

鐵路制度的出現，這是在資本主義慾望之內的。資本主義自身創造了最初的鐵路，並且還是和輿論的潮流作戰的；最初的鐵路是資本家私人的企業。凡現今國家據有鐵路之處，都是從資本主義的手中收回的。

第一艘航海汽船薩頑拉 (Savannah) 於一八一九年第一次橫渡大西洋，然還有一部分是利用風篷的。這隻船容積頗小，船長三十又半個米突，載重三百噸，從美國薩頑拉的棉花港口到歐洲的棉花市場利物浦 (Liverpool)，

需時二十六天。現在從歐洲航海至美洲只需一星期。露西潭尼亞號 (Lusitania) 和帽列潭尼亞號 (Mauretania) 從王后鎮 (Queenstown) 經珊笛 (Sandy) 到霍克 (Hook)，只需四天又十四點半鐘。元首號 (Imperator) 和祖國號 (Vaterland) 爲世界最大的載客船，各載重逾五萬噸，這是在漢堡 船塢建造的。在世界大戰之前，全地球的商業船和交通船除掉帆船外，已有幾萬艘汽船。

德國在一八七二年有七千三百三十四個郵政局，至一九一三年有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個郵政局；在這兩個年中所送的信件和包裹從九萬七千二百零四萬二千增至七億三萬二千九百零七萬七千，電報的次數，由一千二百一十六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增至五千一百八十五萬八千。我們知道大詩人系勒 (Schiller) 于一八〇五年逝世，經過二十天之久，他的死耗才從維馬 傳到維

也納。現在一樁大事在幾點鐘之內就傳遍全世界了。

無線電的進步更是迅速。一九一四年的宣戰，傳達海外的情形，有人

描寫出來，真是一種奇觀。塞拿 (Corriere della Sera) 的戰爭報告者巴

集尼 (Luigi Barzini) 描寫這種情形登在活息報上 (Vossische Zeitung)。

他說：『大戰爆發的消息同時傳達到世界一切海洋中了。各最大的無綫電

站將這種可怕的消息傳過海洋。從薄爾德隙 (Poldhu) 開始；格拉斯灣

(Glace Bay) 響應，紐約將此項消息傳到最遠的無綫電站；波洛亞列 (Lafos

Aires) 和卡蒲城 (Kapstadt) 更是張耳靜聽；亞登 (Aden)，香港 橫濱使

以六個不幸的字報告西半球。這六個字是「德已向俄宣戰」。在二十分

鐘之內，從這一大陸至彼一大陸的驚人消息已經傳遍全世界了。千百艘船

在大洋之中聽到這種消息，都戰慄起來。沒有一種大暴風雨的報告曾經使

這許多船這樣驚惶恐懼，拼命逃遁的。」所以海洋已經不是得不到消息的地方了；近代汽船上的旅客每天由無線電獲得最新的世界新聞，在他們的船報上宣佈出來，當大戰爆發時，德，法，英文的逃避命令連接向各船送去，指令牠們逃入中立港口。那些已經瀕于滅亡的船舶都因得到無線電報而獲救，U號船(U-Boote)也是因無線電而接到命令的。

講到這種消息傳遞制度的起源，又令人憶及這是何等迅速。在百年以前，人們造成信號機(視覺電報——Optische Telegrafen)即是一大步，這是法國工程師狹白(Claude Chappe)在1792年的革命時代初次製造的。當時沿着大路設置木架，用三根活動的桿子向前方作種種標記，因此也頗有成就。可是從一個木架向另一個木架正確的視察，與正確的傳遞，須有順利的環境，並且歷時長久；在夜間，霧中，雨中和雪中即不能夠

傳遞消息。第一種視覺綫是于一七九四年建設于巴黎與利里（Lille）之間；後來英國·瑞典，丹麥，和普魯士都跟着作這樣的設備。普魯士最重要的視覺綫是從柏林經馬格德堡，布蘭施奎格，帕德邦恩，寬恩，邦恩（Bohn）而達科布列茲。

此外又有上面所稱的近世的電報設施，更發達至電話。當一八八一年，德意志的郵政區域有七處地方設置電話局，打電話的數目達五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四次。至一九一三年，德國已有四萬零八百四十三處地方有電話的設備，打電話的數目達二十五億一千八百萬次。

最近交通發達非常迅速，而其不斷的進步尤未可限量。當大戰以前，

德國經營第一條長距離電綫，從馬格德堡到萊比錫，經過載蒲斯特（Norst）到俾特費爾德（Bitterfeld），又從萊比錫到哈列。現在我們已經是民窮

財盡，其他各國也許要超過我們而開闢這一類長距離的電綫。大戰的影響也許使我們真正踏入新進步的途徑。無論怎樣，新的可能性是不會消滅的。我們在報章上已經看見有磁線 (*Magnethahn*) 爲外國路線工程師最新的計畫。

當一百年以前，人們在旅行之中，或是步行，或是騎馬，或是乘驛馬車，或是坐旅行馬車，十分勞苦；而他們所經過的道路，非常之壞，幾令人不能相信。普魯士在一八一六年約有五百英哩大路；現在超過一萬英哩大路。從前快郵馬車——沿途停止換馬——從柏林往萊比錫，布列斯鬧，或寬尼格斯柏格 (*Königsberg*) 所費的日子數目差不多等于現今鐵路上的特別快車所費的鐘點數目。人們現在又開始征服天空作爲交通區域了。當一九一四年五月，德國的飛船 *L3* 號在空中支持三十六點鐘，飛過巴登，亞爾薩斯，

佛郎克佛，布列門，黑爾哥蘭 (Helgoland)，斯特庭 (Stettin)，和柏林。當時視爲一樁大事，德國飛行家隙特 (Hirth) 于五點二十分鐘之內從柏林飛到敏興，也同樣視爲一樁大事。然自此以後，在大戰中飛行事業的進步誠出人意料之外。現在飛機的速度每點鐘差不多近三百啟羅米突。我們看見英，美的飛行家乘飛機飛過海洋與大陸，並且已經作全世界的飛行了。

活列斯 (Jules Verne) 幻想的作品，描寫他的小說的英雄于八十日之內旅行全球，當大戰前，此事在實際上已經超過他的幻想了。祖父在大路上旅行，每點鐘走三，四啟羅米突，父親在鐵路上旅行，每點鐘行五十以至一百啟羅米突，孫子在空中旅行每點鐘的速度又要大得多了。

克列爾 (Gottfried Keller) 曾在兩首詩中做過一個最勇敢的夢，就是在百年之內若有飛船出現，他將投身于氣海之中；現在這種投身氣海的熱望已經具有實在的形態

了。

關於交通的可能性一項——特別是商務交通和運輸交通——除掉電線以外，還有汽車的交通。世界建築汽車路，使汽車得盡量發揮牠的運輸力的時期也許不遠了。這種改革早已用不着像我們親眼看見的那樣的大變化。重要的城如柏林、布列斯鬧等等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才開始應用城市馬車；四輪大馬車才于一八四三年出現于漢堡，一八四六年出現于柏林，一八五四年出現于敏興，一八六二年出現于布列斯鬧。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後的許多年中，柏林的公共交通還是由好些四輪馬車路線獨霸的。只在幾十年以後，人們才使用電車和汽車，然空中電車路線與地底電車路線久已爲近世城市交通真正的指標了。

電氣將交通，運輸和燈火的組織改革了，將瓦斯與煤油逐出平常的住宅

之外了，人們也將從燒火的集中點，按照需要，從最遠的屋子中輸送熱氣到各住宅中去。各家廚房烹調的器具也許愈加送出屋外，集中于各大中心點，因共同合作而節省勞動，並獲得其他利益。電話將愈加侵入各住宅，而成爲家常的需要。凡此種種改革以及其他許多改革在技術上的可能性已經表現出來了，富裕的家宅利用此等改革，已經是一天多似一天，只要牠們是十分方便，將日見推廣，因爲將來總是有更多的人的感覺與思想會達到一點，視舊有的設施不能獲得愉快與家庭幸福，必須加以改革。

然在這個充滿懷疑者和不信任者的世界上，此等改革好像是涉于幻想，大家必須和一大批反對者以及『懂得實際情形的人』相爭持，才能够達到目的。拿破崙第一要將佛爾頓(Fulton)——汽船的發明者——送入瘋人院；衛塞的船員(Weserhiffer)搗毀他的汽船，恰和織工搗毀最初的工廠織機是一

樣的。英國的物理學家拉德列 (Radner) 于一八三六年猶宣言：『開闢一條海洋汽船航路的思想 and 到月宮去旅行的思想是同樣完善的。』當斯提芬孫 于一八一九年造成他的第一個機關車『火箭』 (Rocket) 時，英國的季刊評論 Quarterly Review 說：『我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過火的計畫，不能盲從，人們要造成一條鐵路，利用蒸氣在上面行車，並且比快郵馬車還要快一倍，我們對於這種愚蠢的不能實現的理想，只有付之一笑。人們爲什麼不更想到用康格列夫 (Congreve) 的火箭一射，即從一處地方達到牠處地方，作這樣的旅行呢？』

教皇格列哥十六 (Gregor XVI) 宣言鐵路是一種可詛咒的交通工具，巴瓦利亞 (Bavaria) 的高等醫藥部發出一種有名的議論，說鐵路的營業有礙于公衆康健的利益，因爲牠的迅速的運動對於旅客和旁觀者一定要產生一種

心神錯亂的毛病。在萊因省議會中不僅于一八三〇年提出鐵路計畫被人反對，即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五年仍是如此。當鐵路久已實現了，一般科學家 and 「懂得實際情形的人」猶在口講指畫地證明那是不可能的。當這種「不可能」的話不復保持得住的時候，他們又轉個向反對向前的進步。齊泊林（Zeppelin）伯爵因為相信一隻容易制御的飛船可以成爲事實，許多年來他被人嘲笑——此人後來又讚美他不置——爲呆子，這是一樁人所共知的事。

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各種發明與改革連接不斷地呈現出來，此時代尤其是促成人口的蕃殖，和人口的集中。當小資本主義進到中資本主義，後來更進到大資本主義的時候，牠便使散漫農場的農業地變爲寬廣的工業區域，使手工業式的小鄉村和城市變成人口密集的熱鬧的工業中心點，凡喪失舊有根基的人都從遠處擁入此等地方。

今試舉幾個粗淺的例子：格爾孫氣興 (Gelseskirchen) 在五十年前，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地方，共有居民八百四十四人，後來才建設第一個街市希伯尼亞 (Hibernia)；一八七一年增至七千八百二十五人，一八八〇年增至一萬五千人，一九〇〇年增至三萬七千人，一九一〇年增十七萬人。桓博 (Hamborn) 于一八七一年有居民二千二百七十二人，一九一〇年增至十萬零二千人；薩布留克 (Sobruken) 于一八七一年有居民七千六百八十七人，一九一〇年增至十萬零五千人。

大柏林前城人口的增加尤有突進之勢：威爾墨多天 (Wilmerdorf) 的人口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由一千六百二十六人增至十一萬人，在同一時期內，禪列柏格 (Schöneberg) 的人口由三千四百零七人增至十七萬三千人，鈕寬恩 (Neuköln) 的人口由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增至二十三萬七千人，霞

洛登堡 (Charlottenburg) 的人口由一萬九千五百一十八人增至三十萬六千人。

當一九一〇年的時候，全普魯士的居民有四千零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九人；在一百年以前（一八一六年）只有一千零三十萬人。在一百年之內，人口的增加竟有四倍，內中因戰爭（一八六六年）而獲得的人口約有四百三十萬人。

當一八〇〇年的時候，普魯士只有柏林一個城市的居民超過十萬人；瓦沙 (Warschau) 普魯士于一七九五年獲得此城，布列斯鬧和寬尼格柏格三個城市的居民各超過五萬人，丹漆格，馬格德堡，亞爾濱 (Elbing)，斯特庭，薄慈丹姆 (Potsdam) 爾佛特 (Erfurt)，薄孫 (Posen)，哈爾柏城 (Halberstadt)，哈列，敏斯脫，希爾德海姆亞姆登 (Emden) 布蘭登堡，和佛郎克

佛十四個城市的居民超過一萬人。其他一切城市居民都少于一萬，有五
千，三千，一千，五百或更少不等。大家可以領略所謂特別的城市是什麼
東西。牠們大部分是純粹農業經濟的，如果要就現今所謂「城市」的意義
講，那在百年以前，普魯士沒有一百處地方配稱為城市的，就是我們對於大
城市的意義極力減低些，牠也沒有四個大城市。直至一八七一年，普魯士
的柏林，布列斯鬧，寬恩和寬尼格柏格四個城市才各有十萬以上的居民；反
之，到了一九一〇年這樣的普魯士「大城市」已經有三十三個了。

當一百年以前，德意志境內的居民少于大戰前同一區域內的居民三分之
二，就是從前的居民約在二千四百萬以上，至一九一四年則為六千七百萬。

人口增加最多的地方大半為德國的工業區域，如施列西 (Schlesien)，萊因
省，撒克遜的自由邦等處是。我們可以說，德意志近百年來人口的增加多

于以前一千八百年的人口增加，就是多于羅馬人入據德意志以後的人口增加。這種事實已經指出新時代巨大的變化，而一般居民聚處于少數地方尤使這種變化的力量加強了。當一八七一年德國只有八個大城市，至一九一〇年已有四十八個大城市。斯居拉斯堡，薄孫和丹漆格雖因萬歲宮的條約而離開德國，然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戶口調查，牠仍保持着原有大城的數目。因為利芝頓柏格，盧伯克和敏斯脫三城市已經超過十萬居民，可以作以上三城的抵補。當一八五〇年每三十八個德意志人中有一個大城市的居民，至一九〇五年每五個人中有一個大城市的居民，現在差不多已經是每三個人中有一個大城市的居民。這樣近世的聚居及其裏面所伏處的原因對於德意志人精神政治的發達所發生的影響，要大于研究室中所謂『純理性』所想像的一切好的學說。

就職業講，這種有增無已的大羣衆在農業勞動與工業活動的大分野中，也有同樣重大的變化。當一百年以前，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從事于農業勞動，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屬於工業，商業，學界和行政界。當大戰以前，人口差不多增加三倍，然內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經營農業經濟的。但農業經濟的結果較前增加兩倍，三倍，或更多些。農業中所經過的革命和工業中所經過的，程度是一樣的。在工業中是蒸汽機，織布機，紡紗機等等的發明，在農業中就是人造肥料的應用。一般大化學家——尤其是萊比錫的約斯托斯 (Justus)——知道將植物生長所經的過程指示出來；他們發見礦物質，並且取來作爲肥料，使確確的或地力耗盡的土地再成膏腴之地。人們用鉀鹽 (Kalisal) 和鐵的廢物作爲人造肥料，更用阿摩尼亞 (Ammoniak)，外國輸入的海鳥糞，以及花椒硝石 (Chili-Salpeter) 作爲肥料；可是用現今從空

氣中所取的淡氣，或栽培某些植物——如盧平豆 (Lupine) 之類——也可使瘦土變爲肥沃之地。此外則充分的使用機器。從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一二年，德國農業經濟中所用的蒸汽犁由八百三十六架增至二千二百九十五架，刈割機由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架增至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五架，播種機由六萬三千八百四十二架增至二十九萬零三十九架，蒸汽打穀機由七萬五千六百九十七架增至四十八萬八千八百零七架，平常的打穀機由二十九萬八千三百六十七架增至九十四萬七千零三架；此外如打孔機和散糞機等等都有增加。在農業經濟中活動的勞動力雖未嘗增加，並且還減少了，然因科學與機器的應用，農產物已經大大地增加了。

這種資本主義的經濟方法現在是擴充到一切方面，由這種方法中自然發展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層疊，發生新的社會階級，牠們都具有新的慾望與努

力，具有完全不同的觀點與爭鬥。

所謂『善良的舊時代』的小『雇主』發達成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

從前城市的商人和手工業者爲着脫離地主統治的羈絆並獲取城市的政權而爭鬥，此時資本主義化的中等階級也開始牠的特別的政治爭鬥，借助于國家的權力去追求並貫徹牠的特別的經濟利益和階級利益。業經出世的資本對於牠的發展找着一種保護，藉以反抗那由貴族與行會結晶的舊封建勢力的反動。這種資本對於和此等勢力爭政治統治的君主政體，予以援助，對於那結晶于一個專制君主的中央集權的形成，加以推進，對於君主並供給金錢，使之招致軍隊，鞏固政權。到了後來，君權既經穩固，君主復與衰落的封建貴族聯合，並加惠貴族，忽視人民與市民的利益，于是又形成中等階級革命的運動，藉以打破反動的勢力，使中等階級得參加政府與中央立法機

關。

中等階級的大革命即構成此等爭鬥的頂點，英國中等階級的第一次革命已經發生于十七世紀的上半期，至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斯第一被送上斷頭台，而富裕的中等階級對於政府與立法達到民主主義的參加的目的。法國中等階級的大革命開始于一七八九年。當時是法國的小中等階級取得政權。從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起，我們便看見那由小中等階級發展出來的大中等階級，那正在形成的大資本取得政權了。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國家中中等階級既已攫得政權，那麼，德意志在經濟上進步，在政治上落後的階級必定要作奪取政權的爭鬥，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德國資本主義關係的形成比英法兩國要遲得多。自美洲及往東印度航路發見以後，地中海沿岸的商業移至大西洋沿岸，于是德意志衰

落下去了。又加以一六一八年至一八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出現于德國，使牠的元氣大衰，人口減至幾百萬。德國到後來才達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中，並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經過牠的中等階級的革命。我們在此中等階級的革命中對於唯物史觀的正確已經找着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生產方法一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便會發生向來爲人所不知道的新階級。此等階級爲貫徹牠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起見，開始一種爭鬥，即一種歷史的階級爭鬥。當必要的政治勢力的轉移在舊狀況之下如果不能充分實現，這種爭鬥終必至于用武，至于革命，在革命之中，代表歷史上進步的階級終必取得政權，因政權的帮助，牠們才得藉迅速的進步的改革的改革，去實現牠們新的經濟制度和階級理想。

中等階級在歷史上必定是先于工人階級而發生覺悟，認清階級利益，團

結一致，因此也先取得政權。最初的工人階級並不是站在中等階級旁邊的一種團結的獨立的勢力。這個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是和中小中等階級混在一起的，因此牠如果在政治方面有所主張，牠起初所標榜的還是中等階級的要求與目的。當時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抗尚未發達，所以牠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的要求比現在要廣泛得多，牠現在眼見階級的分野十分顯明，工人勢力的發展和目標十分可怕，牠竟否認牠舊的平等的要求了。牠現在仍有一部分保持牠的舊口號與社會意識作爲門面話，但在實行上牠總是決決絕絕只顧及牠所認識的和歷史上所轉變來的階級利益的。

一切國家的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對於政治的統治必須爲有力的參加。這一點牠是達到目的的。牠依照牠的利益去影響國家的立法與政策。牠依照自己的需要，形成權利，法律，陸軍，海軍，征服世界的政策，並取消必

要的稅捐，制定取締工人運動的強迫律。牠依照自己的志願，施行關稅政策，去『保護』國內的工業抵制外國的廉價物品，牠輸入原料，秘密保持最好的勞動方法，擴充或停止生產，均是爲所欲爲。牠開始充分發展財富，與生產技術，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已經說過：『牠所造的奇蹟，比起羅馬的水道，中古時代的禮拜堂，埃及的金字塔，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勞動過程以及支持一切的創造基礎主要的形態是由以前經濟的階段中發展出來的，此處有一種栩栩欲活的大營業的描寫，足以表見大資本主義時代龐大的勞動進步，這早利阿·西爾伯斯台·繼爾伯 (Leo Silberstein-Gilbert) 對於他所訪問的工廠的一種描寫，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在佛郎克佛報 (Frankfurter Zeitung) 上發表的……

『我們走入一個大工作場，此工場屋子所佔的面積不下二萬零六

百七十五方米突，牠是現今最大的機器製造工場之一。房屋的層次甚多，大批的工人在千百架機器面前作工。太陽的光線從巨大的窻戶外和屋頂上射入工作場中。我們從一個很高的陽台上俯視如蟻一般的動作。下面也沒有東西足以妨礙視察。在各柱頭之間有十四個平行的場所，各寬十五米突。每一個場所，在原則上是構成一個勞動區，並且依照物品完成的次序，使各場所互相啣接，將原料送入第一個勞動區，以次傳遞下去，加工製造，到了最後一個勞動區，物品經過檢驗，即打成包裹，發送出去。此處的產物第一為發電機，電動機，和變壓器，其次為電車路上所用的物件，和工具上所用的電氣推進等等。工場中所用的原料係由鐵路輸送進去，用電氣起重機對各勞動區起卸材

料·此等機可載一萬和二萬啟羅格蘭姆 (Kilogramm) 的重量。工人們得着此等機器的幫助，對於笨重的材料，可以措置裕如，即在新近裝有巨大容積的發電機的勞動區，也是一樣。……沒有何處有傳達的波動，沒有何處的皮條是舊式傳達上用的。監工人坐在玻璃和鐵造的頂上的小屋子中，俯視他們的工作場，毫無障礙。發動力傳達到各架機器上，差不多和思想一樣無形無影，可是使各輪上充滿機械的力量。……營業指導員借助于自動計數器可以測定每天並每秒鐘全部機器或各架機器所消耗的力量。

『工場的組織是向一種新的方向改變的：一切東西都是可以移動的！即最重的工作機也不復固定在地面上！這種機器和銼

子，鉗子等工具沒有區別，因為牠雖發出絕大的力量，然用手一按，就可以將牠舉起，操縱自如。營業中的次序，工作的進程是會改變的，工作場的圖案在一日之中完全變化，以便迅速適合于一種新產物的工作進程，或新的製造理想。巨大的起重機輕輕舉起那並非牢牢固定的工作機，將牠們安置在另一勞動區中其牠機器的旁邊。人們將牆上或柱頭上的電線的一端接在工作機上，牠們就作起工來了。』

* * *

我們試從奧托·瑞斯特 (Artur Furst) 力的領域 (Im Reich der

Kraft) 那種活潑的描寫中取一個輪展機來說。一塊龐大的燒紅的鐵從一個火窟中現形出來。馬上用起重機將牠移至重大的輪展機上。一架三千馬

力的蒸汽機轉動此等重大的輪展機，而鐵塊即卸入牠們的中間。當輪展機含住了鐵塊，全部龐大的機械因此停頓一下——三千馬力因這種可怕的壓迫而停頓了。可是停頓只有一剎那間的工夫，於是那可怕的鐵塊從輪展機的裂口卸在另一邊，變成細而長的條子了。輪展機的裂口裝置得較為狹小，因為鐵塊總從相反的方向經過的。這樣的進程是重複表演的。這種鐵塊在五分鐘之後就變成一根三十米突長的鐵路軌條了。這種軌條運到鋸工場，在一個短時期之內，即被鋸成平常適用的鐵路軌條長度的條子，然後作為完成的生產物，送入貨棧中。

我們試再看一看那蒸汽鎚。在一個龐大的鐵架上懸有一個一萬啟維格蘭姆重的鎚。一個做預備工作的人輕輕推動一根小槓杆，這巨大的重量即向放在下面的物件撞來，將牠打得扁平了。人們拿着槓杆，或讓蒸汽鎚從

很高的地方慢慢地向目的物撞擊，或讓牠從很矮的地方作急速的撞擊，每分鐘至八百次之多。人們可以將很小的釘讓這蒸汽鏈釘在柔木上面。此外還有重五萬啟羅格蘭姆或五萬啟羅格蘭姆以上的蒸汽鏈。

然另有一種水壓機，牠的力量還要大得多。牠的壓力可達到三百萬啟羅格蘭姆。牠的作工不像鏈一樣向着鐵塊猛撞，牠是拿着鐵塊毫無聲息地長久地壓着。敏興的德意志博物院中放有一塊一米突高和一米突寬的鐵，這塊鐵曾受過克洛浦（Krupp）的重鏈撞擊一下。牠留下一種三十五米釐米突（Millimeter）深的痕跡。這塊鐵又經過水壓機的壓榨。此機所鑄的洞竟深半個米突。

這就是近世龐大的生產進程中有聲有色的輔助工具的圖形。牠已經大大地超過馬克思和昂格思一八四七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作歷史的評價了，他

們的說法是：『資產階級達到階級的統治還不到一百年，然牠所創造的生產力大于過去一切時代生產力的總和。如征服自然力，如機械，如應用化學于工農業，如汽船航海，如鐵路，如電綫，如開闢全部世界各部分，如疏通河道以利航行，如像魔術一般蕃殖衆多的人口——從前有那一個世紀曾經夢想到這樣的生產力是潛伏在社會勞動的懷中啊？』

有了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的出現才是可能的——這種發展並且也將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各種力量創造出來。

在資產階級的旁邊又發生一個新階級，即近世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等階級中的一部分變成近世的大資本家，使大多數人類喪失他們從前獨立的經濟地位。他們必須完全受資本的宰制，並且降爲工資勞動者。資本主義對於這個工資勞動階級給予大批的苦惱，即在最順利的時機中，牠

的生活也不安定，這是從前的工人所未嘗遭遇過的。中古時代的工人，獲得生活上的保障。當時的幫工預先知道他終有一日會做獨立的老板。工人爲市場而作工，這種市場是有組織的，所以對於工人予以麵包和工作。老板要受一定的限制，不能盡量剝削勞動力，以飽私囊。當這種狀況如能夠維持下去，工人與老板之間便不會形成嚴厲的對抗。兩者的利益多半是相依爲命的，所以當時沒有發生現今一樣的工人運動的餘地。到了後來，舊有的安全狀況消滅了，人數愈集愈多的幫工大都不能達到老板的地位了，于是反抗老板的幫工運動才出現。這種運動的出現是勢所必至，不能倖免的。

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企業家與工人的距離非常之遠，兩者利害的對抗也非常的厲害。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爲文化的利益計，現今社會民主主

義的工人運動的興起是一種歷史的必要。

阿爾夫列·克洛蒲 Alfred Krupp) 在一八七三年一張紀念報上向工人指出他的祖先佛利德利芝·克洛蒲 (Friedrich Krupp) 于一八一九年以亞省的一個小工場為基礎，可以擴充成爲一個極大的工廠，但這種事實不能作爲例子，這是很可笑的。現今的工人如果不經過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向前進行，但幻想由勤勞與節儉而變成鐵工廠，鑛山或紡紗廠的所有人，那簡直是發癡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使工人與雇主的利益完全分離了。牠除掉壓迫男子作工外，還強迫他們的家眷——婦女和小孩——從事勞動，藉以增加資本家的財富。牠使工人發生職業病和職業的意外變故，這是以前的人們所不知道的。牠使工業人口的康健日趨衰弱，並且把許多職業中的工人直接毀滅

了。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一直到現在，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富足的社會——有千百萬人陷于很深的奴隸境遇中，他們居住的情形是不爲一切道德和衛生所許可的，他們簡直沒有能力懂得文化的寶貴，更講不到享受這種文化了。無數的羣衆如果懂得藝術與科學怎樣提高全部生活的感情，善與美怎樣開拓我們的心胸，那麼，他們對於這種蔑視大多數人幸福的社會制度的作戰，必定要兇猛得多。此等無產者的生存是千百萬人啼饑號寒，並且時常有陷入無限困苦中的危險——這就是資本大王一切光華燦爛的可怕的基礎，而在這些大王中有些簡直因財富太多，不復知道要怎樣辦。

就是後來因工人運動的結果——不是因資本的仁慈與慷慨——大部分工人的生存不致完全陷入深深的困苦中，或從困苦中再自拔出來，然廣大的羣衆對

于勞動的精神關係——這是足以使他們感覺愉快的——却被剝奪了。近世的技術與發達的分工對於無數工人所形成的勞動進程與勞動日是同樣的工作返復重演，因此要使勞動的生活具有一種豐富的內容與美感是不可能的。 | 拉特

| 鬧 (Walter Rathenau) 在將來的發展是什麼 (Was wird werden) 中很沈痛地說：『一生爲着財產的緣故而工作，這不是天經地義的職業。』中古時代的手工勞動使工人——老板或帮工——得從頭至尾完成整個的物件，試想這是何等的一種勞動的精神內容。他們在從事于他們的職務時，可以獲得一種生活的內容，可以感覺滿足。到了現在，大多數羣衆的勞動沒有精神的內容，資本主義造成這種大苦惱是很少人加以重視的。現在許多勞動除掉帶着不滿意的狀況外，還缺乏教練，當這種情形有所改進，那麼，工聯與社會民主黨的功績比資本主義一切甘心情願的精神教育的設施要大得多。

資本主義不獨使羣衆的生存條件不充分，並且還使此等條件常是不安穩。沒有一個工人能夠拿定他自己不因新的發明或危機而失業；就是最有學識經驗的工人也沒有把握，可以長久保持他的位置。危機的鬼時常出現：成千成萬的工人被開除，這種失業除掉當時要挨餓以外，常是指明工聯努力爭得的改良又將喪失了。從前的經濟方法中安穩的狀態在大資本主義中完全消滅了。這種資本主義的結果，造成一個極豪富的爲數無多的資產階級，而以生活的不安全及現今生產中其他一切危險加諸大多數的工人階級。

社會的思想在此等狀況之下，自然是會起變化的。各階級對於牠們中間的對抗愈加認識明白，對於彼此的爭持也愈加厲害。現今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對峙着，牠自己形成整個的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利害，完全不同

的思想，完全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目標及爭鬥。

從前資本主義化的中等階級爭得政治的參預權，去貫徹資本主義的經濟利益，當反動的舊勢力不願平和屈服的時候，牠就開始作猛烈的爭鬥，卒取得政權，近世工人階級使由社會民主黨與工聯爭取政權，以利用政權去促成經濟方法的發達，這一次的爭鬥固然爲着被壓迫的工人的利益，但同時也是爲着全人類的利益。

在一切階段中經濟的目的總在生產當時社會狀況所必需的消費品。社會主義要充分生產此等必需的消費品，其數量必多于現今爲大多數人所生產的，同時牠要剷除工人階級的貧窮與困苦。反之，在資本主義之中，生產最後的目的是將消費品作爲商品，藉以出售而獲取利潤。這就是現今工人階級困苦的來源。人們被強迫這樣去生產消費品，替資本家造成剩餘價值

或利潤、而自己却只能維持一種赤條條的生活，這種原因就在現今的生產工具是各個人的私有財產。

倘若生產工具是公有的，則生產的規畫不是以資本家的利潤為前提，但是以公衆的利益為前提。現今的剝削即無從發生。因為為公衆的幸福而運用勞動力，便不是剝削。所謂剝削是以某些勢強力盛的階級存在為前提，牠們據有生產工具，宰制牠們旁邊較弱的階級，使自己獲得特別的利益。在生產工具完全為社會公有財產的時候，這種剝削即被排除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生產不復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而進行的，但直接是為生產最後的目的而進行的：所謂最後的目的就是滿足社會的慾望。於是發明與技術進步的見諸實行將比現在要增加得多些。即現今資本主義生產中所發生的危機也完全除去了。這是社會主義最終的目的，這是社會民主黨黨

綱中的要求意義所在之處：即商品的生產變為社會主義的生產。

這種轉變的時機已經成熟，資本主義已經履行過牠的必然的歷史的使命了。牠受着自利心的策勵，發展了各種經濟的力量，此等力量現在本來足以維持全體人類最豐富的生活。社會主義是要打破少數私人特別利用此等發展的經濟力量，創造一種以公有財產為目的的經濟，使全體勞動人民對於他們所生產的財富，得充分享用。資本主義曾經使地球的顏面頓改舊觀，社會主義也會是這樣，牠是以全體人民的幸福為最高法則的。

現在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團體政策的目標是向着社會主義走的；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狀況中有覺悟的，完全合乎邏輯的反面。

*

*

*

*

所以工人階級的運動與政策必須從經濟發展的地位上——不能從其他地方

去了解。小工業的經濟沒有產生一個和中等階級及雇主在精神上分離的工人階級，也沒有在工人羣衆中產生一種顯明的階級覺悟，只有少數進步的分子才有這種覺悟。可是大工業的經濟使大多數人受資本主義的損害，使完全自然而然地產生反抗和防禦的努力。

在近世資本主義的效力發生最早的國家，這種努力也自然表現得最早，此等國家就是英格蘭，法蘭西。這種努力最初也有走錯道路的，但後來牠又離開此等歧途了。在英法兩國有渦文 (Robert Owen)，傅立葉 (F. urier) 和聖西門 (Saint-Simon) 等標榜最初的社會主義的新制度，這就是後來所稱的烏託邦。那位旅行外國作同一努力的德意志裁縫懷德靈 (Wilhelm Weitling) 的社會主義學說已經和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學說很相近，至于這種學說是旋由馬克思與昂格思從根本發揮出來的。馬昂兩氏是眼光銳利的

主義，他們除掉具有必需的學校的修養外，又是資本主義已經萌芽，工廠主和工人的對抗已經出現的萊因省人的兒子，尤其是重要的一樁事是他們旅居于英法兩國，在此等國中的對抗已經形成一種運動，必能更加引起他們的興趣。昂格思受了英國工廠工人爭鬥和困苦的影響，在很早的時候（一八四五年）就已經著成一部含有唯物史觀精神的書，叫做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Zu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在現代之中，馬克思與昂格思的政治學說和經濟學說是社會主義工人的共有物，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精神基礎。至于這種運動是要奪取國家的政權，以便藉政權的幫助，替牠的經濟的目標——社會主義——開闢一條坦途，使之獲得勝利。

這種工人運動所從事的爭鬥和前此代表歷史進步的集團的爭鬥具有同一歷史的資格，也會獲得同一歷史的勝利保證。從前的商人，行會和中等階級的運動既已勝利，現在的工人運動也會勝利。在世界史上，每種這樣的運動一爲社會的進步所必需，都是貫徹了的。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進步，這就是說，牠不是什麼爲世人所不知道的東西，牠不是什麼矯揉造作的幻想物，牠但是在資本主義包殼下所培養的和社會關係自身所傾向的更高的必然的發展，所以牠必定要成爲一種歷史的事實。

我們對於全部階級史的人類發展中決絕的原動力，加以科學的分析，即能給予我們以這種意識上的保證，這個步驟可以達到馬克思與昂格思所建設的唯物史觀，我們對於社會發展史如果回顧一下，便可以明白這種唯物史觀

是完全正確的。

昂格思在馬克思的傳略中（見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紀念冊第二十一號

頁 Karl Marx in Gedächtnis Von W. Liebknecht。對於這種爲科學的

社會主義基礎的唯物史觀說道：

『馬克思重要的發見——他的名字即因此而列入科學史上——的第一種是他對於全部世界史觀所起的革命。向來全部的歷史觀建築在下面一種觀念上，就是一切歷史變化的最後原因當求之於人類改變的理想中，而政治的變化是一切歷史變化中最重要，是支配全部歷史的。但人們的理想是怎樣發生的，引起政治變化的原因是什麼——關於這一點，就沒有人問究了。只有新派的法蘭西的一部分英格蘭的作史者才迫而相信，至少是從中古時代以

來，歐洲歷史的推動力是那日形發展的中等階級向封建貴族奪取社會和政治統治權的爭鬥。馬克思現在指明自古至今全部的歷史是一部階級爭鬥史，而一切複雜的政治爭鬥只是由於各社會階級爲着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權相持不下，在較舊的階級方面是要保持這種統治權，在新興的階級方面是要奪取這種統治權。

「然此等階級又是因何發生與成立的呢？牠們是由於當時物質的粗糙的條件而發生與成立的，在此等條件之下，社會於一定的時期內，生產並交換牠的生活品。中古時代的封建統治是建築在自給自足的，差不多沒有交換的小農組織的經濟上面，而好戰的貴族對於此等組織予以對外的保護，和民族的或政治的結合。這城市發生，手工業出現，國內的和國際的商業交通相繼而起，

於是城市的中等階級發達了，還在中古時代，牠即因和貴族爭鬥而獲得政治地位，成爲封建制度中一個享特權的閥閱。自歐洲以外的地方被發見後，中等階級從十五世紀中葉起即獲得一個更大的商業區域，因此成爲牠的工業上的一種新刺戟；在各最重要部門的手工業爲工廠手工業所排擠，而工廠手工業又爲前世紀的發明——即蒸汽機——所造成的大工業所排擠，這種大工業又對於商業發生影響，因爲牠對於產業落後的國家打倒了舊式的手工業，對於產業發展的國家，創造了現今新式的交通工具，蒸汽機，鐵路和電線。所以中等階級一天一天將社會的財富和社會的勢力聯合在牠的手中了，然牠在一個長久的時期中，對於貴族以及貴族所支持的君主手中的政治權力是沒有份兒的。可是到了某個

階段——在法國是大革命以後——牠也奪取了政權，牠對着無產階級和小農民而成爲統治階級。從這種觀點出發去解釋一切歷史現象，最爲簡單——我們的作史者對於充分認識當時經濟的社會狀況一點，是完全沒有的——從這個時代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此等條件形成的社會和政治關係去解釋每個歷史時代的觀念與理想，也恰恰是最爲簡單。歷史是第一次被放在牠的真正的基礎上；在人類能夠爭取權力，從事政治，宗教，哲學等等之前，他們必須有衣食住，因此他們必須勞動，這種顯而易見的事實竟完全被忽略了——然這種事實現在畢竟達到牠的歷史的正當地位了。」

柏柏爾 (Rebel) 在他的婦女與社會主義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一塊地皮，社會民主黨自然而然地必定發生在這塊地皮上，恰和封建社會發展至一定高度，資產階級的社會即發生於其上是一樣的，這個新社會，一方用和平合法的方法，一方又用暴力的方法將舊的封建社會制度推倒了，打碎了，而現今的社會制度在一切單個的現象中都出生了。現今資產階級的社會是一種發達過程的產物，牠開始於舊的封建社會中，總是向前發展，同樣，近世的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向前發展的過程中發生階級覺悟，牠也一樣努力向上發展，努力達到社會中值得做人的地位，牠並且努力於建設一個新形態的社會，這是會成功的，因為這種新形態的社會是潛伏在社會自然律的發展中，而不

可磨滅的。封建勢力既不能抑制資產階級的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又安能抑制社會主義的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在向來一切社會制度中雖是最好的最完善的（這是指在生產力和財富的發展上爲最好的最完善的），然牠並不是理想中最好的，牠並不是最後的發達的階段。在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後面，站着一種新的正待發展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

*

*

*

當生產制度與社會制度妨礙最大多數人的進步與利益時，牠們總是要受劇烈的反抗，終且被消滅；當牠們的生存已經過時，在牠們的範圍之內不能找着道路及力量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調和時，牠們即陷入無文化的狀況中。當羅馬經濟生活的發展不復能使羣衆有勞動的興趣，不復能找着一條路向前

向外發展時，古代的羅馬即回轉到野蠻的階段中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不會陷入這種狀況之中，因為牠不斷地產生社會主義的新經濟中一切元素，並且是再接再厲的。牠產生此等元素免不了違反牠的主人的志願，因為牠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產生剩餘價值的一種經濟。

現今產生剩餘價值的定律是什麼？剩餘價值是怎樣起源的，牠的基本條件是什麼？

剩餘價值的起源是由於一切工人所生產的價值平均要多於他們因勞動而獲得的工資。資本主義攫得這種超過工人工資的價值，而資本家和其餘不從事於創造價值勞動的全社會都賴以生活。

現今的工人除掉創造他的工資外，還要創造剩餘價值，他所以陷入這種命運之中，因為他同時不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在生產的進程中他只具有

勞動力，他爲求生存起見，必須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藉以取得工資。但是資本家要勞動力所創造的多於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工資，他們才肯購買勞動力。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和這種超過勞動工資的剩餘價值同其興滅的。如果從資本家的手中取出生產工具，因此也取出生產自身，使成爲公衆的產業，資本主義便消滅了。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所在之處。這種目的一經達到，勞動的生產物不復表現爲資本家的價值——即一部分變爲勞動工資，歸於勞動者，一部分成爲剩餘價值，飽了資本家的私囊——但是有計劃地直接生產出來，作爲社會的使用價值，滿足社會的需要。

資本家是寄生在剩餘價值上面的。他們和他們的扈從真是過優美奢華的生活。但無論資本家的生活怎樣奢華浪費，他們——就全體講——總不會將他們所得的剩餘價值，用得精光。每年總有大量的剩餘價值沒有被花完，

並且用作新資本去擴充和改良舊的營業，建設新的營業，總說一句，就是擴大全部生產的機關，提高牠的效能，使生產得在一種更大的規模中向前進行。馬克思對於這種時常應用一部分剩餘價值作為生產新利潤的資本，稱之為資本的蓄積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資本主義的發達愈高，資本家自己所能消耗的剩餘價值部分——以全部為比例——便愈小，而蓄積——即再用作新生產資本——的部分便愈大。所以蓄積的範圍總是愈擴愈大的。我們馬上會看見，資本主義滅亡的傾向就是由這種蓄積中產生出來的。

然資本家却不能藉剷除或減少蓄積去反抗這種傾向○ 第一，蓄積不是資本家隨意措置的；第二，蓄積的停滯才使那種要剷除資本主義的運動愈加強盛。因為資本死放着不動，可以使失業增加，破產出現，利息，利潤，

租金減低，各界的人都更願接受那種對於資本主義發生危險，終久且要推倒牠的運動。

蓄積不是由資本家隨意措施的：這不是單個的資本家能够或不能夠參加這種進程的問題。這只是每個資本家在此進程中以資本家的資格所具的全部生存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各單個資本主義生產者彼此的普通競爭中，或在各國資本家的國際競爭中，每單個的資本家可以因他的生產不斷的擴充與廉價，站得住腳。一個資本家在這種競爭中如果願意維持現狀，不求改進，或是不願意充分努力前進，他馬上會被他的競爭者超過；這就是他的經濟的死症。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具的固有的傾向是，愈加將生產中的資本增大，愈加將生產機關擴充，愈加將商品的數量加多。

馬克思對於這一點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使一種工業企業中所投的資本必須繼續增加，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定律對於每個資本家成爲外界的強制的定律。競爭強迫每個資本家爲保持他的資本起見，必須繼續擴大他的資本，他只有假手於累進的蓄積，才能夠擴大他的資本。』

此處是將我們在前面零碎所說的話，用馬克思的語法表現出來。可是這種蓄積的效力引起我們所稱的社會發展，而此發展同時含有達到資本主義滅亡並達到社會主義的傾向。

因此上面所指示的進程可以毫無阻礙地向前進行，同時一切可能性總是愈加增大的，一切被生產的商品可以出售獲得利潤，一切因出售而獲得的並

未被消耗的資本利潤又被用作新資本，這是必要的。商品銷路的可能性不斷的擴充，這是蓄積進程中的一種必要。但這種銷路的可能性並不是可以不斷地增加的，只有在某些條件之下才得增加，而此等條件又助長了那些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反抗的努力。

資本主義起初由改革本國陳舊的經濟形態去創造銷路的可能性。

舊有手工業式的生產和舊有的商業於是被排擠，被改變了。資本主義的貨幣流通與商品流通以及工業的商品生產侵入鄉間，達到最遼遠的地方。資本主義的競爭如果用牠的廉價起初將小生產者和小商人打倒了，或對於資本主義已有勞績了，牠如果將那半在自然經濟中的農業經濟自給自足的手工業家內勞動掃除了，牠如果將農民家內勞動者的勞動工業化了，於是大資本家中間的競爭更向前發展，他們中間較為弱小的也被壓倒了殲滅了。『一

個資本家毀滅許多資本家』這句話又可用『資本的集中』一語表現出來。人們爲使這全部進程在外國進逼的或更廉價的商品之前安全進行起見，就用保護稅則去防止外國商品的侵入，或提高此等商品的價格，使牠們不致過分奪取了本國資本剝削的地皮，使後者難於抬頭。『保護稅的制度是予一國的資本以一種武器，使牠可以抵抗別國的資本。』被扶助而崛起的工業得着本國的幫助，又將乘勢輸往對抗的外國。德意志在大戰前最近二十五年內輸出商品較前增加三倍了。此外還有巨額的德國資本投在外國。

這種發展又因迦特爾，新笛卡 (Syndikate)，和托辣斯而愈加迅速了。有一個時候，人們要予迦特爾以一種權力，使能規定生產。牠們應當使生產和消費適合，藉此除去資本主義生產中最顯著的矛盾——即危機。可是當前世紀的八十年代，從美國出發的迦特爾化的努力以及德國迦特爾化的鐵工

廠業和礦山業馬上就向世界指明，這種規定與適合只是在提高價格之下矯揉造作地去抑制生產。這種適合的傾向使迦特爾化的工業減少生產。但牠並不因此減少剩餘價值的產生。牠不藉增加生產的老方法去提高剩餘價值，但在矯揉造作的縮小的生產之中，假手於人爲的增加價格去提高剩餘價值，至於這種價格所以能夠增加，是因爲在一個有組織的工業主的集團中排除了競爭，使價格變成一種壟斷的價格。商品價格的增加多於工廠勞動者的工資的增加，因此使領取工資的人的購買力下降，使剩餘價值大大地上升。那種不可避免的蓄積進程並不因這種生產的規定而受絲毫束縛。當剩餘價值在自己這人爲的縮小的工業中不能獲得安身之所時，牠就一面投身於其他產業部門，增加無節制生產的程度，引起過剩生產的危險，另一方面，牠又投身於主義的可能中，所謂蓄積的可能就在征服世界市場。龐大

的世界市場此刻才創造出來。

資本爲着在各國奪取世界市場的競爭鬥中順利進行起見，於是力求取得對於牠的工業供給原料的地域；即供給棉花，橡皮，銅，鐵，煤油，煤炭，和生活品等等的地域，當本國沒有其他辦法的時候，就依照辟插洛的老法子，將此等地方作爲殖民地，或作爲所謂保護地帶與勢力範圍。這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在此等地方獲得有價值的原料，遂使本國的資本享受優先權，同時牠又力求損害此中的外國資本。這些殖民地，保護地帶和勢力範圍又愈加成爲本國輸出資本的有價值的地方，如近世道路的建築，鐵路的建築，城市和港灣的建築，運輸工具的供給，生產工具的供給，都可以投入資本，獲取利潤。所以資本除掉本國外，又在全世界替蓄積的進程獲得牠所需要的商品銷路與貨幣投資的可能。

可是我們現在必須懂得，這種擴充不是一個唯一國家的資本經營的，但是由一批互相競爭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經營的。工業幼稚的國家起初可以讓歐洲的商品擁入，但到了一定的時期，牠們在工業方面能夠獨立，牠們就要開始對外來的商品擋駕，並且還要以同等的生產物和先進的國家共同出現於世界競爭的場中。美國就是一個例子。『美國人的美國』是這種潮流中一個爭鬥的口號，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即伏在這口號的下面。當大戰前俄羅斯的西部開始發展一種重要的工業——即織物工業——日增興盛。日本表現為一個有力的工業國家——就是中國也不復是閉關自守的了。中國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鐵路的啟羅米突數目從二百五十二增至四千八百七十五。巴爾幹諸國也工業化了。文明的尖銳的機器汽管在牠們的最遼遠的地方開始發聲了。現在因和平出現，世界最遠的地帶已經被破壞的工業發

展又將從新前進。可是到處出現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在工業的恢復中將取得領導的地位。

這種工業的發展不僅是各處堅強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據，並且還是近世世界政策的原因。只有在資本最初的發育時代，牠才以征服並剝削本國市場爲滿足，當牠再向前發展的時候，牠就要找新地帶，要將全世界作爲資本主義的市場，作爲牠的剝削的區域。

馬克思和昂格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預言完全實現了：『資產階級爲着牠的生產物需要一個時常擴充的市場，牠就到處尋求，走遍了全世界。牠必須到處經營駐所，到處設法建造 到處從事聯絡。……資產階級因一切生產工具迅速的改良，和一切交通機關無限的便利，將最野蠻的國民也拖到文明中來了。』這是資本主義一種內在的必要，因此貫注在帝國主義的，暴戾

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政策中。

資本主義這種開闢世界的努力，不是一國資本主義可以參加或不參加的一種偶然的努力。當生產的結果在本國中不復能夠容納，資本家到了這種發展的階段，必須作這樣的努力。因此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的世界政策，牠的征服的努力和牠的帝國主義在牠最堅強最深遠的原因中和從前任何時代征服的企圖與稱雄世界的企圖是完全不同的。現在的世界政策是資本主義生產剩餘價值政治的語法，牠是達到目的——收取剩餘價值——的一種手段。

現在巨額的款項流入銀行中，構成從來未有的資本集中。就是小有產者節省的費用也在銀行中變成資本了。銀行最初只是出借款項的機關，後來竟變成工業的建設者。聯合的財政資本是一種比最大的資本家還強大的

財政勢力，牠現在在蓄積的進程中是主要的領導者。

現在在這種地皮上劇烈對抗的民族既日見增加，所以資本主義開闢世界的進程在各國間並不是以和平友好的態度進行的，這恰和一國各階級間全部資本主義的生產進程所呈的對抗一樣。這種開闢世界的進程弄得各國的競爭爭鬥張牙舞爪。我們看見近幾十年來，世界上充滿了龐大的經濟的革命，同時也充滿了戰勝攻取和主權的轉移，這種轉移是由流血的戰爭或在武力強迫的印象之下逼出來的。我們看見美國怎樣和西班牙爭鬥，而吞併古巴 (Kuba)。我們看見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我們看見奧和意大利怎樣併吞波斯尼 (Bosnien) 和黑慈哥維拉 (Herzegowina)，意大利怎樣向特利坡利 (Tripolis) 作搶劫的侵伐。我們看見世界大戰不久之前的巴爾幹戰爭，看見塞爾維亞的民族努力發展牠們的商業，藉以抵抗實行資本主義政策的奧

大利。我們看見俄羅斯向巴爾幹，尤其是向君士坦丁羅堡要求到地中海的一個出口，想由此達到世界大洋之中，又看見俄國的國權轉向亞洲，與英國在印度的勢力相爭持，與英國對於瓜分波斯相角逐。然英國因有龐大的殖民地，無數順便的碇泊所和煤棧在全世界的一切海洋中，並有幾十萬啟羅米突的海底電線，所以牠具有極強大的競爭的能力，成爲一個無匹的世界統治者和海洋統治者。

英國當世界大戰前，在牠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聯合王國中有四千五百萬居民住在三十一萬四千方啟羅米突的面積上，牠竟是亞洲，非洲，全部澳洲四萬萬居民的主人翁。單是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牠所統治的面積由一千二百五十萬方啟羅米突，增至二千八百萬方啟羅米突。我們自己對於牠和南非洲博爾人（Die Euren）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牠使杜蘭斯瓦爾

(Transvaal) 屈服了——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

法國于十九世紀中差不多相同的幾十年之內，在北非洲取得一種重要殖民地，牠從後印度（Hinterindien）攫得很大的地方，並據有馬塔伽斯卡島（Madagaskar），單是這個島要比德意志大些。當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我們看見法德兩國已經站在戰爭的門口，尤其伏有禍根的是：德國曼列斯曼廠（Mannesmann-Werke）的資本利益要掠奪摩洛哥的礦產（Marokkanische Minen），法國也代表斯萊德·克羅佐（Schneider-Creuzot）資本團同樣的利益。

德國當形成前期資本主義時，英國已經造成了牠的殖民地的勢力，德國當時完全談不到做殖民地的競爭者，到了十九世紀的十八九年代牠建設牠的殖民政策，只是爭得一些殘餘的渣滓。牠的工業藉着保護稅則，在本國遠

夠牠發展。在大戰前的最後幾年中，牠看見獨立的土耳其是一個可以使資本獲得千百萬利潤的地帶，牠于是在此處努力于牠的經濟建設，尤其是用德國的貨幣修築巴格塔鐵路（Bagdadbahn），這條鐵路是想從君士坦丁羅堡達到波斯灣的。在要求剝削與瓜分土耳其的其他歐洲諸國中，人們斜着眼睛看見德國對於土耳其的影響這樣增漲起來，而那條鐵路的修築又可以使土國和德國作更穩固的結合，這一點必定增進土耳其的軍事力量，殊非牠們所願意。自從德國戰敗以後，萬歲宮的和約已經將牠的殖民地拿去——牠的海軍艦隊和商業艦隊也被奪去——分給協約國中最有利害關係的國家，或由牠們共管了。

我們的時代中這一切統治地球的衝突伏有各國經濟競爭的爭鬥在裏面，牠們是要努力使資本獲得利潤。在這種衝突中，尤其是德，英，俄，法的

資本互相競爭。各個政府間的裂痕以及各懷敵意的同盟與協約畢竟造成這次世界大戰，其根源是伏在經濟裏面。從社會的歷史的方面看來，這就是爲着資本主義的世界利潤而互相分離與爭鬥。

物質的驅策力自然是裝在愛國主義的形態中的。同時發生效驗的自然還有一批其他的勢力，尤其是軍事的勢力。列強中的妬忌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並且還表現在軍事方面。軍事工業向來是資本主義視爲投資獲利的地方，然就這種工業所產生的現象看，牠並不是促進和平的。

法國的愛國主義者以合併亞爾薩斯和洛林相號召，鼓動戰爭，並且得到一般資本家的援助，後者對於俄國的借款是投過幾十億資本的。俄國皇室的分子畏懼革命，想于戰爭中加以制裁，也爲着戰爭而活動。至于爲巴爾幹斯拉夫人的利益而戰的話只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談。

講到德國，一批可怕罪惡是要加在牠的身上，這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德國因為牠的資本擴充的慾望已經招致了敵人，得不到朋友。牠的殖民政策以及因此所產生的軍國主義，和海軍主義已經將牠的最後的朋友——倘若牠真正有朋友的話——都失掉了。一切參加戰爭的國家的統治者對於戰爭的爆發應負多少直接責任，歷史是會確定出來的。牠們要努力打倒德國這個危險的競爭者，關於這一點，在戰爭中各方面都是成功的。

此次戰爭在使用武器上雖告終止，然在經濟方面仍舊繼續着，其兇猛的程度絲毫不減于從前。可是各國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要參加發言。資本主義，尤其是在戰爭中沒有破滅的美國、英國的和日本新興盛的資本主義雖還有產業落後的地方——如中國，巴爾幹，波斯，俄屬亞細亞，埃及，印度，墨西哥，和南美洲等處——供其宰制。資本在好些職業中——如農業——雖可以到

處加倍的侵入。然牠恰因到處引起了一種堅強的刺戟，發生種種狀況，可以保證勞動羣衆對於世界的產物當獲得一個充分的分子。此等羣衆都具有一種社會的認識，知道那吸取精華的資本家在一種充分發展的生產的經營中不復是一種進步的成分，這種情形並且是與日俱增的。

現在向資本主義作戰的人羣數目愈多，力量愈大，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努力也愈有結果，這不是資本主義所能够抵抗的。社會主義的羣衆將在一種有計畫的爭鬥中奪取政權，然後利用政權，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改革生產，像昂格思所說的（見杜爾靈的科學革命第六版三〇五頁）一樣：『假手于社會的生產，保證一切社員的生活，這種生活不僅是物質上十分完備，並一天一天地豐富起來，即在身體上和精神上也可保證充分的自由發育與發展。這種可能現在才第一次表現出來。』

這種可能是由強迫支配的發展定律中發生出來的。我們試一回顧經濟發達的過程，即看見此等定律怎樣使一定的經濟形態發生出來，而經濟自身對於這些形態總是引起種種的可能性和力量。于是陳舊過時的經濟形態爲新的可以達到的形態所排擠，這是不能倖免的。就是資本主義也要遭遇同一的命運。牠創造了大的向前進步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在牠的手中愈加成爲敵視社會的東西。然此等方法一入社會主義的手中即變成推進一種更高的制度的工具。資本主義在牠的大營業迦特爾，新笛卡，和托辣斯的技術極發達的生產組織中，在牠的向來無計畫的國際貿易中，運用此等方法，即在政治方面，對於正在發展中的人民結合也運用此等方法。應用龐大的生產工具造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發生種種敵視民衆的和缺點甚多的結果，現在的工人運動把此等結果的原因認識出來了。這種運動要改變應用生產

工具的性质，使無計畫的經濟變成有計畫的，使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歸于和諧，使剝削與階級社會一齊消滅。這是現今時代所要求的一種進程。然爲着這種最高的經濟階段而起的爭鬥，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是會日趨強固的。這種爭鬥的結果就是和馬克思的預言一樣：『生產工具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一經達到一個高點，資本主義的外殼即不能包容。這個外殼行將炸裂。于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撞了喪鐘。掠奪者被掠奪了。』